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1990 年代初期，隨著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並且宣告美蘇兩極冷戰終止，幾個國際關係學者針對冷戰結束之後的國際關係新結構與體系提出看法，尤其對於亞洲區域性的國際關係亦有所表示。Aaron Friedberg、Barry Buzan 以及 Gerald Segal 認為，亞洲形成了多極體系，爾後易導致軍備競賽，使得秩序不穩定成為常態。¹此種觀點在中國快速崛起、美日安保體系加強、北韓核武危機、台海兩岸問題以及南中國海之三大亞洲衝突熱點升高時，最被接受，且最具說服力。也因為如此，Aaron Friedberg 提出一個疑問，「歐洲的過去，是否成為亞洲的未來？」以前的歐洲國際關係是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的結構，各國為追求生存互相制衡成為秩序法則，因此在權力的競逐和平衡之間，爭戰不斷，思索亞洲的未來是否也會如此。²

然而，David Kang 卻不這麼認為。他表示中國應該稱之為重新崛起，如同 Joseph Nye 認為的，中國不該以「崛起」稱之，而是「中國再起」。³而且，中國一旦在亞洲區域躍昇再起，此區域其他國家會以其為中心，分享其成長，形成「扈從」(bandwagon)的關係。如此一來，將以一種階層式的結構秩序(hierarchy)展現，那

¹ Aaron L. Friedberg, 1993/94,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pp. 5-33.; 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1994,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36, No. 2, pp. 3-21.

² Aaron L. Friedberg, 1998, "Europe's Past, Asia's Future?" *SAIS Policy Forum Series Number Thre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1-15.

³ Joseph S. Nye Jr.,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0-67.

麼，不但鮮少出現衝突，不穩定的現象也會大幅降低。⁴理由很簡單，回溯東亞歷史，這種結構秩序本來就是東亞這個區域以往就存在的（即「朝貢秩序」），而且，雖然表面上有上下層級關係，但是實質而言，國家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⁵對此 Amitav Acharya 並不同意，認為 David Kang 過於歷史決定論，況且在亞洲這區域，冷戰之後是否存在階層秩序，以及相互平衡或扈從的關係是如何，這些都尚未明朗。國際關係詭譎多變，在短時間內不會定型於任何結構秩序，豈可輕易表示亞洲的國際關係就是「扈從」(bandwagon)關係。⁶

對此，Kai He 表示，冷戰之後可以確定美國是唯一超級強權。面對東亞區域的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中國崛起，成了多極體系或一超多強下秩序的不安定要素。只是全世界經濟相互依賴增加，傳統的軍事平衡成本相對提高許多，東亞國家在上述學者們所描述的不確定的國際結構下，普遍會採取相對於軍事力量硬性平衡(hard balancing)的軟性平衡(soft balancing)，意即透過制度相互制衡的方式。基本上，日本、南韓、東協國家莫不如此，此亦為一種避險(hedging)策略。其具體的作法，最典型的是一方面有限度的配合美國，對中國施以軟性平衡，同樣的，亦可對美國產生軟性平衡；另一方面，則與中國建立戰略安全領域之外的交往關係，以及將中國與美國同時納入東亞區域經貿互賴的網絡中，包括區域性多邊建制(regime)，⁷在東亞空間分佈上，大略區分成東

⁴ David C. Kang, 2001,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 19, No. 2, pp. 121-160.

⁵ David C. Kang,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pp. 57-85.

⁶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2007,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pp. 287-312.

⁷ Kai He,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pp. 489-518; Robert A. Manning and James J. Przystup, 1999, "Asia's Transition Diplomacy: Hedging Against Future shock," *Survival*, Vol. 41, No. 3, pp. 43-67; Yuen Foong Khong, 2004, "Coping with Strategic Uncertainty: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Soft Balancing in Southeast Asia's Post-Cold War

北亞與東南亞。Kai He 在《制度性平衡與國際關係理論：東南亞的經濟互賴與權力平衡策略》一文中，著重東南亞的研究，拜讀該文之後，引發探討東北亞區域是否存在類似的制度性平衡發展。冷戰結束之後，東亞的國際關係將如何發展？東北亞三國（中、日、韓）會形成東北亞的區域整合嗎？亞太區域的亞太經合會是否將更進一步整合？此為本文的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根據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國際體系是一個無政府的狀態 (anarchy)，而無政府狀態正是此體系的主要結構。國家是最重要且唯一的行為者，生存是最根本且重要的利益，每個國家行為者皆在追求其國家利益，為了生存，不斷增強自己的實力以確保生存與獲利，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互動，則致力於追求「權力」(power) 極大化。因此，一國的強化容易使他國感到不安，使得衝突與爭奪利益成為常態。⁸由於國際關係理論源於西方歐洲的發展，當時的歐陸從帝國（如羅馬帝國、奧匈帝國等）分崩為多個諸侯國（如德意志、法蘭西等），且因為在同一塊大陸上，任一方的擴張，代表著他方的損失，加上各邦的實力皆在伯仲之間，是以逐漸發展出相互制衡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關係。⁹

近來亞洲的經濟快速成長，尤其中國重新崛起，開始出現「亞洲人、東方人或中國人站起來了」的說法，儼然二十一世紀將始於亞洲的意志，全世界都目擊這一刻。然而，亞洲的未來，會是歐洲的過去嗎？亞洲的國際關係仍是權力平衡呢，還是會為了避

Strategy,” in Allen Carlson, Peter Katzenstein, and J. J. Suh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⁸ Robert Jervis, 1998, “Real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pp. 971-991.

⁹ Aaron L. Friedberg, 1998, “Europe’s Past, Asia’s Future?” *SAIS Policy Forum Series Number Thre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1-15.

免衝突對立而形成較穩定且和平的秩序？對 Aaron Friedberg 而言，亞洲依然是深受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影響，因為崛起的亞洲國家其實已算是高度整合入全球世界，特別是冷戰之後，西方強權所創立的世界秩序體系及經貿體系，已被世界大部份國家所接受，加上科技的日新月異，克服了天然地理障礙與距離，與西方的接觸頻繁，在國際關係的思維上，很可能還是以現實主義的觀點為主。在國際無政府的狀態下，為了維持國際體系的權力平衡與秩序，如果強權數越多，那麼秩序就越不易穩定。由此觀亞洲，可以發現，亞洲地區是「大國」集合地，這裡的強權有日本、印度、俄羅斯和中國，當然還有美國的角色。¹⁰

Kai He 也同意 Aaron Friedberg 的看法，認為亞洲深受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觀念影響。但是，仍然承認國際制度的創立，特別是經貿上的制度因為全球經濟相互依賴提高而發展出來。於是，設計了一套整合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制度性平衡模型(model of institutional balancing)。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是欲透過此模型分析東北亞區域發展，但是主要的研究視角是從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的觀點切入解釋，因為無法同時兼備兩種不同的角度分析，所以有必要採取單一立場進行研究，並進而探討東北亞是否有與東南亞區域相似的制度性平衡機制。

第二節、研究途徑、方法與章節安排

壹、研究途徑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理論研究途徑最主要的功能在於解釋現象。對於國際關係的理論研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才初

¹⁰ *Ibid.*, pp. 1-15.

步形成雛型。1940 年代末開始，國際關係的研究方法有了明顯的改進，也因此國際關係理論才得以逐漸充實。此後，最為重要的是三次的觀點論戰，分別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傳統主義與行為主義，以及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論戰，形成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脈絡。¹¹

理論本質是思考的工具，可幫助我們歸納知識，並且提出問題以便進一步研究。理論研究途徑最主要的功能是解釋特定的現象，但是，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國際關係理論無法達到自然科學那樣的精確程度，亦無法在實驗室接受不斷地驗證。因此，理論不一定要有實證的基礎，最重要的是必須具備邏輯的一貫性。就國際關係而言，經驗性的研究是可以加強對理論的驗證。

一、 制度性平衡模型(model of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由於本文是從 Kai He 的文章得到靈感，希望從其所設計的制度性平衡模型分析東北亞區域發展，探討在何種情況下，制度形式的軟性平衡(soft balancing)會出現。在此，制度(institution)指的是多邊主義的國際機構。對國家而言，制度性平衡是現實主義思維的策略，強調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下透過權力平衡的概念追求國家利益與安全。Kai He 整合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設計出制度性平衡模型，其中分成兩種制度性平衡：包含型(inclusive)以及排他型(exclusive)，並且納入國家權力的分配與經濟互賴程度的強弱，來決定如何選擇和應用平衡策略。¹²本文以東北亞自由貿易區以及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作為案例研究。模

¹¹ Robert Pfaltzgraff, Jr. and James Dougherty 著，胡祖慶譯，1995，《國際關係理論導讀》(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台北：五南，頁 1-11。

¹² Kai He,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pp. 489-518.

型圖 1-1 如下所示：(詳細討論，參考第二章文獻探討)

		經濟互賴	
		弱	強
權力分配	單極	權力平衡 (霸權和殖民戰爭都有可能)	制度性平衡：排他型 (霸權 vs 其他國家)
	雙極	兩大集團之間的權力平衡 (超級強權的戰爭相對比較不可能)	制度性平衡：兩集團分別為排他型；但在集團內屬於包含型 (分別由兩個超級強權領導)
	多極	權力平衡 (強權間的戰爭變得極有可能)	制度性平衡：包含型 (將平衡的目標國家納入制度中)

圖 1-1：極、互賴與國家間平衡

資料來源：Kai He,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p. 495.

二、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

然而，儘管 Kai He 嘗試整合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者的理論視角，但是不免有不斷更換立場與切入點的疑慮，畢竟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係屬立場不同的兩個理論論述，在做研究時經常變動論述立場，並不妥當。因此深究 Kai He 的制度性平衡理論描述，不難發現屬於現實主義的範疇，主要強調國家間相互「平衡」(balance)的關係，但是不同於古典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至冷戰初期，現實主義(realism)不斷成長茁壯，在經過與理想主義論戰之後，更確立了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主流地位。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國際關係典範(paradigm)，認為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國

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者，由於不確定他國意圖，是以採取自助原則(self-help)，並以追求權力極大化的方式，保障國家生存與安全，獲取最重要的國家利益。

因此，現實主義堅持認為國際政治受到人性的客觀法則所支配，意即人性是利己與自私的。國家的本質類似人性，為了保障國家安全而追求權力，自然彼此之間產生不信任與衝突。現實主義強調權力是國際政治的目的，國際政治的實質是國家利益，以權力界定利益的概念是一種客觀存在。¹³

隨著國際環境的變遷，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再度有了新轉變。1970年代，蘇聯的擴軍，與美國分庭抗禮，越戰的失利與經濟危機，引發美國是否衰落的辯論。全球南北貧富發展不均，以及美蘇東西方的冷戰對抗，成了國際關係急待解釋的問題。但是，對此傳統的現實主義並未能提出有力的解釋。在此背景下，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崛起，又稱之為結構現實主義。主要由 Kenneth Waltz 於 1979 年出版《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中提出，以體系分析傳統現實主義的核心論述，並且嘗試由「國際結構與國際體系」來描述、解釋以及預測國家行為，¹⁴而非傳統古典現實主義單從「國家」內部權力或國家利益角度來分析國際政治。新現實主義代表人物有 Kenneth Waltz、Robert Gilpin、Barry Buzan 以及 Stephen Krasner 等人。新現實主義認為主權國家是國際體系的組成要素，國際結構是無政府狀態的自助體系。主權國家是理性追求利益的行為者，並且強調「相對利益」的獲得，因此必須從國際結構或體系的角度切入，才能有效地解釋國際政治的互動關係。

¹³ Hans J. Morgenthau, 1978, 5th editi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Knopf, pp. 4-5.

¹⁴ Kenneth Waltz, 1979,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Little Brown.

而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則為現實主義論述國家間權力分配的主要概念。權力平衡概念作為解釋國際體系之中快速改變的權力分配與消長具有其精確的解釋力，尤其是在一個強權試圖征服特定區域時，造成其他國家群起抗衡的行動。就現實主義而言，權力平衡是指國家對內增加國力，對外尋求同盟夥伴的方式，增強己身國力以抗衡其他強權，特別是崛起中的強權，以確保國際無政府狀態。因此，權力平衡的運作有效維持國家間穩定的關係。然而，權力平衡的出現到底是由決策者精心設計，亦或是國際體系的自然現象，則是傳統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爭論焦點之一。1990年代初期，鑑於現實主義面冷戰結束以及社會建構主義的雙重挑戰，作為嘗試整合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的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認為權力平衡的概念雖然適用滿足現狀並願意維持現有權力分配的國家，但是無法解釋歷史上與崛起中強權結盟的例子，如過去亞洲歷史上的朝貢制度，或稱為扈從(bandwagon)現象。¹⁵

新古典現實主義欲擴大現實主義典範的解釋範疇，便嘗試將決策者個人及國內因素納入其中，並且結合新現實主義的結構層次以及古典現實主義的單元層次分析，形成一個以國內及決策者個人分析層次為主，國際結構分析層次為輔的分析理論架構。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如無政府狀態或極，是無法單獨說明行為與結果，必須透過國家與決策者個人如何看待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關係，經由外交決策的方式行動，影響國際體系的結構關係朝向有利於己國的利益與安全目標發展。簡言之，國際的結構和國家精英的心理因素決定國際政治的變化。而

¹⁵ Randall Schweller,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pp. 72-107.

新古典現實主義在面對國際間經濟互賴程度日益加深的情況下，承認國家間合作的可能，但是認為很難精確地以數據加以衡量，因此表示權力平衡只能提供通則性的認識，於是有了「威脅平衡」與「利益平衡」的觀點。¹⁶（詳見於第二章文獻探討）在此，以制度性平衡模型分析為主，新古典現實主義為解釋的理論視角，相較於 Kai He 所提出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兼備更具有解釋力，而且不會陷入經常變動理論立場的窘境。

貳、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主要是人類追求知識與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而研究方法正是達成研究目的的工具。所謂的研究方法指的是收集且分析資料的程序。科學又可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類，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可按其性質區分成「質性研究法」與「量化研究法」，¹⁷本文的研究方法將採用質性研究法，主要從歷史相關資料以及文獻進行分析。

一、文獻分析法

對於研究國際關係，文獻分析相當重要。文獻分析法主要針對研究主題或對象所發表的文章、專書、政治文件等，進行探討分析。此外，國內外相關的學術著作、期刊或報章雜誌之專欄，則作為資料分析的基礎。本文將透過國內外學者的期刊文獻，進行分析探討，以作為發展研究問題的基礎。

¹⁶ Randall Schweller, 1997,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pp. 927-930.; 王公龍, 2006, 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貢獻與缺失, 《國際論壇》, 第4期, 頁36-41。或參閱郭貞好, 2010, 崛起中的中國與東協之關係：霸權？整合？, 東海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

¹⁷ Edited by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 2002,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nd edition), pp. 1-16.; 胡幼慧主編, 1996,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台北市：巨流。

二、 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社會科學研究最為普遍的方法之一，運用歷史資料和事例進行描述並解釋前因後果關係，藉此可以回顧相關研究主題的歷史事件，按照時間順序以達對相關研究主題之事件，能有概括性的瞭解。以本文為例，透過歷史研究法，回顧過去區域經濟整合的例子，以及相關發展背景，進而探討東北亞區域的經濟整合進程。

參、 章節安排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研究途徑、方法與章節安排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制度性平衡模型

第二節，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第三節，新古典現實主義

第四節，區域主義

第五節，他山之石：東南亞的制度性平衡機制

第三章，包含型制度性平衡：亞太自由貿易區？

第一節，亞太經合會的緣起與近況

第二節，亞太自由貿易區倡議(FTAAP)

第三節，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P4 到 P8

第四章，排他型制度性平衡：東北亞自由貿易區？

第一節，東北亞的經濟整合之可能模型

第二節，中國、日本與南韓的區域策略

第三節，美國的策略與東北亞自由貿易區？

第五章，結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

第二節，省思與未來研究方向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在研究範圍上，可分成「研究標的」及「研究時間」。研究標的部份，粗略將東亞區分為東北亞與東南亞，本文著重「東北亞」的討論，並列為案例研究。在此，東北亞指的是中國、日本以及韓國。當然，美國作為區域外強權，角色亦相當重要。在研究時間上，著重在冷戰結束之後至今，以 1989 年至 2009 年為範圍，1989 年是亞太經合會的成立，探討至今東亞的國際關係發展，特別是東北亞的區域制度發展。

肆、研究限制

不論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任何的科學研究都有其限制，無法真正盡善盡美。在此，本文主要限制在於 Kai He 所設計的制度性平衡模型無法解釋中國崛起之後的東亞國際關係是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或是扈從(bandwagon)。制度性平衡模型基本

上是現實主義的思維策略，強調權力平衡的概念，只是不同於傳統軍事硬性平衡，多了制度(institution)的軟性平衡(soft power)，且加入了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強調區域經濟和外交上的合作。但是，卻無法解釋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甚至是冷戰期間的亞洲區域主義為何發展，亦無法解釋是否存在東亞意識而促成扈從崛起的中國，以便建立屬於東亞的共同體。而且會有不斷更換理論立場和切入視角的缺點，因此採取新古典現實主義學派理論的分析解釋力。但是，由於新古典現實主義在諸多現實主義學派中，仍處於尚在發展中的一支，而且為了擴大現實主義典範的解釋範疇，打破了單元分析層次、結構分析層次與個人分析層次的分野，試圖結合個別優勢，以致增加理論的複雜性，備受批評。此外，新古典現實主義在概念因素的討論上，與社會建構主義有高度的相似性，使得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獨特性同樣遭到質疑。¹⁸其次，本研究主要以國際政治上的考量為主，經濟貿易發展則較不討論，換句話說，不論經貿往來的數據和合作利益為主。

¹⁸ 廖舜右、曹雄源，2007，*現實主義*，於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台北：揚智文化，頁 51。

第二章、文獻探討

由於本文的研究是借用 Kai He 的制度性平衡模型作為分析工具，因此，在文獻探討中，首先描述此模型的基本概念和論述，以便清楚解釋本文研究所要採用的制度性平衡模型，包括為什麼採用以及其分析的依變項和自變項各自為何。第二，因為此模型是根據國際關係理論學派中，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論述結合發展出來的，所以有必要說明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基本論述及其不足之處。然而，有鑑於做為研究論文，應盡量避免理論立場經常變動更換，有必要選擇單一研究切入視角。儘管 Kai He 表示其制度性模型是整合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解釋力，但是深究其中，或許如同此模型的自變項說明所示，採取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說明，會更為貼切。因此，在第三小節主要說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概念。此外，研究題目主要探討東北亞的經濟互賴與權力平衡，是以涉及到東北亞區域整合的部份，而制度的發展與區域主義有所關聯，因此在第四小節則討論區域主義。最後，則是說明 Kai He 在其文中透過制度性平衡模型，所分析的東南亞區域制度性平衡機制，做為東北亞區域的他山之石。

第一節、制度性平衡模型

本文採用 Kai He 的制度性平衡模型(t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model)，其原文以東南亞國協(ASEAN)做為分析探討的案例。Kai He 表示，有鑑於單一理論都有其局限性，是以有許多學者提出「工具箱」(tool box)途徑來分析某些理論，並且建立新的東南亞研究架構。Sheldon Simon 提出透過結合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雙軌」策略，作為解釋東南亞區域的安全。¹⁹William Tow 亦提出「唇

¹⁹ Sheldon Simon, 1995, "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Southeast

亡齒寒的安全」(convergent security)途徑，整合了現實主義/雙邊主義以及制度主義/多邊主義的姿態，以便達到適合解釋亞太(Asia-Pacific)的區域秩序。²⁰而制度性平衡模型正是沿著 Simon 的「雙軌」策略以及 Tow 的「唇亡齒寒的安全」(convergent security)途徑，透過整合理論架構解釋冷戰之後的東南亞安全。在此則是借用此理論模型解釋冷戰後的東北亞區域發展及其安全。奠基於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並結合新自由主義中的互賴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以及通過 Joseph Grieco 的「表達意見的機會」(voice opportunity)假設做一整合。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從現實主義策略的角度來看，必然追求安全，而制度性平衡模型定義制度性平衡機制，即係指透過創立、運用以及支配多邊制度以對抗壓力或威脅。²¹換言之，在此所指的制度，是國際多邊主義的機構，透過機構的制度化及其運作，透過制度機構的功能採取平衡策略。

制度性平衡模型理論之確切細節如下：(1)在高度的經濟互賴之下，促使國家選擇（新）現實主義的平衡策略，即制度性平衡的方式，而非透過傳統軍事聯盟來面對無政府狀態體系下的威脅或壓力；(2)在區域體系下，能力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決定國家如何執行制度性平衡，是包含型(inclusively)或是排他型(exclusively)。在制度性平衡模型裡的依變項(the dependent variable)是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按照新現實主義的思維，儘管扈從(bandwagon)與跳過莊家(buck-passing)的情形也許偶爾會發生。但是，基本上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的行為仍是採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2, pp. 5-24.

²⁰ William Tow, 2001,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²¹ Joseph Grieco, 1995, “The Maastricht Treaty,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the Neo-realist Research Programm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1, No. 1, pp. 21-41.

取「平衡」(balancing)。²²傳統對於平衡的定義主要是指權力平衡，或者指的是在軍事方面的「硬性平衡」(hard balancing)。然而，制度性平衡是新形式的平衡，即「軟性平衡」(soft balancing)的行為模式。許多現實主義的學者利用軟性平衡來解釋冷戰後，在單極體系下國家透過非軍事平衡的方式來對抗美國。²³

根據以上定義，軟性平衡能透過多種方式執行功能，包括藉由多邊制度的方式。由於開始有人研究為什麼國家會選擇加入制度機制來尋求安全，Kai He 用「制度性平衡」來取代「軟性平衡」來解釋國家透過多邊制度所採取的平衡行為。²⁴制度性平衡有兩種形式，分別是「包含型」(inclusively)以及「排他型」(exclusively)平衡。如果說前者是指把目標國綁在同一個制度裡進行平衡的話，那麼後者則是指將目標國排除在制度之外。在包含型制度性平衡中，國家利用規範或規矩的建立限制其他國家的行為，或者控制行為，並且在多邊制度中，操縱議程進而設定議題，使得該議題能滿足其國家利益。在排他型制度性平衡中，國家會鞏固其政治及經濟的一體性來對抗外來國家的壓力。

在制度性平衡模型中有兩個自變項（獨立變項），分別是國家間經濟互賴的程度，以及在國際體系中國家的能力分配（或權力分配）。在此模型中，有三種國際體系做為極(polarity)的類別：單極、雙極以及多極體系。在此，對於權力分配定義極的方式，是

²² Kenneth Waltz,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 126.

²³ Robert Pape, 2005,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pp. 7-45.; T.V. Paul, 2004,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T.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28.; T.V. Paul, 2005,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pp. 46-71.

²⁴ Kai He, 2008, "Institution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pp. 489-518.

採取「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重點在決策者的認知和理解。²⁵ 如同 William Wohlforth 所言，決策的真正關鍵不在權力本身，而在決策者對權力的評估與看法。²⁶ 為了使用權力分配的變項來解釋國家行為，必須了解國家權力如何從國家行為解讀出來。決策者評估權力是了解國家聯結國際體系最好的機制，特別是從個別國家行為表現來理解。是以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或極，可透過國家的決策者的認知來評估，而非單純地權力定量。國家領袖的公開談話以及官方文件是了解國家認知的主要來源。

認知或理解乃基於「現實」和「期待」而形成。一方面，在國際體系內，決策者對權力評估的基礎來自於對於軍事能力的定量指標。另一方面，則是期望影響政策。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未來導向，而且所有的決策者都在賭未來的發展。尤其是後冷戰時期的今天，對於權力的分配充滿著不確定與模稜兩可。儘管美國是國際體系中的唯一超強，面對單極結構會持續多久的問題，仍在爭辯中。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國家要怎麼自處，不僅有賴對當下情況的評估而定，還反映出國家對於未來的期望值。除了權力分配之外，制度性平衡亦強調經濟互賴的影響。這在國際體系中是國家行為很重要的要素，但是，相對地不利新現實主義。回顧 1990 年代的「新-新」辯論中，Helen Milner 以及 Charles Lipson 批評新現實主義過於強調國家行為深受無政府狀態的影響，而忽視國家間的互賴關係(interdependence)。²⁷ 藉由連結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制度性平衡模型將互賴視為另一個評估國家行為的

²⁵ Gideon Rose,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pp. 144-172.

²⁶ William Wohlforth, 1994,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pp. 91-129.

²⁷ Helen Milner, 1993,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in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43-169.; Charles Lipson, 1993,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 in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自變項（或獨立變項）。

按 Robert Keohane 和 Joseph Nye 的定義，互賴指的是「國家之間或不同國家的行為者之間，具有互惠效果特質的情形。」Robert Keohane 和 Joseph Nye 更進一步強調，互賴的互惠效應通常還伴隨著成本獲利，這是因為互賴關係會限制自主權，而且互賴並不保證都是有利的。²⁸是以，國家間的互賴會直接或間接地局限國家行為，於是國家透過軍事平衡和制度性平衡以取得極大化可能的利益、極小化可能的成本。關於軍事平衡，指的是利用聯盟形式以及軍備競賽來應付威脅，但是，這對於互賴關係程度高的國家而言，是不明智的策略，因為國際間友誼關係本來就少，何況這會使得互賴出現負面關係。因此，在高度互賴的情況下，透過多邊制度來達成制度性平衡成為國家平衡策略的首選。²⁹雖然在互賴關係討論中有談及安全或軍事互賴，但是，在此仍聚焦在經濟互賴關係上，主要理由有二：(1)安全或軍事互賴與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緊密相關。此外，軍事互賴亦會導致兩個獨立變項間的互動關係。權力在絕對意義上具有可替代性，因此在此制度性平衡模型中，假設經濟互賴是獨立於軍事權力分配的；(2)傳統現實主義有時亦將經濟現實從現實安全中拉出來。制度性平衡模型將經濟互賴的變項放入現實主義的模型中，整合權力分配與經濟互賴兩種研究。

在制度性平衡模型中，經濟互賴程度分成弱或強。有兩個主要檢視經濟互賴程度的指標，一個是國際貿易流量(international trade flow)，另一個是外國直接投資(FDI)。這些應該被註明清楚，

²⁸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1989,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nd ed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p. 8-9.

²⁹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1989,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nd ed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p. 35-37.

而非粗略地量化互賴關係。此研究透過文獻上下文評估互賴關係，且從兩方面執行運作模型。首先，對權力分配的認知途徑同樣也可以應用在評估互賴關係上。國家間互賴程度越高，決策者就越容易傾向選擇制度上的平衡策略，而非高成本的軍事平衡；其次，掌握國家之間不對稱的動態互賴關係，在此研究中互賴的可操作性成了測量方式。制度性平衡模型的主要假設是，在國際體系中，相互間的權力分配以及國家間的經濟互賴決定國家的行為，不論是硬性平衡或是軟性的制度性平衡。在此平衡模型的核心關鍵是理性標準，理性地計算成本效益，以及國家在制定決策時的期待。決策者對於互賴的認知和理解愈強烈，國家選擇軍事平衡的風險和成本就愈高，而國家就愈可能採取制度性平衡策略。然而，如圖 2-1 所示，在國際體系中，不同的權力分配認知，會決定國家如何執行制度性平衡策略，可能是包含型的制度性平衡，或是排他型的，亦或是兩者都有。

		經濟互賴	
		弱	強
權力分配	單極	權力平衡（霸權帝國式的以及殖民戰爭都有可能）	制度性平衡：排他型（霸權 vs 其他國家） 如：東協十加三、東北亞自由貿易區？
	雙極	兩集團間的權力平衡（超級強權間的戰爭相對而言較不可能）	制度性平衡：在兩集團間是排他型；在集團內是包含型（由兩大超級強權所領導）
	多極	權力平衡（極有可能出現強權間的戰爭衝突）	制度性平衡：包含型（將目標國納入制度） 如：東協區域論壇、亞太自由貿易區？

圖 2-1：極、互賴以及國家平衡

資料來源：Kai He,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註：圖中兩個陰影的部份，是之後章節進一步檢視與討論的案例研究。

如上圖 2-1 所示，當互賴的程度較低時，權力平衡就成了國家主要的行為。在單極體系以及較低程度的互賴之下，霸權國家在任何區域內，如果選擇實行其權力，是會在成本相對低的情況下發動戰爭。在多極體系下，互賴程度低的話，很可能增加強權間的戰爭衝突發生，因為互賴程度低，經濟損失以及安全損害的機會成本相對也降低許多。在雙極體系下，兩大超級強權間雖然具有高度的安全互賴關係，但是相互之間在經濟互賴上的程度就低很多。因此，在此一穩定的體系中，兩大超強間的權力平衡效應，遠大於雙方之間經濟互賴低的負面影響，同時，亦使得兩大超強的戰爭衝突相對而言變得不太可能發生。如果互賴程度高的時候，可以想見，制度性平衡是會取代傳統的權力平衡策略。在單極體系的世界裡，在霸權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具有限制其他國家選擇在軍事上平衡霸權國的效果。而霸權國仍擁有許多行動上的自由，能在任何區域內實行其權力，不論是對該區域很有興趣，或是雖然對霸權國毫無戰略性價值，卻依然賴著不走。其他國家則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扈從(bandwagon)霸權國，跟隨其領導，另一則是透過排他型的制度性平衡來對抗霸權國。然而，在任何制度中希望限制霸權國的行動，總是適得其反，因為霸權國只要不喜歡，就可以打破任何遊戲規則或規範，或者可以說因為霸權國在任何它有加入的制度中具有控制議程的權力。

舉例而言，當前的單極世界，美國是最強大的國家，它忽視了聯合國(UN)處理伊拉克(Iraq)的解決方案，建立一個「自願性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以及發動戰爭對抗伊拉克。因此，在單極體系下，其他國家只有一個選擇以對抗來自霸權國的壓力，那就是透過創立多邊制度，沒有霸權國的加入，以排他型的制度性

平衡，希望藉由制度的統一和團結，使其他國家向霸權國說「不」。在雙極體系世界裡，兩大超強之間的高度互賴，特別是經濟的緊密關係，同樣也形同制度性平衡。經驗上而言，這是兩強之間的互動空間，因為冷戰的特徵主要是兩大集團間不同的意識型態以及相互隔離的經濟關係。然而，理論上，兩大超強之間的經濟互賴程度很可能會高。按此邏輯，兩大超強針對彼此，也會執行制度性平衡，不論是透過包含型的或是排他型的。事實上，兩大超強以及其他小國家在聯合國大會上，也是在實行一種制度性平衡，尤其是在冷戰期間，透過形成和維持一定的投票集團。

在多極體系的世界裡，高度互賴使得制度性平衡更加可能，由於相互間的軍事行動以及對抗外來聯盟的機會成本相對高出許多。儘管包含型(inclusive)制度性平衡比排他型(exclusive)的更受歡迎，但是，這兩者仍是多數國家的可能選項。與包含型制度性平衡相比，排他型的制度性平衡較不友善，而且會限制制度外的國家和制度內的國家之間的相處關係。相反地，任何在高度經濟互賴下的緊張關係，都會對相關國家的經濟和安全帶來傷害，進而使排他型的制度性平衡適得其反。因此，在多極體系和具有高度互賴關係的情況下，儘管排他型制度性平衡仍有可能，但是，包含型的制度性平衡對許多國家而言，是較明智的選擇。經濟互賴和國際衝突之間的關係，已經持續辯論很久了。商業貿易自由主義者相信，經濟互賴會大大降低國際衝突的機會，但是，新現實主義則認為，正因為經濟互賴程度愈高，愈可能增加發生戰爭的危險。

此外，有些學者爭辯表示，貿易在和平的影響上微不足道，而其他人則表示，經濟互賴的角色得視其他變數而定，例如民主，

以影響國家間的和平關係。³⁰Kai He 站在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兩立場間，他認為經濟互賴會增加國家使用硬性權力平衡抗衡其對手國的成本，但是，經濟互賴不必然確保國家之間一定會和平。制度性平衡模型如同新現實主義所表示，並非預測在制度中國家之間一定會採取合作行為。相反地，此模型相信在制度中，國家與國家間會有制度上競爭、對抗、討價還價、協商、妥協以及相互平衡的行為。在此研究中的依變項是國家行為，例如軍事平衡或制度性平衡，在國家間是衝突戰爭亦或是和平手段，而非政治上的結果。然而，如果軍事平衡的方式能帶給他們更多安全的話，經濟互賴不排除國家亦會選擇軍事上的平衡策略。此制度性平衡模型指出，會促使國家選擇制度性平衡策略，是因為高度處於某特定情況之下，而在該體系中，深受理性思考其成本效益的影響才做出的決定。

第二節、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延續上述模型的探討，關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者不同的理論視角，進行討論其各自論述及不足之處。目前，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學派，可以確定有三個學派：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 realism)、結構或新現實主義(structural or neo-realism)以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³¹古典現實主義者深信，認識與瞭解真實的

³⁰ Edward Mansfield and Brian M. Pollins (eds), 2003,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evin Alexander, 2005, *How America Got it Right: The US March to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upremacy*, New York: Crown ; Kenneth Waltz,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Robert Gilpin,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 Rosecrance,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1989,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nd ed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³¹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頁 8。或參閱 M. Hollis and S. Smith, 1990,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d A. Baldwin, 1993, "Neo-liber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25.; J. Steans and L. Pettiford, 200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spectives and*

人性，有助於發現國際政治運作的模式與法則。古典現實主義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 E. H. Carr 與 Hans Morgenthau。Carr 認為探討國際政治需要一套更嚴謹的研究途徑與架構，關鍵就是對「權力」(power)在國際關係中角色與地位的探究。Carr 表示，作為一名國際關係研究者，不應有經由國際組織或道德的約束，便可使世界變成美好的幻想。換言之，國際關係的研究必須回歸「實然面」(what it is)的研究，而非「應然面」(what it ought to be)的陳述。³²Hans Morgenthau 循此方向，更進一步提出現實主義的六大基本原則：(1)政治現象受客觀法則支配，而客觀法則植基於人性；(2)國家用權力來追求利益；(3)國家有追求利益的永恆性；(4)追求利益是國家的道德；(5)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道德不存在；(6)權力政治是獨立自主於其他人類的活動領域。³³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際追求利益超過對於普世道德信念的維護，正是導致國際政治僅被視為權力鬥爭場所的必然結果。古典現實主義認為人性具有追求權力與利益的必然性，此乃現實主義的根源。

然而，1970 年代開始，傳統古典現實主義難以解釋美蘇兩強對抗下的冷戰體系，尤其難以回應兩極體系如何能長久維繫權力平衡狀態。此時 Kenneth Waltz 於 1979 年撰寫《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並以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為前提，透過解析國際體系內國家能力的分配狀態，如何形成國際體系結構，進而解釋國家行為的新現實主義論述（或稱之為結構現實主義）。此外，更提出權力平衡狀態乃國際體系的必然發展之論點。Kenneth N. Waltz 所提出的論點具備簡約性與嚴謹性，被視為國際關係科學化的重要代表作。新現實主義修正了

Themes, London: Longman.

³² E. H. Carr, 1946,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³³ Hans Morgenthau, 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Knopf.

傳統古典現實主義的部份論點，兩者之間的差異如下五點所示：首先，新現實主義以體系結構解釋國際政治，強調國家是國際體系內的主要單元(unit)，而國家的行為則受到結構限制。但是，傳統古典現實主義則始終認為國際之間的互動，不過就是人性私欲的放大，只能算是國家分析層次。只有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以及國家對體系的關係，卻忽略了體系對國家的影響關係。

其次，對於權力的觀點也不太相同。傳統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就是個人的展現，國家的目的就是追求權力極大化。但是新現實主義卻認為權力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手段，認為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追求的最終目標是生存與安全，不是權力。第三，對於國家行為的根源也有不同的看法。傳統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之間的差異性與互動，決定了國家行為與行為結果。而新現實主義則認為，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結構，才是真正決定國家行為的變數。簡言之，國家在體系內權力分配的位置，決定了國家行為及其行為結果。第四，傳統古典現實主義不重視國際經濟因素，反觀新現實主義則正視國際政治經濟的相互關係。第五，傳統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際衝突，認為國際合作的可能性低，但是新現實主義則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國家之間會進行合作。³⁴

換言之，一直到 1970 年代中期以後，Kenneth N. Waltz 等學者開始將論述的焦點著重於國際體系中權力的分布現象，此時「無政府狀態」(anarchy)這一概念才逐漸受到國際關係學界的重視。而新現實主義（或稱結構現實主義）和古典現實主義之間論述的最大不同點，在於前者更關心國際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為者在此一權力分佈的結構中所產生的影響。新現實主義的學者看重國際體系

³⁴胡祖慶譯，Robert Pfaltzgraff, Jr. and James Dougherty 著，1995，《國際關係理論導讀》(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台北：五南，頁 1-11。參閱陳欣之，2003，國際關係學的發展，收錄於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頁 20-21。

的「結構」(structure)，或是體系中「權力分配」(power distribution)的狀態。代表學者有 Kenneth N. Waltz、Robert Gilpin、Barry Buzan 以及 Stephen Krasner 等人。另外，面對冷戰結束以及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vism) 的挑戰，現實主義學者如 Randall Schweller 與 Charles Glaser 等人，試圖將概念因素 (ideational factors) 與非結構因素 (non-structural factors) 的變數再度整合到新現實主義的研究架構中，以便擴大現實主義典範的解釋範疇。此種嘗試將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整合的論述，統稱為新古典現實主義 (neo-classical realism)。新古典現實主義在現實主義典範家族內，仍屬發展中的分支。雖然其嘗試整合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以便有效擴大解釋範疇，但不免遭到理論不夠簡要的批評和質疑。此外，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概念因素的解釋與社會建構主義有高度雷同，影響其理論的獨特性。³⁵

而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學派的產生則來自於對新現實主義的批評。新自由主義是一套衍生於自由主義概念的國際關係分析論點，認為國家具有理性基礎，國家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為滿足人類需要的手段。新自由主義學派接納了國際體系分析途徑，亦接受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只不過對於國際體系的運作機制及可能發展，與新現實主義有不同的解釋。³⁶自由主義是西方發展出來的一種思潮，主要強調個人的自由。自由主義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並且在行為過程中會做選擇，以實現個人最大利益。自由主義稟持民主制度、保障個人自由及所有人在法律之前皆平等的信念。為達到社會公益極大化，國家政府應降低干預個人選擇，因為自由主義相信，透過個人之間的競爭，市場會

³⁵ 廖舜右、曹雄源，2007，*現實主義*，收錄於張亞中主編的《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台北：揚智文化，頁 38-71。

³⁶ Joseph S. Nye, 1988,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2, pp. 235-251.; David A. Baldwin, ed.,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對有限的資源進行最有效的分配，以促進集體的公益 (general welfare)。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並堅信人類會朝向進步的方向前進。自由主義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產生了三種不同的理論思考：民主和平論、理想主義以及新自由制度主義。David Baldwin 亦曾提出四種影響國際關係的自由主義變型：商業自由主義 (commercial liberalism)、共和自由主義 (republican liberalism)、社會學自由主義 (sociological liberalism) 以及自由制度主義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³⁷

面對美國霸權出現衰落徵兆，美國學者 Joseph Nye 等人便開始從自由主義的觀點，思考國際體系維持穩定的其他可能。於是，1977 年，在 Joseph Nye 與 Robert O. Keohane 合著的《權力與互賴》(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一書中，挑戰傳統現實主義的主要理論假設及論點。Joseph Nye 與 Robert O. Keohane 認為國家並非國際體系中唯一理性行為者，國際組織及跨國企業等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關係中同樣發揮重要作用。此外，亦批評現實主義強調國家生存的軍事安全，認為諸如經濟等領域的議題，國家亦賦予極高的政治意義。隨著國際互賴程度提高，Joseph Nye 與 Robert O. Keohane 相信軍事力量已經不再是最有效的外交工具。³⁸ 1984 年，Robert O. Keohane 在新著作《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中針對霸權衰落後國際合作的存廢提出新自由主義的觀點。Robert O. Keohane 認為，國際制度是霸權國所創設的產物，並承接其領導，但是，即使霸權國衰落了，原有的國際制度不必然會瓦解。國際制度不僅是維持國際秩序穩定的手段，

³⁷ David A. Baldwin, ed.,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4.

³⁸ Robert O. Keohane,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同時亦會促成國家之間的合作。³⁹在此之後，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展開了理論的辯論，形成 1980 年代的新新辯論(neo-neo debate)。歷經辯論後，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範圍更加擴大，尤其國際政治經濟學遂成為國際關係研究的重心之一。從原來關注國家權力和衝突戰爭，到開始重視國際合作現象，並討論國家間協調與整合的可能性。

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可以說是古典自由主義概念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最佳典範。新自由主義源自於 1940 年代發展的功能主義，此後依循新功能主義與多元主義的脈絡發展，總結出區域整合與世界經貿互賴的概念，並且相信創設正式與非正式的國際制度能提升國際間互賴的程度，以降低國家間的衝突發生。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存在以下九點的差異：(1)對於國際關係行為者的看法。新現實主義強調國家是國際社會唯一且重要的行為者，而新自由主義表示，不僅只有國家是重要行為者，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者亦在國際關係中至關重要；(2)對於國際無政府狀態的認知。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皆承認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但是，新現實主義強調無政府狀態對國家有極大的制約作用，而新自由主義則表示，國際社會尚有互賴現象，無政府狀態不見得是制約國家行為的單一決定性因素；

(3)關於國際合作。新現實主義不否認國家之間會進行合作，但是，這些合作都是權力考量下的行動，只為了獲取更多權力和利益。新自由主義則認為合作是國際關係中的正常現象，透過國際建制與國際制度，國家間的合作可以成功且達到持續性地合

³⁹ Robert O. Keohane,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作；(4)國家對利益分配上，新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僅關注相對獲益 (relative gains)，認為國家在合作中只關心何者會得到較多的利益，國家最基本的目的在防止他國超越本國實力，一旦合作關係未能帶來較大的利益，或是他國因為合作關係而取得優勢地位，那麼合作關係自然消失。新自由主義則認為，國家會採行絕對獲利 (absolute gains) 的角度，只要透過合作使得所有合作的國家整體利益增加，那麼不論合作的各方獲益相對多少，皆會促使國家走向合作，並維持合作關係；

(5)對於國家偏好的重心。新現實主義認為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體系中，生存、安全及權力才是國家的首要考量，因此軍事因素在國際關係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新自由主義卻認為國際互賴使得戰爭的代價太高，軍事作用已經相對降低；(6)對於國際關係中的經濟與安全，新現實主義雖不否認經濟的重要，但是認為安全仍是國家最終的考量，因此認為國家會為了維持在體系中的生存與地位，而付出較高的經濟代價。新自由主義則認為經濟利益與安全兩者同樣重要，不容忽視；(7)對於政策優先性的看法，新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新自由主義則主張經濟福利優先。新現實主義以權力利益和安全為思想主體，新自由主義則以互利及國際合作為主；

(8)意圖 (intention) 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環境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未來的發展不可預知，對手國的政策與利益設定同樣存在著諸多變數，只會迫使國家更專注於唯一可以確定的國家權力因素，意圖不構成決定的作用。新自由主義則主張不同的價值偏好與利益趨向，影響國家對於他國政策的敏感度，進而產生不同的反應；(9)對於建制 (regime) 與制度 (institution)，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都承認建制與制度在國際

關係中的作用。但是，新現實主義強調無政府狀態的作用，認為在國際社會缺少超國家權威中心，協調或是以強制手段維持國際秩序的情況，國際建制與制度無法產生有效作用。新自由主義則認為國際建制與制度可以在無政府狀態中，建立起國際社會的基本運作規範，以減少國際互動的不確定性。⁴⁰

新現實主義是一種體系層次的分析方法，著重體系內行為者之間的權力分配。而新自由主義則專注體系內的運作過程，研究體系行為者相互作用的權力模式。新自由主義認為經由不斷完善的制度，可以克服無政府狀態下帶來的不確定性，新現實主義則較持悲觀態度，認為國家不可能突破結構的限制，依然會有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分配與平衡體系。以下簡單整理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主要觀點，見表 2-1：

表 2-1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觀點

	新現實主義 (結構現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制度主義)
面對國際無政府狀態 (anarchy)	兩者皆承認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 強調在此狀態下，國家如何求生，相信衝突的本質與競爭的必然。	強調在此狀態下國家間能否合作，認為資訊充份流通能減少誤判以增加合作可能。
代表人物	Kenneth N. Waltz	Joseph Nye 與 Robert O. Keohane
利益	國家在國際關係中獲取相對利益 (relative gains)，即考量自己所得是否比他國多。	在國際間獲取絕對利益 (absolute gains)，考慮在合作過程中是否得到利益，不比較得到比他

⁴⁰ David A. Balswin, ed.,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obert Spring Powell, 1994,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pp. 313-344.; Robert Jervis, 1999,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pp. 42-63.

		國多。
國家安全與經濟	兩者皆認為「安全」是國家主要目標，但是	
	重視個別國家安全，軍事尤其重要。	重視整體的國際安全，軍事和經濟都重。
國際合作	兩者皆承認國際有合作的可能，但是	
	國際間的衝突仍大於合作	國際間合作經常發生
國際制度與機制	兩者皆承認國際制度與機制有其功能	
	無政府狀態是國際社會的本質，缺少超國家權威，國際制度與機制難有功效。	國家是理性的行為者，國際制度與機制能有效解決無政府狀態下的不確定性，減少衝突發生，增加利益。

資料來源：參閱蔡育岱、譚偉恩，2007，《國際關係》，台北縣蘆洲：晶華，頁 17。

Kai He 表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各自有其解釋力不足之處。新現實主義過於強調東亞區域外的強權角色之重要性，例如美國、中國及日本，但卻無法說明冷戰之後，區域安全的制度化發展。如果制度不重要，為什麼許多國家會投注大量資源與精力於制度設立呢？此外，如果制度只是如同古典現實主義者所說的，是強權國擴張自己利益與影響力的工具，又為什麼東亞區域的東南亞國協(ASEAN)能在冷戰之後，成為建立區域多邊制度化的先驅呢？⁴¹誠如 Joseph Grieco 所言，制度化在國際政治中，難以連結到結構現實主義。⁴²新自由主義則強調東協或亞太經合會(APEC)的合作特徵，能刺激區域經濟和外交上的合作，如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的創建等等。然而，新自由主義卻無法解釋國際制度的時間與變數，以東南亞區域為例，為什麼多邊制度得等到冷戰之後才出現？新自由主義同樣也沒有回答，在什麼樣的情況

⁴¹ Kai He,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p. 490.

⁴² Joseph Grieco, 2002, "Modern Realist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 Harvey (eds), *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 65-78.

下，制度能幫助國家克服無政府狀態下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的關注。⁴³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英國學派(The English School)亦對國際制度有其獨到的看法。英國學派定義國際制度是「一組習慣並實際形成共同目標...包括...權力平衡、國際法、外交機制、強權的管理系統，以及戰爭等。」⁴⁴一方面，英國學派對於制度，有著與社會建構主義相似的理解，認為制度就是種社會實踐，使得「世界擁抱在一起」(the world hang together)。⁴⁵另一方面，亦強調主權、領土以及介於英國學派與現實主義之間共享的制度要素。⁴⁶Kai He 為了減少國際關係理論學派的缺失，將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做一個整合，並設計出制度性平衡模型來解釋在制度中的國家行為。Kai He 是以東協為例，而本文在此挪用該模型，分析東北亞區域制度。

回顧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文獻論述，從理論觀點來看，(新)現實主義考量的是相對獲利以及權力平衡等安全困境的問題，對於經濟合作抱持著反對的態度。按此邏輯，合作是不可能的，但是，為何仍會有許多國際合作的情形？而且冷戰結束之後，更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尤其 1990 年代後期，東亞各國更是進一步嘗試合作，對此，現實主義似乎難以有合理的解釋。反觀新自由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絕對獲利，認為國際間是有合作的可能。但是，新自由主義卻無法解釋既然東亞區域有亞太

⁴³ Kai He,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p. 491.

⁴⁴ Hedley Bull,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71.

⁴⁵ John Ruggie, 1998,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pp. 855-885.

⁴⁶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2003, *Regions and Power: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經合會，為什麼無法深化制度？又為什麼有亞太經合會，卻出現東協加三？而且，新自由主義很難說明為什麼東協加三排除「西方」國家？然而，不同於 Kai He 希望採取既有新現實主義的觀點，也有新自由主義的解釋力。本文研究的立場同意 Aaron Friedberg 的看法，認為亞洲深受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觀念影響。但是，依然同意國際間的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逐漸加深，新自由主義學派強調的經濟合作是存在的。然而，為避免在解釋分析時，經常在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變換理論立場，深究上述模型架構，發現或許採取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視角，才是最符合此制度性平衡模型的解釋理論。因此，本文研究主要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做為研究視角。

第三節、新古典現實主義

新古典現實主義崛起於 1990 年代初期，係屬現實主義學派範疇中面對國際變化調整幅度最大的理論學派，因此也形成最晚，代表學者有：Randall Schweller、Gideon Rose、William Wohlforth、Stephen Walt、Thomas Christensen、Charles Glaser、Jack Snyder 以及曾出版《後美國世界》⁴⁷一書的 Fareed Zakaria 等人。根據學者廖舜右表示，新古典現實主義試圖擴大現實主義典範的解釋範疇，對於概念因素與非結構性因素有著不同於新現實主義（或稱結構現實主義）與古典現實主義的強調程度。⁴⁸在概念因素上，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企圖與動機並非固定不變，藉由「滿意現況」與「不滿意現況」的修正主義做為補充與調整新現實主義的論述。Schweller 認為，滿意現況的國家一般而言會傾向接受當

⁴⁷ 參閱杜默譯，Fareed Zakaria 著，2008，《後美國世界》，台北：麥田出版。或參閱李賜賢，2009，《後美國世界：群雄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政治科學季評》，第 23 期，頁 17-20。

⁴⁸ 廖舜右、曹雄源，2007，《現實主義》，收錄於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台北：揚智文化，頁 38-71。

下的國際秩序以及權力分配，而權力平衡就是維持現存秩序的政策；至於不滿意現況的國家則傾向挑戰或改變當下的國際秩序。⁴⁹換言之，一國對另一國的扈從(bandwagon)，或與之結盟，亦是一國企圖維持現狀或者改變現狀的一種方式。可見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相對獲益與絕對獲益的概念與新現實主義者不盡相同，對此 Schweller 所示，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權力平衡只能提供通則性認識，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更能有效解釋國家的行為。⁵⁰

在非結構性因素上，學者廖舜右表示，新古典現實主義透過運用軍事技術上的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以及攻守的可區分性(offense-defense distinguishability)，進一步強化結構因素的解釋力。⁵¹亦即 Glaser 所示，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當軍事技術在攻勢方面具有優勢地位時，武器管制(arms control)就被視為是重要的政策工具；相反地，在守勢方面具有優勢地位時，武器管制的重要性就會降低。再者，當攻勢與守勢的軍事技術與裝備屬於可區分，且國家的企圖與意志容易判斷時，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可能性會降低，國際合作變得較為可能；相反地，如果屬於不可區分時，安全困境的情況會惡化，國際間合作變得較不可能。⁵²根據學者鄭端耀表示，基本上，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是現實主義理論的維護者與捍衛者，認為冷戰結束之後至今，現實主義之所以遭到批評，是新現實主義而非現實主義本身。因為新現實主義本身就存在不易解釋國際權力變遷的問題，面對蘇聯瓦解、冷戰結束，無法提出警示與解釋。⁵³

⁴⁹ Randall Schweller,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pp. 72-107.

⁵⁰ Randall Schweller, 1997,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pp. 927-930.

⁵¹ 廖舜右、曹雄源，2007，*現實主義*，收錄於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台北：揚智文化，頁 38-71。

⁵² Charles Glaser, 1995,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pp.50-90.

⁵³ 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頁 115-140。

其中，新現實主義（意即國際體系結構理論）受到的主要指責有：首先，無法對冷戰結束提出事前的警示或預測。其次，無法解釋國際間權力的變化，如為何兩極體系結構無法維持？再者，無法解釋國家外交政策行為發生變化。第四，忽略國內政治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理論無法解釋為何沒有國際衝突的壓力，蘇聯與東歐共黨國家會瞬間瓦解。第五，忽略決策者對外交政策和國際關係的影響力，進而無法解釋為何蘇聯在國際權力結構不變的情況下，推動新思維外交，改變蘇聯，造成冷戰時的兩極體系崩塌瓦解。⁵⁴同時，這些亦為新現實主義的解釋力不足之處，遂於後冷戰時期受到強烈的批評和挑戰。

然而，傳統的古典現實主義在其霸權權力競逐與消長的論述，便可為蘇聯瓦解與冷戰結束的國際關係變化提供合理解釋，其所強調的國家利益與外交的重要性，正可對新現實主義之國際體系論述的不足，以及後冷戰時期各國的外交行為活動，提供補充說明的效果。⁵⁵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現實主義並非如新現實主義只著重國家的「物質能力」，而是將國家能力分為「有形的能力」與「無形的能力」，後者包括後實證學派所指的理念、認同、規範和原則等。⁵⁶就層次分析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採取多層次分析，不僅認為國際體系權力結構對於國家對外行為依然是重要因素，而且認為還須加入決策者和國內政治的因素。就本體論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採取二元論的立場，認為國家能力包括有形和無形

⁵⁴ Charles Kegley, 1993, "The Neoidealist Momen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alist Myth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2, pp. 131-146.; Charles Kegley, 1994, "Symposium: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pp. 155-278.; John Lewis Gaddis, 199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pp. 5-58.

⁵⁵ Robert Gilpin, 1980,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 Wohlforth, 1995,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pp. 91-129.

⁵⁶ Hans J. Morgenthau, 1954,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Y.: Alfred A. Knopf, Chap. 9.

的能力，在國際體系層次分析上以物質因素為主要依據，而國內和決策者層次則包含精神和理念的層面。在認識論上，新古典現實主義繼承新現實主義的實證研究途徑，以獲取可靠的知識，不過也接受後實證學派的建構立場，認為國際關係的現象係由互動及相互主觀所構成。在方法論上，新古典現實主義採取科學研究方法，以建立一般性的通則和定律，同時亦承認傳統研究方法的價值。⁵⁷簡言之，新古典現實主義既接受新現實主義的權力結構論，也納入古典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主張。

根據學者鄭端耀的整理，新古典現實主義有七項基本理論主張以及五項研究方法架構。主要理論如下所述：首先，新古典現實主義承接新現實主義的國際無政府狀態的觀點，不同的是，認為無政府狀態以及在此狀態下是衝突或合作並非確定不變，得視特定時期的國際關係與國家間外交政策行為等情況而定。⁵⁸其次，新古典現實主義視權力為國家能力的資源，認為權力決定國家行動，但是不等於國家外交行動。簡言之，對於權力在國際關係的看法與古典現實主義相似，強調國家的目標是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追求有利於國家的利益與提升國際影響力。

再者，與新現實主義相同，新古典現實主義承認國際權力分配是主導國際關係運作的核心力量，因此認為國際權力分配正是影響外交政策的最主要因素。然而，新古典現實主義不同於新現實主義特別強調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反而比較重視相對權力。換言之，對於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概念，主要著重在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關係。第四，由於國家不是單一理性的行為實體，儘管國際權力分配是決定外交政策行為的最主要因素，卻仍有相當的限

⁵⁷ 參閱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1期，頁115-140。

⁵⁸ Gideon Rose,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p. 171.

制存在，因此無法有效決定實際外交政策行為。第五，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行為係由決策者所制定，而關鍵就在決策者對於國際權力分配的認知(perception)。⁵⁹然而，缺點是決策者的認知與國際權力分配之間，可能存在落差的變化空間。第六，新古典現實主義接受當國家相對權力增加時，對外的行動能力也會增加，但是兩者之間並非等號，亦不是自動產生的過程，得視國內政治結構而定。換言之，國內政治結構如果無法運用國家權力展現在對外政策的行動上，那麼依然無法反映權力分配的影響。第七，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面對國際局勢的變化，一國的外交政策不必然會隨此變動而採取相對應的權力平衡策略。因為一國在國家目標以及外交政策的利益上，有著不同的考量而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在國際權力分配以及國家外交政策行動之間，主要的區別在於分為「滿意現況者」與「不滿意現況者」，進而衍生出不同的對外行為。⁶⁰

由上述基本理論論述可知，新古典現實主義將國際關係的研究重新拉回到對「人」的重視，強調國家的外交政策行動同時受到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的影響，而國內政治則包括決策者的認知和國內政治結構等等。⁶¹除了基本理論論述之外，還有研究方法的架構如下所示：一，首先根據實證經驗與個案研究的方法，按照從小到大、從國際到國內、從整體到個體的方式，循序漸進的探討。二，然後檢視國際或區域體系層次的權力結構分配的狀態，觀察權力結構與國際行為的互動關係，如果兩者之間呈現不一致的情形，即為值得探討的問題。三，接著將研究重心轉到國內政

⁵⁹ Gideon Rose,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p. 147. ;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2002,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1, p. 4.

⁶⁰ Randall Schweller,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pp. 99-107. ; Randall Schweller, 1998,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 3.

⁶¹ 參閱鄭端耀, 2005, 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 《問題與研究》, 第 44 卷, 第 1 期, 頁 115-140

治層次，而國內政治大致可分成三個主要變數：決策者認知、政治結構以及政策考量，並討論何者是影響國際行為與國際權力結構的變數。四，然後進行個案研究，此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重要的一環，透過個案來檢視權力結構與國際行為的關係，進而試圖建立外交政策的過程。五，最後是根據研究結果驗證理論的假設關係。⁶²然而，學者鄭端耀亦表示，要以個案研究來建立理論太過牽強，況且，新古典現實主義尚在發展階段，相信不會僅限於以上的論述，往後還會有更新的論述發展。

在此，本文循著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方法架構，從大到小、從國際到國內循序漸進的步驟，先檢視國際或區域體系層次的權力結構，再到國內決策者的認知等等，探討東北亞區域的制度性平衡機制的可能發展。同時，按 Kai He 的制度性平衡模型，將制度性平衡的策略分成包含型和排他型，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觀點進行分析解釋，並探索東北亞區域是否如同東南亞區域存在制度性平衡的機制。此外，有鑑於本文探討的是區域制度的發展，牽涉到區域主義的範疇，因此在下一小節說明區域主義，最後才是 Kai He 在其原文中的東南亞區域案例，做為本文的他山之石。

第四節、區域主義

由於本文討論的是東北亞的區域制度的可能發展，且與區域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是故，認為有必要在此概略說明區域主義的演進。隨著冷戰結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簽訂、歐洲聯盟(EU)的整合、南錐(Mercosur)的形成以及亞太經合會(APEC)的出現，都引發關於區域主義的廣泛討論。區域主義及整合的浪

⁶² Gideon Rose,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pp. 166-167.

潮從歐洲大陸發生，並於冷戰結束之後出現第四波區域主義浪潮，亦侵襲到東亞區域。東北亞的區域制度發展，正是深受區域主義浪潮的影響。是故，在此說明區域主義的定義、發展以及相關文獻回顧。1990 年代之後，隨著冷戰的結束，區域主義逐漸成為政策制定者、企業以及學者重視的議題。然而，「區域」(region) 的定義不易界定，哪些地域範圍才成為區域，仍具有爭議。區域所代表的空間，可以是一國內的一個或是多個區域，也可以擴大到數個國家所組成的區域。區域，一般定義是指一群座落於相同地理位置的國家，例如，有些觀察家認為亞太(Asia-Pacific) 是一個單一區域，但其他人則認為是兩個區域，甚至有的認為亞太是超過兩個區域的集合。在國際政治上，區域是一定的地理範圍，亦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具有認同感的國家所組成的區域。一般而言，區域具有鄰近性、相似性、包容性、重疊性以及相互依存性的特點。⁶³換言之，除了地理位置的關係外，不少學者亦堅持共同區域的成員，同樣享有文化、經濟、語言或政治上的連繫。對此，Kym Anderson 和 Hege Norheim 表示，對於區域儘管沒有理想的定義，但是務實而論，應以主要陸塊的定義為準，再根據文化、語言、宗教和發展階段的狀況從中劃分。⁶⁴

有的學者則不以地理因素為區分標準。社會建構主義者認為同一區域的國家是因為共享相同的認為意識，而非地理位置。

⁶⁵Peter Katzenstein 對區域的看法，認為區域的地理要素並非全然

⁶³ Richard E. Baldwin, 1997, "The Causes of regionalism," *The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7, p. 865. 或參閱郝培芝、羅至美，國際整合與區域主義，收錄於張亞中主編，2007，《國際關係總論》，二版，台北：揚智文化，頁 380-381。

⁶⁴ Kym Anderson, and Hege Norheim, 1993, "History, Geography,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edited by Kym Anderson and Richard Blackhurst,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pp. 19-51.;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p. 591.

⁶⁵ Charles A. Kupchan, 1997, "Regionalizing Europe's Security: The Case for a New Mitteleuropa,"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edited by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09-238.

的「真實」、「自然」或「必要」，區域應是社會所建構的，加入政治因素使其「形成」，甚至進而「開放」與「改變」。⁶⁶然而，有的學者則以簽訂的經貿協定為區域範圍，而非根據地理位置。以上到目前為止，都是對於「區域」如何定義的討論，關於「區域主義」的定義亦有些討論。除了區域的定義具有爭議外，區域主義 (regionalism) 和區域化 (regionalization) 的概念同樣需要釐清。有些分析定義區域主義是經濟流動的過程，在一組既有的國家間（相同區域）快速流動，而且，比在一些國家和座落於其他地方的國家間流動地還要快。區域內的流動可能通過經濟因素而增長，例如比起區域外的成長率要高，同時藉由對外的經濟政策使區域內國家之間貿易自由化，並且對於第三者加以歧視與排斥。⁶⁷

對於區域主義的研究，Albert Fishlow 和 Stephan Haggard 明確地將區域化和區域主義做了一個區分。所謂區域化 (regionalization) 指的是區域的經濟流動過程；而區域主義 (regionalism) 則是指透過經濟政策的合作以及國家間相互協調的政治過程 (political process)。⁶⁸換句話說，區域主義是一種政治過程，由國家所引導的合作計劃，亦是政府間對話和簽訂條約的結果。區域化則是指集中於區域的經濟流動，是經濟整合的過程，但並非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事先決定的計畫。⁶⁹簡言之，區域主義強調由國家所主導的

⁶⁶ Peter J. Katzenstein, 1997,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edited by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44.

⁶⁷ Paul Krugman, 1991, "The Move to Free Trade Zones," i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rade and Currency Zones: 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Kansas City, Mo.: Federal Reserve Bank, pp. 7-41.; Jeffrey Frankel, Ernesto Stein, and Shang-Jin Wei, 1995, "Trading Blocs and the Americans: The Natural, the Unnatural, and the Super-Natur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47, No. 1, pp. 61-95. 當然，區域主義亦可為經濟和政治的力量結合所造就而成。

⁶⁸ Stephan Haggard, 1997,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edited by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20-49.; Beth V. Yarbrough and Robert M. Yarbrough, 1997, "Dispute Settle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gionalism and Procedural Coordina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edited by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34-163.

⁶⁹ A. Hurrell, 1995, "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1, No. 4, p. 334.; Shaun Breslin, and Richard Higgott, 2003, "New

「由上至下」(top-down)的運作模式，進而產生一個功能性的區域認同；區域化則是呈現出地理鄰近區域內國家的有機發展，意即經由自然地政治和經濟上的互動作用，產生「由下至上」(bottom-up)的運作模式。以歐盟為例，歐洲的整合過程，可以視為是「區域化」與「區域主義」同時進行。而東南亞國協則由於缺乏歷史和文化上的共同點，難有「由下至上」的區域化認同過程，僅只有各國領導人推動整合的共識，是為「區域主義」。⁷⁰

大部份的區域主義文獻主要著重於優惠貿易區(Preferential Trade Area, PTA)的好處上，尤其是對於成員國及全世界而言。然而，優惠貿易區(PTAs)在會員之間具有貿易自由化特徵，但卻也同時歧視第三者。⁷¹除了 PTAs 帶來利益效應促成區域主義發展之外，經濟學者亦表示尚有一種問題需要注意並考慮的，即 Bhagwati 所指的「動態路徑的問題」(the dynamic time-path question)。⁷²總而言之，很明顯地，當多邊制度(或系統)功能弱化時，PTAs 之於多邊體系可發揮最可觀的效果。⁷³Frankel 和 Wei 則表示，「視國際情況而定，區域主義在自由化進程上，的確起了或多或少的幫助。」⁷⁴而且，所謂的情況或環境，亦包含政治情勢。這點是大多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ia Europe Journal*, No. 1, p. 177.

⁷⁰ Julie Gilson, 2002, *Asia Meets Europe-Interregionalism and the Asia-Europe Meeting*, UK: Edward Elgar, pp. 2-3.

⁷¹ 誠如 de Melo 和 Panagariya 指出，「在優惠貿易區的區域主義下，優惠只擴及會員國，很明顯是歧視。同時，此亦表示在會員國之間貿易只會更加自由。」參閱 Jaim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 1993, “Introduction,” in *New Dimens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edited by Jaim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21.

⁷² Jagdish Bhagwati, 1993,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n Overview,” in *New Dimens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edited by Jaim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2-51.; Jagdish Bhagwati and Arvind Panagariya, 1996, “Preferential Trading Areas and Multilateralism---Strangers, Friends, or Foes?” in *The Economic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edited by Jagdish Bhagwati and Arvind Panagariya,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pp. 1-78.

⁷³ Kyle Bagwell and Robert W. Staiger, 1997,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 Tariff Coope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5921,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p. 27-28.

⁷⁴ Jeffrey A. Frankel and Shang-Jin Wei, 1998, “Regionalization of World Trade and Currenci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edited by Jeffrey A. Franke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89-219.

數經濟學研究所忽略的。

回顧歷史，過去經歷了四次區域主義的浪潮。第一次發生在十九世紀末，歐洲貿易快速興起，並成為全世界主要商業重鎮。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在許多層面上歐洲已具備單一市場的功能。不可諱言，工業革命之後，技術不斷創新，不僅便利國家之間的貿易活動，亦促成了許多關稅聯盟(customs union)和雙邊貿易協定的建立，對歐洲整合產生很大的影響。第二波區域主義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除了歐洲促成優惠貿易區(PTA)的建立之外，美國也在 1930 年代促成了 24 個雙邊貿易協定。第三波區域主義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期間，這段期間，歐洲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經濟互助會議(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以及許多由開發中國家所組成的區域貿易聯盟。第四次區域主義浪潮出現在冷戰結束之後。因為國際關係中的權力與安全結構已經改變。國際社會的唯一超強美國，亦積極促進並參與區域主義的發展。同時，PTA 前所未有的被當成促進和鞏固聯盟國家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手段。⁷⁵

區域主義最明顯的形式就是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主要設想聯盟國家之間的地理位置是相近的，而且貿易量較大，所以彼此給予對方優惠利益後，預計將無形中擴大貿易大餅。⁷⁶只是區域主義全都是好處沒有缺點了嗎？首先討論好處，有三點好處：⁷⁷(1)區域貿易協定(RTA)最直接的利益是

⁷⁵ Edward D. Mansifeld, and Helen V.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pp. 589-627.

⁷⁶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頁 72。

⁷⁷ Joongi Kim, 2003, "Sub-Regionalism, Regionalism, Trans-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ies," *Asia Europe Journal*, No. 1, pp. 183-196.

「貿易創造」(trade creating)的效果。所謂的「貿易創造」,是指某些物品以前不進口,因為在國內的相同產品受到保護,國內價格比國外進口的還要低。而今這些物品卻從新成立的聯盟內其他國家進口,只因國內產品不再受到保護,進口產品價格較低;⁷⁸(2)RTA 是建立多邊主義的基礎。因為多邊主義牽涉的國家及議題較多,要達成共識實在不容易。透過參與國家數較少且較有效率的 RTA,將刺激區域內成長,進一步克服多邊主義的障礙;(3)RTA 將增進合作與安全。透過大型貿易網絡,國家之間越趨緊密,彼此之間互賴關係越深,共同維持安全與和平的信念就越強。除此之外,區域主義之 RTA 也可能造成不利的效果,有四點缺失:⁷⁹(1)首先,RTA 也可以導致「貿易轉移」(trade diverting)。所謂「貿易轉移」,指的是原來某些貨品的進口來源是某個第三國,因為其價格最低。簽訂 RTA 之後,那些貨品則必須自聯盟內其他國家進口,價格可能較高,而不是原先最低價格的第三國,只因為其不屬於聯盟。⁸⁰換言之,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可能被拒絕這種競爭關係;(2)RTA 可能被視為對多邊組織的運作造成直接的威脅,或是會深化分裂。如果區域貿易聯盟已經鞏固,不同聯盟之間的談判就不容易妥協;(3)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區域主義發展會更惡化這種現象,如擴大貧富差距;(4)RTA 是拖延了不可避免的過程。區域主義發展浪費了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如弱化 WTO 的地位和權威。⁸¹

關於新區域主義,指的是區域的動態發展所致的現象。新區

⁷⁸ Edward D. Mansifeld, and Helen V.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p. 592.

⁷⁹ Joongi Kim, 2003, "Sub-Regionalism, Regionalism, Trans-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Inter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ies," *Asia Europe Journal*, No. 1, pp. 183-196.

⁸⁰ Edward D. Mansifeld, and Helen V.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p. 593.

⁸¹ Joongi Kim, 2003, "Sub-Regionalism, Regionalism, Trans-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Inter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ies," *Asia Europe Journal*, No. 1, pp. 183-196.或參閱宋興洲, 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頁 74-78。

域主義強調區域並不一定完全受限於固定的地理疆界範圍，主要是區域的社會建構。社會建構主義者 Wendt 認為，區域化是一種過程，如果脫離過程，那麼結構就不存在，也不會有因果性力量 (causal power)。⁸²Peter Katzenstein 認為區域主義是「一套由語言和政治論述所塑造的認知實踐，而語言和政治論述則是透過概念、隱喻、類比的建造來決定區域如何定義。這些認知實踐則可作為對行為者的界定，那些人應包含（或排除）在區域之內（或之外），因而能夠讓區域實體和區域認同萌生。」⁸³總而言之，新區域主義強調區域的社會建構，區域並不需要固定的疆界範圍。而且，新區域主義也不主張只有國家才能發展區域。非國家行為者，如企業組織，在區域發展上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區域治理 (regional governance) 的角色也應運而生，這是在新區域主義思維下興起的觀念。⁸⁴

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須先理解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現象的影響。科技日新月異，貿易的互通有無是全球化的積極展現。如同《世界是平的》的作者 Thomas Friedman 所言，全球化就是一種把世界從大變中、從中變小的過程 (process)。⁸⁵而且，它穿透國家疆界無法阻擋，不受主權政府的控制。如果全球化浪潮是不可逆的歷史發展趨勢，那麼必然會對當前世界各國產生深刻的影響。面對全球化現象，基於自衛本能，各國開始提升自我國家競爭力，也就是「在地化」 (localization) 的思維。根據 Karl Marx 的歷史辨證理論，會產生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辨證互動關係。⁸⁶根據上述思維

⁸² Alexander Wendt,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pp. 391-425.

⁸³ Peter J. Katzenstein, 2000, "Regionalism and Asia,"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5, No.3, pp.353-368.

⁸⁴ Kanishka Jayasuriya, 2003, "Introduction: Governing the Asia Pacific--beyo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4, No. 2, pp. 199-215.

⁸⁵ Thomas Friedman, 2006, *the world is flat* (London: Penguin Books), p. 11.

⁸⁶ 參閱 Karl Marx, 1959,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H. Selsam, 1970, *Dynamics of social change* (N.Y.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與脈絡，同時考量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國家政策，勢必將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互動關係加以整合，而成為「區域主義」發展的驅使動力⁸⁷。東亞區域面對全球化，也產生回應的「在地化」力量。東亞國家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創造了驚人的經濟成就，快速發展的景象令人瞠目結舌。而東亞地區也陸續出現過不少區域主義整合的構想，只是大多數仍處於研究階段或口頭倡議，實際執行運作並不多。如表 2-2 東亞區域主義相關倡議與發展。

表 2-2 東亞區域主義相關倡議與發展

年代	倡議或參與者	主要內容
1961	聯合國	提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OAEC)倡議
1965	日本	提出太平洋自由貿易區(PFTA)倡議
1967	澳、紐、日	倡議成立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
1975	美國福特總統	提出新太平洋主義(Neo-Pacifism)倡議
1977	日本首相福田糾夫	提出太平洋主義(Pacifism)倡議
1979	美國參議院	提出關於建立亞太地區經濟組織研究報告
1980	日本	提出環太平洋合作構想與環太平洋經濟圈
1980	美、澳、日	倡議並成立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
1981	東協	提出東協與太平洋共同體研究報告
1988	日本	提出東亞經濟環(EAER)倡議
1989	美國	提出太平洋經濟共同體(PEC)倡議
1989	澳、紐、日	倡議並成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1990	馬來西亞	提出東亞經濟集團(EAEG)
1991	馬來西亞	將東亞經濟集團改稱東亞經濟核心會議(EAEC)
1991	美國老布希總統	提出太平洋共同體(PC)
1993	美國柯林頓總統	提出新太平洋共同體(NPC)倡議
1997	日本財相宮澤喜一	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
1998	東協	開始召開東協 + 3(APT)非正式高峰會
2001	東亞展望小組	提出東亞共同體(EAC)
2001	菲、澳、日、中	提出並成立博鰲亞洲論壇(BFA)
2002	東亞展望小組	提出東亞自貿區、東亞投資區與東亞高峰會

⁸⁷ 楊志誠，2007，全球化衝擊效應下東北亞區域情勢發展的分析：衝突或合作，《社會科學戰線國際政治研究》，第2期，頁148-149。

2002	中國	提出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
2003	日本、東協	簽署東京宣言，確定邁向東亞共同體目標
2004	中國、東協	簽署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AFTA)
2004	東協 + 3	建議並決定於 2005 年召開首屆東亞高峰會
2005	東協 10 + 6	召開首屆東亞高峰會
2005	馬來西亞	提出亞盟(AU)
2006	日本	提出 16 國亞洲自由貿易區倡議
2006	美國	提出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與亞太公約
2008	南韓	總統李明博倡議中日韓三邊貿易談判
2009	中、日、南韓	倡議簽署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

資料來源：參閱蔡東杰，2007，《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頁 190。並且論者自行更新整理。

有些學者表示，主要原因是因為區域外強權美國的介入，造成不小的政治影響。由於美國企圖阻止任何單一國家崛起，或是抵制任何將美國排除在外的整合倡議，以保護美國在此區域的經濟與戰略利益，導致東亞區域整合相當緩慢。⁸⁸表 2-3 是東亞次區域主義發展概況。東亞區域主義發展大致可分成東南亞國協(ASEAN)、東北亞區域以及開放性區域主義的亞太經合會(APEC)三種發展。1977 年，東南亞國協締結優惠貿易協定(PTA)，象徵著東亞在次區域整合上有了突破。關於 ASEAN 的緣起，簡述如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與越南共產勢力在中南半島爆發戰爭，法國戰敗，由於懼怕共產勢力的擴張，迫使美國於 1954 年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the 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此組織的主要目的是軍事防禦，但是成效不彰，遂於 1977 年正式宣告壽終正寢。1961 年，馬來亞(1963 年後才稱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於曼谷成立了「東南亞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主要目的是進行經濟、文化和社會的交流與合作，並非出於政治上的考量。不過，由於成員太少，而且東

⁸⁸ Ted G. Carpenter, 1998, "From Intervener of First Resort to Balancer of Last Resort," in Selig Harrison and Clyde Prestowitz, eds., *Asian after the Miracle*,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p. 294.

南亞各國之間又存在著重大的紛爭，成效有限。1963年，東南亞協會因為馬來亞和菲律賓在沙巴主權爭議上，發生衝突，並且相互斷絕關係，導致東南亞協會停止活動。

1966年有兩個組織成立，一個是東南亞經濟發展部長會議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MCEDSEA)，另一個是亞太委員會 (Asia Pacific Council, APC)。前者是由日本發起創立的，目的是日本分配援助東南亞，以交換東南亞國家對日本外交政策的支持。但是，中立國不願參加，參與的國家又都是反共國家，而且，東南亞國家不願意直接透過該組織與日本交涉，是以1975年之後，東南亞經濟發展部長會議已經不再召開了。⁸⁹後者，亞太委員會 (APC) 是由南韓總統朴正曦所提議創立，當中沒有美國參與，參與國家都是反對共產勢力，此組織代表著圍堵共產中國，到了1974年就不再運作。⁹⁰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東南亞國家有感於彼此團結合作的重要性，泰國外長於是向印尼外長提出創設新的區域合作組織的概念，也獲得同意。最後在泰國外長積極穿梭與協調之下，1967年8月8日，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新加坡各國外長在曼谷發表「曼谷宣言」，宣佈成立「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 ASEAN)，並且取代原有的「東南亞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東協的成立，有三個目標：首先，是降低東協內部的緊張；其次，減少外國勢力對區域的影

⁸⁹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頁164-165。或參閱 Peter J. Katzenstein, 1997,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edited by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6-17.; Susumu Yamakage, 1997,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sia-Pacific's Reg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ited,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283.

⁹⁰ Peter J. Katzenstein, 1997,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edited by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7.; Susumu Yamakage, 1997,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sia-Pacific's Reg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ited,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283-284.

響；第三，則是促進會員國之間社會經濟的發展，以作為抵抗共產勢力叛亂暴動的基礎。簡言之，東協成立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將東南亞地區置於東西方集團陣營紛爭之外，成為一個中立地區。

1976年2月24日，東協在峇里島簽訂親善及合作條約，此條約的主旨在於加強會員國之間的多邊關係，並且建立下列「基本原則」：(1)所有國家相互尊重獨立、主權、平等、領土完整以及國家認同；(2)每一個國家都有權利存在，免於外來干涉和控制；(3)不干涉及他國家的內部事務；(4)透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5)放棄威脅和武力使用；(6)彼此間有效合作。⁹¹而此基本原則，正是東協建立的基礎，強調經濟、社會、文化的合作與發展，強化區域團結和相互依賴。往後東協持續擴張發展，於是有所謂的「東協模式」(ASEAN way)之稱。⁹²「東協模式」的運作原則備受矚目，但是至今仍缺乏任何官方定義。目前所知，此模式是保持對各會員國主權「不干涉原則」，進而形成建立共識的形態，換言之，東協的所有決定都必須要達成共識。「東協模式」在外交上，則是「不衝突主義」，採取擱置具爭議性的議題，以不影響眼前需要解決重要事務為原則。⁹³

表 2-3 東亞次區域主義發展概況

年代	重要發展
1967	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正式成立
1971	東協發表「和平、自由與中立區(ZOPFAN)宣言」
1976	首屆東協高峰會，通過「東協友好同盟宣言」並締結「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

⁹¹ George O. White III, 2002, "Foreigners Beware? Investing in a Jungle with Many Predators: The ASEAN Investment Area,"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7, pp. 150-160.

⁹² Robert Garnaut, 1998, "ASEAN and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World Trad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4, No. 3; 蔡東杰, 2007, 《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頁165。

⁹³ George O. White III, 2002, "Foreigners Beware? Investing in a Jungle with Many Predators: The ASEAN Investment Area,"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7, pp. 160-161.

1977	通過「優惠貿易安排協定」(ASEAN-PTA)
1992	東協高峰會通過設立「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構想並於翌年啟動進程
1993	世界銀行報告提出「中華經濟區」(CEA)概念
1994	成立「東協區域論壇」(ARF)
1995	東協領袖簽署「東南亞無核區公約」(SAENWFZ)
1998	通過「東協投資區框架協定」,預計在2010年正式成立
2000	日本學者提出「東亞地中海自由貿易區」倡議
2002	吳作棟提出「東協經濟共同體」(AEC)構想,「東協自由貿易區」成立
2003	中國提出「三國自由貿易區」與「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倡議
2003	東協通過「第二次巴里協定」,決定在2020年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東協安全共同體與東協社會與文化共同體,以作為「東協共同體」(AC)基礎
2004	中日韓通過「三國合作行動戰略」
2006	新加坡、紐西蘭、智利以及汶萊四國簽署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SEP)正式生效。
2010	中日韓領袖峰會承諾2012年完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聯合研究,2011年於韓國建立三國合作秘書處,以加速自由貿易談判,建立單一經濟區。

資料來源：參閱蔡東杰，2007，《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頁166。並且論者自行更新整理。

即使存在整合東亞區域的論述，而且東協亦有與中、日、南韓三國間的協商（ASEAN + 1 與 ASEAN + 3），但是，短期間內東北亞與東南亞仍處於各自形成區域整合的發展。可從下列例子發現，例如東協於2003年「第二次巴里協定」中，預定在2020年前成立「東協經濟共同體」，同時，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也跟著透過高峰會發表「推進三邊合作聯合宣言」。只是東北亞區域的部份，相對於東南亞區域而言，區域主義發展的速度較為緩慢，這是因為東北亞區域的政治環境較為複雜的關係。不過，作為東北亞區域核心國家的中、日、南韓三國早在1997年金融風暴之後便

展開密切合作。以學術合作為例，2004 年時，中日韓三國組成聯合研究小組，開始對「三國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進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強勁的崛起力道，使中國不僅在 2003 年起積極倡議「三國自由貿易區」，甚至認為建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的時機已經來臨。關於東北亞區域的合作進程，將在第四章深入說明討論。

由於受到歐美地區紛紛深化經濟合作程度的刺激，加上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浪潮的影響，⁹⁴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第一個重要轉捩點出現在 1989 年亞太經合會(APEC)的成立。根據 APEC 的自由化目標與推進方式，其所謂「開放性區域主義」大致具有以下幾點特徵：⁹⁵(1)最主要的特徵是，對於非成員的開放性，亦即其內部推動自由化政策的成果同樣適用組織外部的非成員國家；(2)對於次區域集團具有包容性，例如對於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與東協自由貿易區；(3)賦予成員單邊行動的靈活性，並且以自願性為基礎的協調合作；(4)以漸進途徑來推動其自由化目標。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開放性主義」是 APEC 的特徵，但也因為如此與眾不同的運作方式，直接凸顯出 APEC 不過是個符合美國全球利益的代理性組織而已。⁹⁶關於 APEC 的緣起與近況發展，將在第三章深入說明討論。然而，如同上一小節論述的，新自由主義存在難以說明解釋的困境，區域主義的浪潮亦無法說明為什麼東北亞區域的制度發展，不像歐洲或是東南亞國協那樣，統一整合甚至是深化制度的發展。在此，本文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並透過 Kai He 的制度性平衡模型來分析東北亞區域的發展。

⁹⁴ Richard Stubbs, 1998,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versus Globalization," in William Coleman and Geoffrey Underhill, eds., *Regionalism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pp. 68-69.

⁹⁵ 張伯偉，2001，《APEC 貿易自由化及其影響》，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頁 50-52。

⁹⁶ 陳勇，2006，《新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一體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71；蔡東杰，2007，《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頁 191-192。

第五節、他山之石：東南亞的制度性平衡機制

在分析討論東北亞是否存在制度性平衡機制之前，有需要參考 Kai He 在其原文中以東南亞為例子進行說明。Kai He 表示，特別在冷戰之後，東南亞的排他主義特質從區域的多邊制度擴散開始顯露出來，東南亞國協(ASEAN)正是主要驅動力。此外，尤其是東協區域論壇(ARF)以及制度化的東協加三（東協加上中國、日本以及南韓；APT），當然，還包括了新出現的東亞高峰會(EAS)。東南亞國家在冷戰後，依賴多邊制度以維持其安全上，似乎變得有自信多了，而不再尋求與強權的結盟。然而，為什麼東協國家在冷戰之後，倡議並促進其多邊制度？根據現實主義的觀點，特別是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制度在國際政治是個錯誤。⁹⁷然而，新自由主義者則表示，東協是東南亞國家透過降低交易成本、增加透明度以及提供焦點上，促進區域合作的功能性工具。⁹⁸以下先概述說明東南亞國協的發展，並說明東南亞區域的制度性平衡機制，分別是安全方面包含型的東協區域論壇，以及經濟方面排他型的東協加三。

東南亞國協(ASEAN)，簡稱東協，於 1967 年成立，原始會員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以及泰國。汶萊於 1984 年加入，越南於 1995 年加入、寮國與緬甸則是 1997 年加入，柬埔寨是 1999 年加入。東協的前身乃是 1961 年 7 月由馬來西亞、泰國與菲律賓三國所組成的東南亞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SA)。但是，因為沙巴領土的爭議導致東南亞協會的失敗。

⁹⁷ John Mearsheimer, 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pp. 5-49.; Michael Leifer, 1999, "The ASEAN Peace Process: A Category Mistak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1, pp. 25-39.

⁹⁸ Robert Keohane and Lisa Martin, 1995,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pp. 39-51. ; Sheldon Simon, 1995, "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8, No. 1, pp. 5-24.

成立一個新區域組織是 1966 年 4 月，印尼與馬來西亞在曼谷談判關係正常化之後的直接產物。之後，泰國、印尼與馬來西亞三國的外交部長同意透過更密切的合作，來預防區域內的國家再度爆發對抗衝突。因此協議成立一個取代東南亞協會的新區域組織。最終在相關國家的努力之下，於 1967 年 8 月簽署《東協宣言》(ASEAN Declaration)，自此則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以及泰國五國組成東協。此外，《東協宣言》把東協的目標明確地分成兩點：一，在公平與夥伴關係的基礎上，透過共同的努力加速區域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與文化的發達，並為建立一個繁榮且和平的東南亞國家共同體奠定基礎；二，藉由對於正義與法規永久的尊重，促進區域國家間和平與穩定，並遵守《聯合國憲章》的相關原則。

根據 Kai He 的分析，將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視為東南亞區域的包含型制度性平衡機制。ARF 是最大的多邊安全對話論壇，其包含了亞太區域所有的主要國家。歐洲的強權亦代表歐洲共同體(EC)參與 ARF。東協對東協區域論壇的政策是包含型的制度性平衡策略，主要目標針對中國以及美國。如圖一的右下角所示，在國際體系是多極體系，並且經濟高度相互依賴的情況下的相互平衡策略。冷戰結束，並且在 1991 年兩大超強間的對立終結之後，改變了區域的權力結構，帶給東協國家挑戰與機會。東協國家面對到美國動搖了安全承諾，以及中國的快速崛起兩個主要的安全重大變動。冷戰之後，美國是世界唯一超級強權，對此，單極的世界於焉產生。然而，美國的經濟相對衰落時，在 1990 年代初期，嚴重影響了其對於亞洲盟邦的安全與經濟承諾。在軍事上，美國與日本及南韓共同承擔維持美軍在亞洲盟國領土上的部署成本。在經濟上，美國促進整個亞洲區域更加開放市場，以便刺激經濟發展。在政治上，美國長期提供好處給東

協國家，但是，在人權以及民主上祭出棒子。美國對於東協國家而言，在政治以及文化的主權上，都被東協視為「闖入的外來者」。

99

雖然東協國家很感謝美國在區域安全上的正面積極角色，但是，對於美國在承諾上的能力和意願感到很失望，似乎是美國的權力衰落，並且改變其戰略利益。因此，如何引起美國的興趣，繼續在區域安全上扮演正面的角色，同時又能極小化美國政治介入的負面影響，成了冷戰之後，東協的主要策略挑戰。相對於美國野心的衰落，中國在經濟上以及軍事上，是很明顯地正在崛起當中，特別是經濟方面，平均保持 8% 的成長率。是以，許多人相信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及承諾消逝，將在此創造出權力真空狀態，有可能造成區域上新的軍事衝突和權力鬥爭。隨著經濟與軍事實力的提升，在東協國家眼中，中國很自然地成為填補此權力真空最有可能的候選人。此外，由於中國與一些東協國家之間仍存在尚未解決的爭議，如南中國海等議題，是以加深了東協國家認知的「中國威脅」(China threat)。¹⁰⁰

然而，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正在轉變當中，同樣為東協國家帶來希望。亞洲世紀以及亞洲奇蹟的論述，在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出現並散佈。除了中國驚人的經濟成長之外，日本亦於 1980 年代開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也有不少人相信日本的經濟實力，如果可能必要的話，很輕易地便能取代美國並成為軍事強權。此外，亞洲四小龍（香港、南韓、新加坡和台灣）以及三個東南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也在 1990 年

⁹⁹ Douglas Stuart and William Tow, 1995, "A US Strategy for the Asia-Pacific: Building a Multipolar Balance of Power System in Asia," Adelphi Paper, no.299,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¹⁰⁰ Mark Valencia, 1995,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delphi Paper, no.298,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代初期創造出經濟奇蹟。¹⁰¹隨著美國發展的相對趨緩，而東亞及太平洋等國的快速成長，可以想見，亞太地區最終在區域權力上，將重新分配。如果 20 世紀是美國的世紀，那麼 21 世紀將屬於亞洲的世紀。¹⁰²如果普遍相信中國的崛起而美國衰落，那麼多極體系的世界將取代美國所領導的單極世界。這對東協國家而言，很合理地是個機會，能在未來多極區域體系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根據新現實主義的論點，廣泛認知道中國崛起且美國衰落的多極體系，是引導東協國家與美國促成軍事聯盟的主要關鍵變數。然而，儘管東協國家與美國維持傳統的軍事合作，而且印尼甚至在冷戰之後與澳洲簽訂雙邊安全協定，但是，東協並不完全順著現實主義的路子走。¹⁰³

主要理由是在冷戰之後，東協在立場上由於逐漸深化與中國的經濟相互依賴。中國自從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之後，儼然成為亞洲區域經濟上最主要的成長引擎，是以中國展現出令人驚豔的經濟表現。在此，中國有三個主要吸引東協的經濟要點：首先，第一是中國具有廣大市場，可以刺激東協的經貿成長；第二，中國的經濟快速成長，提高了東協未來投資的意願和期待。中國廣大的市場和經濟機會，引起東協的興趣，進而軟化東協對北京的安全政策疑慮。換言之，東協不可能依賴傳統的軍事平衡來面對中國崛起，因為如此一來，經濟成本和戰略風險都太高了；第三，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良好，可幫助東協降低來自西方國家的政治壓力，例如美國。

東協國家在 1990 年東協後部長會議期間，提出建立一個區域

¹⁰¹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

¹⁰² Jim Rohwer, 1995, *Asia Risi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John Naisbitt, 1995, *Megatrends Asia: The Eight Asian Megatrends that are Changing the World*,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¹⁰³ Sheldon Simon, 1996, "The Parallel Tracks of Asian Multilateralism," in Richard Ellings and Sheldon Simon (eds),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New Millennium*, Armonk, NY: M.E. Sharpe, pp. 13-34.

新安全架構。東協的對話夥伴，澳洲和加拿大提出新的安全對話論壇，如歐洲安全合作會議(CSCE)，可以包括東協以及其他亞太區域的國家。但是，最初接受到的回響大多數是負面，表示不贊同。因為亞洲的安全議題太複雜，難以形成歐洲安全合作會議(CSCE)的模式。然而，美國於1991年與菲律賓的軍事談判失敗，意謂著美國將於隔年1992年撤出該區域。當美國撤退成為事實，東協國家將不再保持沉默。在1992年的東協峰會上，如何「保持將美國留在區域內」，成為主要議題。一些東協國家，如新加坡和泰國，與美國簽訂雙邊的軍事合作協定，以確保美國在區域當中。此外，東協國家開始考慮多邊安全對話架構，並且更進一步地將美國利益納入區域之中。簡言之，除了保持將美國留在區域內之外，東協同樣面臨必須透過多邊制度「壓低中國氣燄」的挑戰。因此，可以說東協的意圖是將美國拉進區域內，並藉由美國來平衡中國權力。更重要的是，東協採取具體的行動，於1993年東協後部長會議中促進多邊安全對話以便與中國交往，並且進而平衡之。東協促使更正式的東協區域論壇成立，以便在亞太地區討論政治及安全上的議題。是故，1994年成立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並召開第一次正式的東協區域論壇會議。自此東協區域論壇變成東協國家在冷戰之後，納入美國利益且面對中國威脅的一個很重要的制度工具。

ARF 的廣泛地制度設計以及安全議題吸引美國的興趣，而且，在 ARF 當中討論的安全議題不僅局限在東南亞，而是幾乎全球政治有關衝突熱點的議題。儘管台灣與中國兩岸之間潛在的危機因為中國的強烈反對，不在 ARF 的正式議程討論當中，但 ARF 的確為有關的各方提供很好的機會和平台，特別是美國和中國。¹⁰⁴

¹⁰⁴ Kai He,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p. 503.

換言之，ARF 做為亞太地區的多邊安全對話機制，提供會員國一個討論相關的區域政治與安全議題的論壇，並發展可以維持和平、安全以及避免衝突的合作辦法。ARF 分為第一軌道(First Track)和第二軌道(Second Track)。第一軌道是由各國官方代表出席討論；第二軌道則是由各國的學者專家出席討論亞太區域問題。

除了 ARF 之外，東協還有透過東協加三（東協加中國、日本以及南韓，ASEAN Plus Three, APT）高峰會，以執行其排他型的制度性平衡策略，建立在 1997 年，為了促進東南亞以及東亞的經濟合作，並處理在 1997 到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美國壓力。不同於 ARF 這包含型的制度性平衡機制，東協的東協加三策略是刻意排除美國的排他型制度性平衡。亞洲金融風暴使得東協在冷戰之後的多極與「亞洲世紀」的美夢破滅。東協只好繼續接受世界仍是單極，並且美國仍是最高唯一超強。因此，APT 是東協面對單極的制度性回應，並且是在高度經濟互賴下的制度性平衡模式。東協加三 APT 的前身是「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 EAEG)。東亞經濟集團由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於 1990 年提議將東協與東亞幾個經濟體結合所成立。1995 年，東亞經濟集團更名為「東亞經濟核心會議」(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 EAEC)。然而，之所以 EAEG/EAEC 失敗的原因有兩點：一是需要明確的目標和共識，但是沒有，相反地，多數東協國家及日本希望與美國保持關係以便獲取利益；二是東協對於美國仍有高度的經濟依賴。¹⁰⁵

1997 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東亞國家對於美國的態度與反應

¹⁰⁵ Kai He,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p. 506.

感到相當失望。¹⁰⁶東亞地區遭到金融風暴的襲擊，同樣造成各國政治動蕩，官員領袖紛紛下台。對於亞洲提出亞洲貨幣基金的倡議，美國強力反對。對此，東南亞區域掀起反美聲浪。面對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 1999 年科索沃事件，東協國家改觀了，體會到美國的衰落和多極體系的出現之事實，仍然遙不可及。美國依然強盛。於是危機之後，東協國家開始思考如何強化己身的經濟安全，並減少對美國的經濟依賴。而且，東協並非唯一受害者，日本、南韓和中國也是。因此，在東協的積極推動下，東協十國與中、日、韓三國在吉隆坡舉行了首次的非正式會晤，由此形成的十加三機制成為東亞經濟合作的主導框架。並在 1997 年 12 月，召開第一次非正式的東亞高峰會，即東協加三(APT)。自此，東亞國家不想再如此依靠區域外國家了。1999 年東協與中日韓發表《東亞合作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正式啟動十加三的機制，成為東亞經濟合作的管道。2000 年，APT 第一次具實質成就是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以期建立區域的資金貨幣合作。

「東協加三」(APT)的合作，最初合作倡議以金融為主，有三個大範疇：一是推動東協加三非正式政策對話；二是加速技術及實質上的行動，如儲備金互相支援；三是加強資本市場的發展，如亞洲債券市場倡議。其中，最受到重視的是設立亞洲貨幣基金(AMF)。2000 年 5 月及 10 月，在泰國清邁首次的 APT 經濟部長與貿易部長會議當中，探討建立東亞地區的補充性融資安排(Supplementary Regional Financial Arrangement)，意圖對區域內可能的金融危機有所防備。東協其實早已由其秘書處建立並執行監

¹⁰⁶ Douglas Webber, 2001,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pp. 330-372.; Mark Beeson, 2003, "ASEAN Plus Three and the Rise of Reactionary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2, pp. 251-268.

控機制，以因應有關國家國際收支問題之需要。其中亞洲開發銀行(Asia Development Bank, ADB)給予大力支持。但是，過去東協的貨幣互換協議，充其量只是一種早期金融預警制度，功能有限。擴大中日韓三國，並以東亞的名義實行的經濟合作，希望採取進一步所謂「區域措施」(regional measures)來讓該協議有實質的效果。同年，各國也決定成立三個「十加一」的雙邊領袖會議機制，並探討由「十加三」國家共同成立東亞政治組織與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在願景的設定上，2001年於汶萊召開「十加三」高峰會議上，一個由東協加三當事國的傑出學者與企業領導者所組成的東亞展望小組(East Asian Vision Group, EAVG)的報告，正式提出有關「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的報告。由於希望「東協加三」(APT)不僅是一個區域經濟論壇，而是更有機制的合作組織，2004年11月，東協加三高峰會與會各國同意，將東協加三高峰會改名為「東亞高峰會」，並建立一個專家小組對東亞自由貿易區(EAFTA)進行可行性的研究。

然而，對東協國家而言，APT合作是平衡西方歐美的勢力，而APT不同於EAEG/EAEC有兩點：首先，第一點是EAEG/EAEC主要目標要建立包含所有亞洲經濟體（如香港和台灣）的經濟集團，然而，APT則聚焦在主權政府之間的金融與經濟合作；其次，第二點是EAEG/EAEC窄化地強調最初倡議的貿易自由化，相對於APT則逐漸從最初的金融合作，擴大其政治與安全議題。不同於ARF所實行的包含型制度性平衡策略，將所有強權都納入其中。東協國家希望排他型制度性平衡策略是包含所有東亞國家，但是排除美國在外，以便平衡來自西方的壓力，特別是從美國而來的壓力。東協國家企圖利用APT強化其在區域中的影響力，並且希望增加其與美國及西方在議價上的權力。

對於中國而言，APT 在區域上不僅是平衡美國的排他型制度性平衡，也是與東協交往的包含型制度性平衡策略。2004 年在 APT 會議上，中國提議一個新「東亞高峰會」(EAS)的架構，成為區域經濟與安全議題的論壇，並建立一個沒有西方的亞洲集團。於 2005 年在馬來西亞召開第一屆東亞高峰會。而且，中國希望強化 APT 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合作，並且不再納入新成員。可以說，EAS 是 APT 的擴大平衡策略，針對美國而來。然而，Hadi Soesastro 表示，東協的制度性平衡效果，不論是 APT 或 EAS 都得視美國是否改變東協國家政策而定。¹⁰⁷

¹⁰⁷ Hadi Soesastro, 2006, "East Asia: Many Clubs, Little Progre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69, No. 1, pp. 50-53.

第三章、包含型制度性平衡：亞太自由貿易區？

延續第二章的論述，在此，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方法架構，探討區域體系的權力結構，並且透過權力分配的結構與國際行為的互動關係，以及國內政治的決策者認知，探討後冷戰時期的東北亞區域體系。同時，借用 Kai He 的制度性平衡模型來探討東北亞區域的平衡策略。第三章主要是討論包含型的制度性平衡。Kai He 用「制度性平衡」取代「軟性平衡」來解釋國家透過多邊制度所採取的平衡行為。¹⁰⁸在此「包含型」(inclusively)的平衡中，國家利用規範或規矩的建立限制其他國家的行為，或者控制行為，並且在多邊制度中，操縱議程進而設定議題，使得該議題能滿足其國家利益。換言之，是指把目標國綁在同一個制度裡進行平衡，相反地，第四章的排他型制度性平衡則是指將目標國排除在制度之外。此章主要案例討論是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假設此多邊制度為東北亞的包含型制度性平衡機制。首先概述說明亞太經合會(APEC)的發展緣起與近況，其次進一步探討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倡議，最後則是描述最新發展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由於起始是新加坡、紐西蘭、智利和汶萊四國經濟夥伴協定，因此又稱之為 P4)。

第一節、亞太經合會的緣起與近況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美國不僅成為超級軍事強權，在經濟實力上亦相當穩定。到了 1990 年代，日本在對外貿易、海外直接投

¹⁰⁸ Kai He, 2008, "Institution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pp. 489-518.

資以及外援上，成了美國最大的勁敵。此外，亞洲許多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加上蘇聯威脅驟降，種種變化使得亞洲國家的實力與美國的落差正逐步減少。尤其在經濟方面，日本強勁相當於美國的實力。此時，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區域經濟更是突飛猛進。但是，其實美國在 1950 年至 1960 年間，除了亞洲開發銀行與東南亞國協(ASEAN)之外，對於建立太平洋區域性國際組織態度並不熱衷。然而，1960 年代初期，日本學者、官員以及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等國代表，在日本經濟研究中心舉行會議，共同討論區域整合的可能性，會中日本代表沖田三郎(Okita Saburo)提出「太平洋經濟合作」(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PEC)的想法，但是從未實現。

1966 年，日本政府採取主動，提議建立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隔年 1967 年，日本又提出建立「亞太合作圈」(Asian-Pacific Sphere of Cooperation)。可惜的是，1960 年代，日本數次提出建議，希望達到增進亞洲區域整合的目的，都未能如願。Crone 認為，之所以亞洲各國並不積極加入區域性組織，可能的原因有二：首先，這些區域性組織的權力關係令人懷疑；其次，各國的價值觀不同，是以難以合作。¹⁰⁹然而，1967 年日本首相三木武夫(Miki Takeo)提議成立太平洋自由貿易區，雖然被否決了，無形中卻促使美國、日本、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五國企業領袖發起成立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the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PBEC)，成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濫觴。到了 1970 年代後期，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希望將整合擴大到整個亞太地區，成立一個能強化太平洋共同體意識的新組織。於是透過日本首相和澳洲總理的聯合發起，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the Pacific

¹⁰⁹ Donald Crone, 1993, "Does Hegemony Mat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cific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4, p. 513.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PECC)便於 1980 年宣佈成立，只不過性質仍屬民間或半官方，是以成效有限。¹¹⁰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在形成一個開放式區域主義的機制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¹¹¹

美國霸權於蘇聯解體後進入強盛時期，在此期間，並未獲得環太平洋國家的同意便對亞太秩序做出安排。Crone 表示，美國之所以願意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與經濟財(economic goods)，是基於圍堵共產主義之全球戰略上的考量。在政策方向上，則是基於美國的利益，而非亞太區域的利益為出發點。因此，亞太地區的秩序運作，基本上是建立在美國所選擇的夥伴雙邊關係上，儘管經濟方面並非美國安全利益策略的範圍。但是，一切仍由美國所主導。然而，1980 年代末出現了三大轉變。首先，美國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實力開始無法獨力掌控全球，加上日本在各方面的發展超前崛起，與此同時，軍事議題逐漸不再是各國的優先次序。是以，美國與亞太區域國家將焦點轉向區域。其次，亞洲新興工業國快速成長，引起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國家的憂慮，並視其為威脅。東協國家亦開始向外發展。¹¹²第三，隨著歐美經濟整合風潮，太平洋區域的國家亦開始動搖，此外，亞洲區域有些國家經濟快速發展，洋溢崛起的興奮。

是以觀念的改變以及權力的移轉已為亞太區域提供一個機會和環境，建立亞太區域經濟組織。於是，澳洲總理霍克(Bob Hawke)從 1988 年為期約一年的時間，以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為

¹¹⁰ Peter J. Katzenstein, 1996,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1, No. 2, p. 138.

¹¹¹ Vinod K. Aggarwal, 1993, "Build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Asia-Pacific," *Asian Survey*, Vol. 32, No. 11, pp. 1033-1035.

¹¹² Richard Higgott, Richard Leaver, and John Ravenhill, 1993, "Introducti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acific," in R. Higgott, R. Leaver, and J. Ravenhill (eds.), *Pacific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1990s: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pp. 1-14.

基礎，開始外交遊說的工作。終於在 1989 年提出成立一亞洲各國政府間經濟合作組織的構想，相繼獲得各國的同意，並且允許美國和加拿大的參與，於該年 11 月果實成熟，正式召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簡稱亞太經合會）的第一屆部長級會議，¹¹³來自日本、美國、加拿大、南韓、澳洲、紐西蘭以及 6 個東南亞國協國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的代表，同時參與這個盛會。目前已有 21 個會員。主要的秘書處設在新加坡。由於種種政治因素，在亞洲地區尚未出現較大型且具制度化的國際組織。但是，隨著亞洲各國在經濟上的卓越成就，加上全球經濟整合趨勢的推波助瀾下，亞太經合會應運而生。只不過在第一屆部長級會議時，僅被定位為各地區高級代表之間非正式的諮商論壇。換言之，亞太經合會(APEC)是一個純粹的諮詢性論壇而已。¹¹⁴

但是，Mckay 表示，亞太經合會在區域貿易和投資上，應該扮演重要的核心角色，如下幾點關鍵點：首先，因為區域裡經濟快速發展，難免在擴大出口市場上出現貿易緊張關係，因此亞太經合會應該扮演舒緩區域貿易的緊張關係。其次，應當支持並擴大區域內市場的整合過程，包括創造一個穩定的區域貿易環境，以鼓勵所有國家發展更國際導向的發展策略，特別是指中國。第三，亞太經合會在分享資訊以及交換議題看法意見上，應扮演實質性的角色，以增強區域內各國之間的信心。¹¹⁵此外，在 1991 年的漢城宣言中提到亞太經合會有三大支柱：首先，加強開放多邊

¹¹³ Richard Hiddott ed al, 1990,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n Evolving Case Study in Leadership and Cooperation Buil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45, No. 4, pp. 823-866.; Donald Crone, 1993, "Does Hegemony Mat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cific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4, pp. 520-524.; Susumu Yamakage, 1995, "An Asia-Pacific Community as a Regional Order: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APEC," *Asia Pacific Review*, Vol. 2, No. 1, pp. 117-126.

¹¹⁴ Vinod K. Aggarwal, 1993, "Build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Asia-Pacific," *Asian Survey*, Vol. 32, No. 11, p. 1035.

¹¹⁵ John Mckay, 2002, "APEC: Successes Weaknesses, and Future Prospects,"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pp. 42-53.

的貿易體系；其次，透過便利化與自由化的過程，達到亞太區域的自由與開放的貿易投資環境；第三，強化區域內的發展與合作。在 1994 年的印尼茂物(Bogor)會議上，正式宣告「開放區域體系」的觀念。亞太經合會的各國成員同意開放貿易是經濟成長的基礎，亦即以「開放性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為基礎，透過自願性的過程，共同移除經濟合作與整合上的障礙，使亞太地區達成自由貿易投資。是以，在此共同體中，全體將稟持開放和夥伴的精神深化發展，支持開放的貿易體系以對世界經濟的擴張做出貢獻。¹¹⁶

開放性區域主義對亞太經合會成員的意義，代表著成員之間的非歧視性，並以減少貿易障礙為主。然而，各會員國認知觀點不盡相同。有些認為是指無條件的非歧視性，有的則認為非歧視性得存在互惠性(reciprocity)才有。事實上，亞太經合會並非優惠貿易協定。相反地，主要是以世貿組織(WTO)為基礎的多邊形式，達到自由化與協商功能。此外，自願性自由化過程(voluntary liberalization process)，指的是個別成員可自行採取單邊自由化。只是，如果整體共同一致的自由化，能使所有成員獲取比個別行動要更大的利益。¹¹⁷這些是亞太經合會的功能運作關係。之後，1997 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為此，亞太經合會提出「自願提前部門自由化」(Early Voluntary Sector Liberalization, EVSL)以因應金融危機。2001 年，面對美國 911 事件，亞太經合會的討論焦點從經濟合作，轉至軍事安全以及應付恐怖主義。此後，每年的會議討論內容儘管空洞，但是仍對東北亞，乃至亞太地區的經濟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努力，有著積極的作用。

¹¹⁶ John Mckay, 2002, "APEC: Successes Weaknesses, and Future Prospects,"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pp. 42-53.

¹¹⁷ Robert Scollay, 2001, "The Changing Outlook for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World Economy*, Vol. 24, No. 9, pp. 1135-1160.

亞太經合會發展至今已有 21 國。成員國包括：東北亞三國（日本、南韓、中國），東南亞七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汶萊），北美洲二國（美國、加拿大），南美洲三國（墨西哥、秘魯、智利），環太平洋三國（澳洲、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東亞二國（俄羅斯、台灣），以及香港。¹¹⁸APEC 不同於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一極富彈性的經貿論壇，其決策過程以「共識決」和「自願性」為原則。並且，經由各成員國之間相互尊重以及政策對話，達成區域內共享經濟繁榮的目標。在此前提發展下，似乎不易形成自由貿易區。Peter Katzenstein 亦認為 APEC 只是一個諮詢性的論壇，儘管可能隨著時間成長，進化成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論壇，但是，依然無法達成經濟整合。並且表示亞太經合會只是幫助會員體之間，進行資訊、研究和諮詢的交換罷了，反而比較可能成為亞洲版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¹¹⁹

APEC 採用自願性原則，具論壇性質，其所作的決議並不具拘束力。但是，APEC 不是一個貿易區塊，而是一開放性的區域協會，意即各會員國政府之間所達成貿易自由化的協議，將適用於其他非會員國，此即為開放性區域主義的精神。1991 年的第三屆 APEC 部長會議，會中發表「漢城宣言」，正式表明成立的宗旨。明文表示：「維持亞太地區的經濟成長、增加會員體之間經濟的相互依存度、加強開放多邊貿易體系，以及在不損害其他經濟體利益的前提下，減少各會員體之間商品、服務業貿易和投資之障礙。」無庸置疑，APEC 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多邊官方經濟合作論壇之一，

¹¹⁸ 亞太經合會屬於政府間組織，所以各會員國皆以經濟體的身份入會。台灣則於 1991 年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 的名義，成為亞太經合會的成員。

¹¹⁹ Peter J. Katzenstein, 1996,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1, No. 2, p. 139.

其成員遍及東北亞、東亞、東南亞、大洋洲、北美及中南美地區共 21 個重要經濟體。會員體如前所述。會員均以「經濟體」(Economy)的身份參與，此為 APEC 的特殊設計。另外，尚有「東南亞國協」(ASEAN)、「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以及「太平洋島嶼論壇」(PIF)三個國際組織為其觀察員。此外，APEC 的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的與會身份，亦於 2005 年正式由「來賓」身份升格為「參與者」。

APEC 的體制屬於「論壇」性質，其運作以「共識決」(consensus)和「自願性」(voluntary)為基礎，經由各成員間相互尊重以及開放性的政策對話，達成尋求區域內共享經濟繁榮的目標。對此，APEC 強調「經濟技術合作」(ECOTECH)議題，期盼透過具體的經濟技術合作計畫，縮短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經濟體之間的發展差距。而這已成為除了「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與「貿易與投資便捷化」任務以外的第三大支柱。此外，APEC 部長會議大約在每年 9 月至 11 月之間舉行，主要任務是決定 APEC 活動的大政方針，並討論區域內的重要經貿議題。部長會議下設有資深官員會議，作為 APEC 運作的核心機制。出席該會議的代表，皆為各經濟體主管部會的次長級或司長級官員，主要任務在執行部長級會議的決議，並建立工作程序與監督協調 APEC 各級論壇的工作。補充說明，資深官員會議設有 11 個工作小組、4 個委員會、2 個次級委員會以及 8 個特別任務小組，負責推動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便捷化、經濟技術合作、性別整合、電子商務、人力資源發展、能源、工業科技、運輸、海洋資源保育、電信暨資訊、觀光、漁業、農業，以及中小企業等領域的合作。

此外，假使各工作小組在推動實務工作上，認為有提高協調層次的必要，亦可召開各專業部長會議。另外，自 1993 年開始，

APEC 主辦成員皆在部長級年會之後召開 APEC 經濟領袖會議。會中均採納部長級年會通過的重大決議，經由發佈領袖宣言的方式，公佈 APEC 未來發展的政策方向。而且，自從 1995 年起，成立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並由各經濟體派大、中、小型企業代表組成，直接將民間部門的意見提交至 APEC 各經濟體的領袖們參考。儘管亞太經合會因為開放性區域主義，不僅促進區域上的發展，而且也助長了全球貿易的自由化。然而，亞太經合會卻經常徒有計畫、宣言和行動議程，而沒有行動和實質結果。可能的困境如下：¹²⁰第一，在目標和方式上缺乏共識。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等西方國家偏好貿易自由化，但是亞洲國家則傾向貿易便利化，以及經濟技術上的合作，反對亞太經合會朝優惠貿易區發展。此外，在方式上，亞太經合會的自由化採行一致性的單邊主義，換言之，在達到 2010-2020 年的貿易自由化目標之前，各會員國自己決定時間表與優先順序。

在此，各國有權獨立決定，並解釋自由貿易的意義。而且，在沒有法律強制約束下，要使會員國遵守諾言，只能依靠道德勸說而已。簡言之，亞太經合會的成員在達成貿易自由化的計畫綱領上，缺乏共識。¹²¹第二，開放性區域主義面臨會員國意見分歧，造成亞太經合會的信用受挫之壓力。特別是在自願性部門自由化上，會員之間單是在某些部門是否採取非歧視性自由化而立場不同。¹²²第三，亞太經合會缺乏驅動力。在 1995 年以前，在制定行動議程上，有一重要的角色名為「名流團體」(Eminent Persons' Group)。但是，由於亞洲國家對其促進貿易自由化的壓力普遍感到不適，於是最後解散。此後，便沒了專門負責提供未來願景與

¹²⁰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頁 199-204。

¹²¹ John Ravenhill, 2000, "APEC Adrift: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2, pp. 319-333.

¹²² Robert Scollay, 2001, "The Changing Outlook for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World Economy*, Vol. 24, No. 9, pp. 1135-1160.

實際執行計畫方案的單位。儘管在新加坡設立秘書處，但是缺乏自主性與人力經費，在協調方面成效不彰，是以缺乏驅動力。

第四，缺少與民間社會的互動。亞太經合會不懂利用機會宣傳貿易自由化的優點，致使外界產生疑慮，對亞太經合會持負面態度，尤其是非政府組織(NGOs)，益發其想。¹²³第五，整體組織的效能發揮不彰，致使信任度不足。以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為例，不僅表現出亞太經合會無法避免危機發生，在爆發之後，透過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處理，更加損害亞太經合會的信用與聲譽。¹²⁴第六，缺乏堅定的共同體意識與認同。亞太經合會的成員彼此之間不僅在經濟發展上差異很大，在貿易自由化的看法上亦大相逕庭。正如 Higgott 所表示，就語言、宗教、文化或意識型態而言，並無存在太平洋共同體的意識，也沒有區域意識的歷史，更沒有如歐洲過去所發展的制度架構。¹²⁵此外，還有三點因素使得亞太經合會無法發揮功能。首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儘管亞太經合會有討論到此危機，但是在解決方案和執行力的監督上，沒有貢獻。

其次，亞太經合會被視為是美國外交經濟政策的工具，不少亞洲的成員國帶有抗拒心理面對亞太經合會，是因為擔心美國主宰亞太經合會的事務。而且，又缺乏認同感的建立，在區域的自由經濟計畫上，亦尚未存在政治正當性。¹²⁶第三，亞洲國家與西

¹²³ John Ravenhill, 2000, "APEC Adrift: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2, pp. 319-333.

¹²⁴ Douglas Webber, 2001,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pp. 339-372.

¹²⁵ Richard Higgott, 1995,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A Theoretical Comparison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 No. 3, pp. 361-383.

¹²⁶ Miles Kahler, 2000, "Legalization as Strategy: The Asia-Pacific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 pp. 549-571. ; Heribert Dieter and Richard Higgott, 2003, "Exploring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From Trade to Finance in Asia Co-Ope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No. 3, pp. 430-454.

方美加等國之間，在經濟整合看法上不盡相同，互有較勁意味。特別是美國反對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時，便種下日後亞洲國家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對立態度。¹²⁷然而，對美國而言，亞太地區的經濟利益是無法忽視的，更不願亞太地區成為一個排美的集團。因此，美國一直希望將亞太經合會(APEC)提升為亞洲高峰會，並且將其範圍擴大。但是由於一些國家的反對，亞太經合會(APEC)被定位為「非正式的領袖會議」。特別是其「開放性區域主義」的機制特徵，其與眾不同的運作方式，很明顯地表現出亞太經合會(APEC)不過是個符合、並且為了落實美國全球利益的代理組織而已。也正因為如此，在2005年的東亞高峰會發展過程中，展現排美傾向，便成了預料中的事。¹²⁸

以下簡單說明 APEC 的近況發展，並以歷年的會議重點主題內容做為描述。近 9 年來的發展如下所示：¹²⁹2000 年，主題是能對社群做出貢獻，希望建立更堅石的基礎，創造新契機，使得 APEC 更加舉足輕重。2001 年，主題是「新世紀、新挑戰：參與、合作、促進共同繁榮」，希望普及全球化與新經濟所帶來的利益，加強經濟技術能力建設、推廣資訊相關科技所帶來的好處、加強人力資源發展工作、以及分享企業治理的經驗等，使各成員在全球化和新經濟中受益。此外，促進貿易與投資，以維持亞太地區永續經濟成長，創造有利的宏觀環境。2002 年，主題「為經濟成長與發展：擴展合作之利益以落實願景」，並且啟動「杜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 DDA)，重申上海約章作為 APEC 的里程碑，擴大 APEC 願景的重要性，致力執行上海宣言，落實貿易便捷化原則。此外，亦鼓勵使用資訊通訊科技(ICT)與普及新經濟利益的

¹²⁷ Yunjong Wang, 2000,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Do We Need a Regional Financial Arrangement?"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7, No. 2, pp. 205-217.

¹²⁸ 陳勇，2006，《新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一體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71。

¹²⁹ 參閱中華台北亞太經合會研究中心的網站資訊。

重要性。肯定執行 e-APEC 策略的承諾，並歡迎提出初步執行報告。肯定 APEC 在執行強化市場功能上的努力，市場功能應持續加強以建立企業界及投資者的信心，並確保所有經濟體能完全利用市場開放所帶來的利益。而且，強調 APEC 經濟體有必要努力達成強化反恐安全，以及繼續貿易便捷化的目標。透過強化能力建構以獲取全球化的利益，增加 APEC 對社區(community)的重要性。

2003 年，主題是「差異的世界：共創未來的夥伴關係」。首先，化發展誓言為具體行動。接著，促進以全民為基礎的知識經濟，以增進人類安全，並且健全差異世界下的金融結構，包括新型成長企業，如中小型與微小型企業。2004 年，主題是共同的社群，我們的未來，希望藉由貿易落實發展的承諾，以及最佳範例分享的利益，以加強迎接挑戰的能力，給予新成長企業的機會，強調成長與穩定並重，而整合 APEC 即為關鍵。並且落實永續成長之承諾，同時體驗多元文化，以求發展。2005 年，主題是「邁向共同社群：迎接挑戰，推動變革」，針對茂物目標的新承諾，以確保透明及安全的商務環境，建立橋樑化解差異。2006 年，主題是「邁向永續發展與繁榮的活力社群」。首先，希望藉由釜山路徑圖以及杜哈發展議程來強化貿易與投資。其次，強化經濟暨技術合作以縮小落差，以及永續發展。並且，提升安全與有利的企業環境，同時提升社群連結。

2007 年，主題是「強化我們的社群，建構永續的未來」。此次年會在澳洲舉行，儘管並未設定清晰的主題來引導經濟體思考走向，主要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但仍有幾點重點項目。首先，在貿易暨投資自由化方面，持續推動部份尚未通過的「FTAs/RTAs 範例措施」以及「智慧財產權」議題。此外，為支持杜哈發展議

程(DDA)的復談，APEC 希望能建構一個全面性的談判套案，以協助 DDA 重回軌道。其次，在貿易暨投資便捷化方面，進行第二階段的貿易便捷化行動計畫，計畫於 2010 年 APEC 再降低 5% 貿易交易成本。第三，在經濟與技術合作方面，除了針對 SCE 之整併建議，提出具體執行方案，並要求整併後的各級論壇進行協商，以提出新的組織章程之外。電信資訊與電子商務、人力資源、中小企業、觀光及婦女議題亦為重點推動項目。第四，在人類安全方面，除了持續推動反恐與衛生議題之外，能源安全也成為相當重要的領域。其中，如何發展清潔能源與 APEC 未來在能源安全，以及環境議題上能做出何種貢獻，則是 2007 年 APEC 在能源安全方面的重點工作項目。第五，持續推動 APEC 改革，其中秘書處角色與能力提升、SOM 能否具體各級論壇間的工作以提升合作效率、APEC 與財長程序的整合，以及利益相關者的互動都將是工作重點。最後，在結構改革方面，「境內改革議題」將會是討論的重點，並且期待能在資深官員會議中討論擴大部長級官員參與以促進 APEC 結構改革及其落實的策略。

2008 年，主題是「一個對亞太發展的新承諾」。首先，以社會面向做為新承諾，為了使 APEC 活化，開始強調 APEC 的社會面向。舉凡教育的角色、促進技術合作以降低數位落差、強化反貪腐機制、推廣企業社會責任等等，皆為社會面向的範疇。其次，積極將多元的行為者融入亞太社群建構的過程當中，並且強化公私夥伴協作關係，使公民社會代表參與 APEC 進程，以及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第三，區域經濟整合方面，由於 2007 年 APEC 領袖宣言已經為區域經濟整合背書，並希望能在 2008 年提出「促進區域經濟整合步驟」的結論報告。因此，2008 年將針對最有效推動區域經濟整合的共識行動，以及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前景進行探討。同時，亦將討論區域經濟整合議題如何與杜哈回合談

判互補。最後，採取整合性的途徑處理議題。針對結構改革、能源安全、個人安全、氣候變遷、經濟永續發展等等，對區域較有影響的主要議題，提出整合性的途徑進行處理。

面對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世界各地經濟皆出現危機。對此，亞太地區的經濟體如何因應，成了 2009 年的關鍵任務。2009 年，主題是「永續成長，連結區域」。首先，解決經濟危機方面，新加坡將首度匯集 APEC 貿易及財政資深官員，在 2009 年的 2 月及 9 月討論財政與貨幣措施，以協助企業與就業者渡過經濟危機。其次，加速區域經濟整合的議程。新加坡將與其他 APEC 會員體加速促進「邊境」、「境內」以及「跨境」的區域經濟整合：第一，APEC 將加緊工作，以降低邊境的貿易與投資壁壘，包括促進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就如同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之精簡版本，以降低企業成本，並提高資源利用率。第二，APEC 將透過簡化境內的業務條例以促進經商便利度，達成更容易、更快、更便宜的創業、取得執照、跨境貿易，並進行其他商務行為。第三，APEC 將研究改善物流及運輸網絡，以提高跨境實體連結，進一步減少整個供應鏈的時間、成本，以及移動貨物的不確定性。最後，抵制保護主義，支持杜哈回合談判。APEC 將優先促進杜哈回合談判之圓滿落幕，並確保這樣的協議有助於促進貿易活動，利用鎖定貿易及投資流動權限的防火牆，對保護主義形成壓力。

第二節、亞太自由貿易區倡議(FTAAP)

關於太平洋區域經濟整合的構想，早在二次大戰之後就不斷出現。如上所述，一直到 1989 年，誕生了亞太地區第一個官方的經貿合作機制，即「亞太經合會」(APEC)。只是，即便如此，相對於歐洲、北美與中南美洲等區域，亞太地區仍屬「缺乏區域主

義的區域」。¹³⁰ 至今仍未出現如歐盟 (EU)、北美自由貿易區 (NAFTA) 等等制度化的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目前亞太地區的亞太經合會 (APEC) 僅只是諮詢性論壇而已，並非制度化的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區域主義逐漸開始興起，區域經濟整合的浪潮亦開始湧現。尤其在歐洲區域整合的帶動下，有越來越多的國家積極參與或創設不同性質的「區域貿易協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¹³¹ 依照區域經濟整合程度的不同，約可分為下列四種類型，如表 3-1。對亞太地區而言，區域經濟整合或區域化的現象在過去歷史上，幾乎未曾間斷，諸如區域內的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的交流，甚至有日趨強化互賴的態勢。

表 3-1 區域經濟合作的類型

	成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	共同對外關稅	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	各種經濟政策（財政、貨幣等）的協調
自由貿易協定	√			
關稅同盟	√	√		
共同市場	√	√	√	
經濟同盟	√	√	√	√

資料來源：廖舜右、劉玉哲，2004，CEPA 之緣起與影響，《PECC 論叢》。台北：台經院。頁 254。

隨著日本經濟的復甦與崛起，配合各國的競合關係加深，各種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計畫和倡議紛紛出籠，甚至提出太平洋經

¹³⁰ David Capie, 2004, "Rival Regions?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Its Challenges to the Asia-Pacific," in Jim Rolfe, ed.,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Honolulu, HI: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p. 149.

¹³¹ 廣義的「整合」，意指原本相互獨立的兩個或多個單位合併為一個更大單位的過程或結果。區域經濟整合則意指將特定地區內不同經濟體實際合併的過程或結果，亦或是特定區域內，所有產品與生產要素是呈現自由流通的狀態。請參閱 Andrew Elek, 2007,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paper delivered at *APEC Trade Policy Dialogue-Strengthe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delaide, Australia (April 22).

濟共同體、太平洋盆地經濟合作、泛太平洋協會、太平洋共同體等區域整合或經濟整合的概念。¹³²這些構想，在在顯示此區域期望出現一個具有協調與諮詢的區域制度性機制，方便此區域的經貿往來，將有助於貿易、投資、金融、貨幣、財政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在此，自 1960 年以來，日本可說是亞太區域內，對於各種區域合作概念推動上，相對較為積極的國家。2006 年 11 月 18-19 日，在越南河內召開第 14 屆 APEC 經濟領袖會議，會中領袖們同意著手 FTAAP 的倡議研究。可以想見，許多東亞國家為此感到驚訝，因為在此幾個月前，各國仍對此倡議可行性猶有疑慮。然而，卻在河內會議中，突然間 APEC 經濟體的領袖們改變心意。

回顧 2004 年，在亞太經合會(APEC)所屬的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代表大會中，加拿大代表提出關於亞太貿易區的研究報告，並提出 FTAAP 的構想，會中獲得智利、紐西蘭、新加坡、菲律賓、汶萊、墨西哥等國家代表的附議。當年，此想法便提案至亞太經合會官方做進一步討論。只是，當時的亞太經合會領袖高峰會議最後並未接受此建議。因為在討論時，有不少會員體表達對於 FTAAP 概念的負面看法。然而，在 APEC 或 WTO 中，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發展停滯不前，以及隨著亞太經合會區域內的「區域貿易協定」(RTAs)與「自由貿易協定」(FTAs)的數目日趨增加，推動 FTAAP 的概念不僅沒有消弭，還有積極促使 ABAC 探討這個新概念。1994 年時，APEC 建立茂物目標(Bogor Goals)，宗旨是實現「亞太地區貿易與投資的自由開放」，希望在 2010 年工業化國家間能夠實現，而開發中的經濟體則在 2020 年完成。然而，自從「自願提前部門自由化」(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EVSL)倡議在 1998 年本質上崩潰瓦解，在 APEC 架構上邁向貿易

¹³² Joseph A. Camilleri, 2003, *Regionalism in the New Asia-Pacific Or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Volume II,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 74.

與投資自由化的進程便就此暫緩下來了。¹³³順帶一提，EVSL 是邁向茂物目標的重要一步。隨後，主要自由化的部份就轉移至 2001 年 WTO 的杜哈回合推行之。

2006 年，亞太經合會(APEC)所屬的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正式委託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對 FTAAP 的概念進行政治經濟分析，以及可行性的評估研究。¹³⁴該研究的評估約有五點：第一，FTAAP 規模相當大，如果按照世貿組織(WTO)的相關規範進行談判，至少需要耗時五至十年；第二，成功的 FTAAP 談判有賴政治上的意願與領導，如果缺乏政治上的支持，FTAAP 也將只是空談，再說，要創設 FTAAP 將特別仰賴區域內的大國，美國、日本與中國；第三，亞太經合會是一個對話論壇，而非談判組織，將來如果要進行 FTAAP 的談判勢必涉及亞太經合會在功能性質與組織運作上的改變。但是，這也必須在會員體的充份支持下才可能進行；第四，FTAAP 的成立雖然有利於亞太經合會的會員體，但是卻不一定有效刺激，乃至推動當前停滯的 WTO 杜哈回合談判，甚至可能會因此而轉移 APEC 會員體在 WTO 談判的心力與資源；第五，由於 FTAAP 的規模龐大，將使得 APEC 會員體不得不衡量推動失敗或談判不成的風險和成本。¹³⁵

儘管 FTAAP 的倡議有不少吸引人之處，但如上評估，可知 FTAAP 的成形，首重政治領導與支持上的意願，特別是亞太區域的大國（美國、中國、日本）的態度。對此，2006 年美國公開提出建構 FTAAP 的想法，並且列入亞太經合會(APEC)在年底的高

¹³³ Junichi Sugawara, 2007, "The FTAAP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s approach to regionalism and US engagement in East Asia,"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Paper*, p. 4.

¹³⁴ 江啟臣，2007，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與亞太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 15 期，頁 23。

¹³⁵ PECC and ABAC, 2006, *An APEC Trade Agend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Philippines: ABAC Secretariat, pp. 6-11.

峰會「河內宣言」中，作為未來重要的發展指標，也因為美國的積極支持，此倡議便成為亞太經合會(APEC)未來長期努力的目標，中期目標則是實現茂物目標(Bogor Goals)，將完成WTO杜哈回合談判做為短期目標。¹³⁶對於FTAAP做為一長期目標，在「區域貿易協定」(RTAs)及「自由貿易協定」(FTAs)區域經濟整合活動上，亞太經合會(APEC)會員體同意採取下列共識行動：第一，經由一系列務實的漸進步驟，探討推動FTAAP做為長期發展的可能性，及其願景；第二，彙整與FTAAP相關需要解決之各項問題，並檢視可能產生的影響；第三，針對區域內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進行分析討論（如表3-2和表3-3），使會員體能找出推動FTAAP的各種可能方式；第四，檢視現有的分析工作；第五，檢視連結或合併現有各項協定之可能性。¹³⁷

表 3-2. APEC 經濟體之間已完成簽署的 RTAs

協定名稱	簽署 / 生效時間
澳紐緊密經貿關係協定(ANZCERTA)	1983.01.01 生效
澳美自由貿易協定	2005.01.01 生效
汶萊-日本經濟夥伴關係協定(BJEPA)	2007.06.18 簽署
加拿大-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1997.07.05 生效
智利-中國自由貿易協定	2006.10.01 生效
智利-日本戰略經濟夥伴關係	2007.09.03 生效
智利-秘魯自由貿易協定	2006.08.22 簽署
中國與香港更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安排(CEPA)	2004.01.01 生效
日馬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2006.07.13 生效
日星新時代經濟夥伴關係協定(JSEPA)	2002.11.30 生效
日本-墨西哥強化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2005.04.01 生效
日本-菲律賓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2006.09.08 簽署
日本-印尼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2007.08.20 簽署
日本-泰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2007.04.03 簽署

¹³⁶ 江啟臣，2007，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與亞太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15期，頁24。

¹³⁷ APEC, 2007, *Strengthening Regional Economic Report*, pp. 10-11.

南韓-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2004.04.01 生效
韓星雙邊自由貿易協定(KSFTA)	2006.03.02 生效
南韓-美國自由貿易協定	2007.06.30 簽署
墨西哥-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1999.08.01 生效
紐星更緊密經貿夥伴關係協定	2001.01.01 生效
紐泰更緊密經貿夥伴關係協定	2005.07.02 生效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加拿大、墨西哥、美國	1994.01.01 生效
星澳自由貿易協定(SAFTA)	2003.07.28 生效
泰澳自由貿易協定(TAFTA)	2005.01.01 生效
跨太平洋策略性經濟夥伴協定-汶萊、智利、紐西蘭、新加坡	2006.01.01 生效
美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	2004.01.01 生效
美星自由貿易協定	2004.01.01 生效
美國-祕魯貿易促進協定	2006.04.12 簽署

資料來源：江啟臣，2007，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與亞太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15期，頁21。

表 3-3. 東協與 APEC 經濟體間的 RTAs

已生效協定	簽署 / 生效時間
東協自由貿易區共同有效優惠關稅方案協議(AFTA)	1992.01.28 生效
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協定（貨品貿易協定）	2005.07.20 生效
東協-南韓自由貿易協定（貨品貿易協定）	2007.06.01 生效
仍在談判、討論中的協定	
東協-日本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談判中
東協-澳洲-紐西蘭自由貿易協定	談判中
東協加三（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	討論中
東協加六（中、日、韓、澳、紐、印度）自由貿易協定	討論中

資料來源：江啟臣，2007，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與亞太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15期，頁21。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APEC首次將「區域經濟整合」列為部長聲明與領袖宣言的主要項目。由此可預見，未來FTAAP將成為APEC議程上的重要議題。然而，FTAAP的發展對於APEC亦有著不可忽視的戰略意涵：首先，FTAAP是APEC在區域與多邊

架構下的新戰略目標；其次，美國的支持與 APEC 地位的強化；再者，重拾貿易自由化，強調「區域經濟整合」；最後，FTAAP 的發展將不脫與國際環境及局勢的影響。¹³⁸

東亞地區原本在 1990 年代末葉，仍屬「FTA 真空狀態」的地區。自從日本、中國以及韓國在區域中進行 FTA 競逐，東亞地區開始變成 FTAs/RTAs 的「流行熱點」(hot spot)。在 APEC 經濟體之間，日本與新加坡、墨西哥以及馬來西亞的 FTA 已經實行，並且，已經與菲律賓、泰國、智利、印度與汶萊完成 FTA 的協商談判。甚至，日本也與韓國、越南、澳洲以及東協全體進行 FTA 協商談判的程序。中國和韓國也在進行，最近與一些 APEC 經濟體進入 FTA 協商談判的程序。2006 年底，大約有 20 個 FTAs 在 APEC 經濟體之間建立完成。根據美國前國務卿 Condoleezza Rice 表示，在亞太地區，超過 50 個優惠貿易協定完成或者仍在協商當中。¹³⁹ 當 FTAs/RTAs 在 APEC 經濟體之間擴散，引導此區域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同時，亦導致此區域交易成本提高的潛在風險，而此即所謂的「義大利麵碗效應」(spaghetti bowl)，意即不同的 FTAs 之間，複雜且常常衝突的貿易規定共同並存。ABAC 成員提議 FTAAP 是以「加速邁向達成茂物目標的進程，以及 WTO 的全球自由化目標」，並且極小化「在 APEC 區域中，越趨複雜的 FTAs/RTAs 網絡之可能的負面影響」為主。¹⁴⁰

然而，在 2005 年底之前，APEC 領袖們對於 ABAC 所提出的 FTAAP 回應態度冷淡，許多國家的領導對此提議仍存有疑慮，因此不被考慮。因為，FTAAP 本質上主要具有 FTA 的特色，意即對

¹³⁸ 江啟臣，2007，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與亞太自由貿易區，《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 15 期，頁 24。

¹³⁹ Condoleezza Rice, 2006, "Remarks at the APEC CEO Summit," November 18.

¹⁴⁰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 Australia, 2004, "A 'Single Market Agenda' for Asia-Pacific," 12 August.

於承諾有合法地限制，並且具有歧視非會員的特性。但是，這正好與 APEC 基本特質相反，即「自願性、無強制性以及開放性的區域主義」。是以，追求 FTAAP 可能會對 APEC 獨特的基本特色有害。對此，APEC 領袖們捍衛他們的立場，並且在改變 APEC 本身的議題上，缺乏共識是可以理解的。FTAAP 很可能對非 APEC 會員以及多邊貿易體系造成巨大的影響。APEC 會員體佔全球人口數超過 40%、全球貿易的一半，以及大約全球總生產毛額(GDP)的 60%。如果在此建立單一自由貿易區，將對 APEC 會員體及非會員體之間的貿易關係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APEC 的領導者都很清楚 FTAAP 談判協商的結果要成功，是多麼困難的事。尤其，美國與中國之間要成功達成 FTA 談判就有其難度了。同樣地，對日本也是如此。日本與南韓之間的 FTA 協商已然停止，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尚未開始，可以說，至少在 2005 年之前，FTAAP 是不切實際的提議。

事實上，在 2006 年之前，美國對 FTAAP 的提議抱持負面態度，不支持。但是，幾個月後美國突然改變立場。有趣的是，對 FTAAP 的倡議一開始最反對的是美國。儘管美國態度突然轉變的理由並不清楚，但是有兩點可能是關鍵。首先，WTO 的杜哈回合(Doha Round)遲緩停滯，讓協商談判重新開始是最迫切的事。所以，在河內會議中，APEC 經濟體領袖們提出單獨討論杜哈回合議題，希望輔助重啟協商。第二，透過支持 FTAAP 的提議，獲得動力促進東亞經濟整合的制度化。許多評論表示，美國之所以在 2006 年轉而支持並提議研究 FTAAP 的可行性，是因為促進杜哈回合談判。換言之，認為 FTAAP 是增進杜哈回合談判的催化劑。其實，在美國倡議之前，Bergsten 就已經要求 APEC 經濟體領袖們提出 FTAAP 倡議，以便促使杜哈回合完成結論。Bergsten 堅信，FTAAP 會使杜哈回合重生，並且獲得輔助。就如同過去在關稅暨貿易總

協定(GATT)下的多邊貿易協商，亦使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重啟談判。¹⁴¹

在杜哈回合中，因為美國、歐盟、巴西以及印度等國家間嚴重衝突，因此協商受到停擺拖延。同樣地，烏拉圭回合談判亦然。Bergsten 表示，對於此倡議，不少國家包括印度、巴西以及歐盟等都非常關注，因為他們明白如果 B 計畫取代了杜哈，將對他們有不利影響。¹⁴²B 計畫就是指推行 FTAAP。然而，即使美國試圖複製烏拉圭回合的成功案例，但這不必然會成功。誠如 Jagdish Bhagwati 表示，「有人真的相信 FTAAP 會比杜哈回合更容易為人所接受，進而得出結論嗎？尤其是善變的中、日、美三國間的自由貿易。」¹⁴³更何況，現在的世界貿易版圖與 1990 年代時期大不相同。現在 APEC 的會員體與非會員體之間，存在為數不少的區域間 RTAs/FTAs。歐盟亦已經與墨西哥和智利完成 FTA，而且很快地開始與南韓及東協商談 FTA。此外，Junichi Sugawara 表示，根據可靠消息，美國之所以政策大轉變，直接可能是因為日本。2006 年 4 月，日本的經濟、貿易與工業部(METI)提出一個東亞綜合經濟夥伴關係(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in East Asia, CEPEA)的願景，進而希望建立一個東亞的經濟發展合作組織(East Asian OECD)。¹⁴⁴

此後，落實 CEPEA 倡議研究，並且建立東協與東亞經濟研究中心(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ERIA)，是為邁向 East Asian OECD 的第一步，而且，CEPEA 和

¹⁴¹ C. Fred Bergsten, 2005, "A New Strategy for APEC," Speech at the 16th General Meeting of the PECC, Seoul, Korea, September 6.

¹⁴² C. Fred Bergsten, 2006, "Plan B for World Trade: Go Regional," *Financial Times*, August 16.

¹⁴³ Jagdish Bhagwati, 2006, "Why Asia Must Opt for Open Regionalism on Trade,"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6.

¹⁴⁴ Junichi Sugawara, 2007, "The FTAAP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s approach to regionalism and US engagement in East Asia,"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Paper*, pp. 10-11.

ERIA 將由東協加六 (AESAN Plus Six, 即東協、中國、日本、南韓、澳洲、印度以及紐西蘭) 組成, 這些係由日本所提出的, 加上排除美國的加入, 很可能因此刺激了美國。直到美國政策苗頭指向東亞經濟整合的制度化, 總結此區域國家之間的 FTAs, 並且使 APEC 重新恢復生機。雖然 1990 年代時, 美國反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倡議, 例如東亞經濟團體(EAEG)以及亞洲貨幣基金(AMF)的想法。但是, 美國改變原本立場, 轉而接納這一類的倡議, 並導致 FTAs 的展開。對於 APEC 亦然, 美國一開始也希望促進 APEC 的改革, 包括一個強有力的秘書處, 但並不包括 FTAAP 的概念。直到日本提出 CEPEA 等倡議, 美國遂改變政策, 轉而領導促進 FTAAP 的倡議。Bergsten 指出, 這些倡議可能創造一新的亞洲集團, 與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為三強鼎立。是以, 由此觀點, 大多數的東亞民眾視 FTAAP 的提出, 是美國對抗東亞區域主義的策略。即便如此, 沒有人可以阻止東亞區域主義的促進與擴張。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提出 CEPEA 係由東協加六所組成; 中國則希望從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促成東亞自由貿易區 (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EAFTA), 如下圖 3-1 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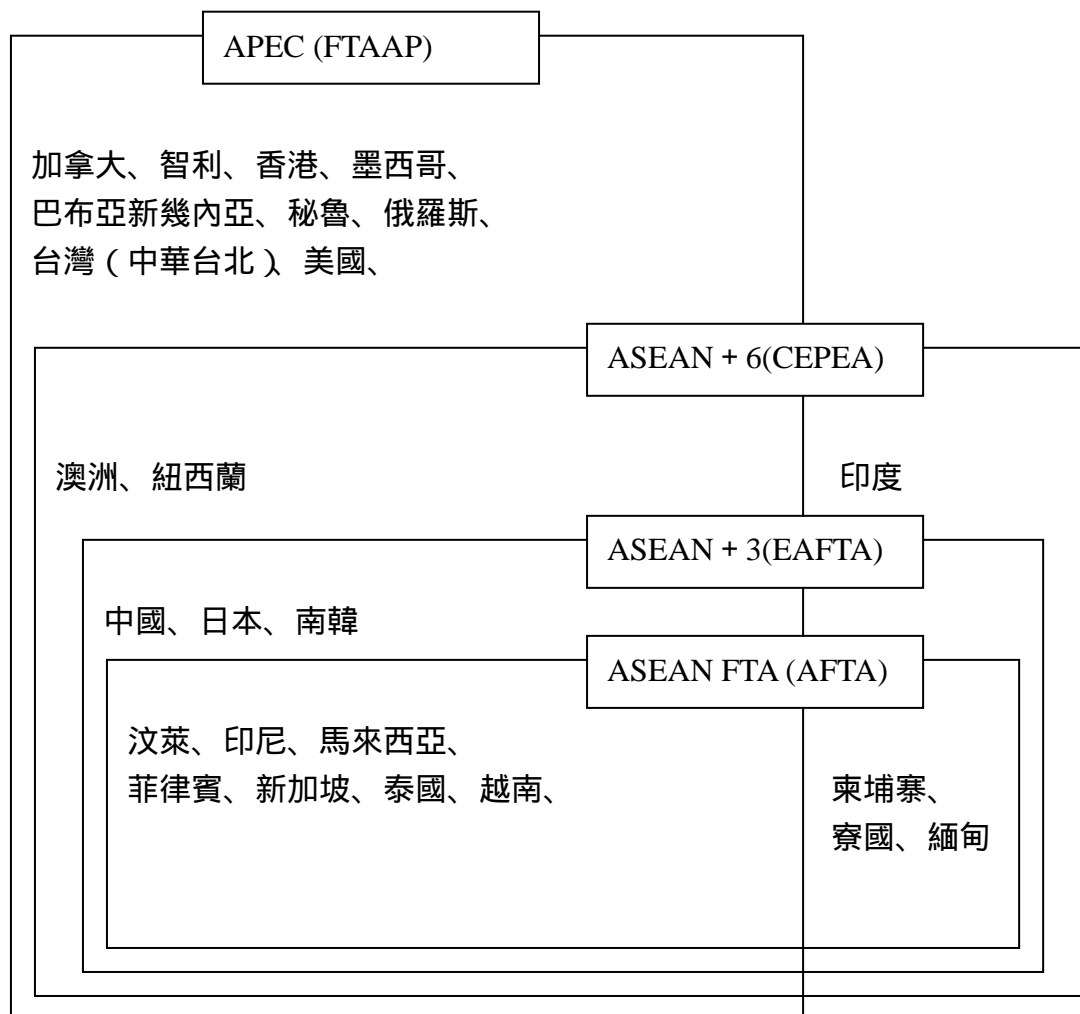


圖 3-1 亞太區域的區域性集團

資料來源：Junichi Sugawara, 2007, “The FTAAP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s approach to regionalism and US engagement in East Asia,”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Paper, p. 11.

但是，美國倡議 FTAAP 則不是要取代 CEPEA 和(或)EAFTA 的。相反地，所有這些倡議，包括 FTAAP 在內，將同時並進，只是步調不同而已。實際上，FTAAP 的提議可能會為邁向 CEPEA 和(或)EAFTA 的建立提供推動力。此外，FTAAP 的倡議對美國而言，是個沒有風險也沒有代價的工具。儘管上述提出一些合理的解釋，但是美國倡議 FTAAP 背後的真正理由依然不清楚。其實，

美國很注意烏拉圭回合與杜哈回合之間情況的不同。即使 FTAAP 對杜哈回合的影響小於第一次 APEC 峰會對烏拉圭回合，美國仍然覺得倡議 FTAAP 是值得的。如果 FTAAP 對杜哈回合而言，真具有催化劑作用，那麼對美國而言是最好的結果。但是，如果事情不是這樣發展，美國依然追求此倡議，並將 FTAAP 視為「B 計畫」。然而，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美國明白 FTAAP 的提出對於東亞區域主義的影響相當有限。

Junichi Sugawara 的看法認為，此舉已經足夠提醒東亞的國家，美國在此區域諾言的重要性。¹⁴⁵對東亞國家而言，認為美國想要不同於 1990 年代的東亞區域主義形式，並且不想加入新的倡議，例如東亞高峰會和東亞共同體。基於上述東亞的解釋，似乎東亞已經美國在區域整合上承諾的重要議題放諸腦後，不管美國是東亞產品的最大市場這件事實。其實，美國提議 FTAAP 就已經提醒東亞國家美國的角色依然是東亞的要角，並且，是時候考慮與美國在區域經濟整合的制度化中建立關係。更何況，FTAAP 的倡議對美國而言，沒有風險也沒有成本。意即如果有意義成果出現，對美國是有利的；如果什麼都沒有，對美國也沒有損失。換言之，這對美國而言是最好的賭注。此外，日本的想法亦相當重要。與美國相同，日本對 ABAC 倡議 FTAAP 一開始也是謹慎小心的態度。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就是在 2004 年聖地牙哥會議上對此提議表示懷疑的領袖之一。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仍有兩大理由支持美國在河內會議上的倡議。一是美國提出此倡議，對日本而言，美國是最重要的全球夥伴；二是此倡議並不阻礙日本的東亞區域主義計畫。FTAAP

¹⁴⁵ Junichi Sugawara, 2007, "The FTAAP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s approach to regionalism and US engagement in East Asia,"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Paper*, p. 12.

在「河內宣言」(Hanoi Declaration)中係屬「一個長期展望目標」，並且，是促進區域經濟整合的其中之一的的方式。是以，對日本，乃至東亞其他國家，包括中國而言，沒有理由反對此倡議。對日本而言，最優先的議題是其貿易議程，當然，仍是恢復 WTO 的杜哈回合，且成功做出總結。要有此結果，需要 FTA 協商談判的輔助，與南韓的協商討論得盡快重新開始，以及日本與東協綜合經濟夥伴協定也得排入議程，希望在春季完成。基於這些努力，以及在農業與其他部門的國內改革下，日本應該增進加強東亞廣泛區域的倡議，例如東協加三或東協加六。然而，日本政府對 FTAAP 存在分歧的觀點。有些官員強烈支持東協加六的方案計畫，並且表示比起 EAFTA，更偏好 CEPEA。這些官員認為 CEPEA 具有潛力能在未來發展至 FTAAP 的規模與建制。但是，其他的官員則採取中立的立場。在 CEPEA、EAFTA 和 FTAAP 三個倡議間，並沒有偏好哪一方。他們相信這些倡議能在「先來，先走」(first-come, first-go)的基礎上，平行發展進程。¹⁴⁶

日本曾在河內會議表示，對 APEC 來說，討論亞太自由貿易區並視之為區域中多邊努力之一，是很重要的。或許，「先來，先走」(first-come, first-go)的方式對日本最好。但是，問題是誰決定哪一個倡議先行。這對日本而言，存在著可能在東亞區域主義的進程上落在人後的風險。因此，日本很自然地積極參與所有倡議的討論。¹⁴⁷儘管日本可能會改變其策略的優先順序，但是，日本仍必須定義其核心立場，以便在倡議討論上，藉由考慮如何促使東亞經濟整合的制度化，以及在倡議上如何尋求美國的承諾與交往方面，扮演積極的角色。有鑑於參與者的數目以及現有東亞區

¹⁴⁶ Junichi Sugawara, 2007, "The FTAAP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s approach to regionalism and US engagement in East Asia,"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Paper*, p. 14.

¹⁴⁷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OFA), 2006, "14th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Overview and Evaluation)," November 19.

域的生產網絡，Junichi Sugawara 認為東協加三(APT)是建立東亞區域 FTA 的最佳架構，更是第一步。然而，考量目前區域上的 FTA 協商，東協加六可能是比較實際的架構。此外，五個「東協加一」的協商談判正有著顯著的進展。東協-中國以及東協（除了泰國）-韓國的 FTA 已經總結，東協-日本、東協-印度以及東協-澳洲和紐西蘭的 FTA 則在協商談判中。因此，許多國家傾向東協加三，而東協加六則有點困難，如果他們能夠完成東協加三 FTA 的話。然而，並沒有合理的理由排除澳洲、紐西蘭和印度。

撇開 WTO 的協商之外，對日本而言，將東協加六 FTA（日本命名的 CEPEA）放在其議程的最優先順位，是會是最有利於日本。然而，為確保美國在區域制度化上的承諾與交往，有幾點選擇。首先，藉由東亞國家建立 EAFTA 或 CEPEA，與美國完成雙邊 FTAs；其次，美國參與 EAFTA、CEPEA 或 East Asian OECD；最後，FTAAP 則是第三個選項。由於這三個選項沒有互相排除抵觸，所以日本選擇哪一個端視其採取的核心立場為何而定。Junichi Sugawara 的看法是，East Asian OECD 可能是尋求美國交往、承諾的最好的傳達媒介。East Asian OECD 的建立可能在東亞功能性合作的協調上，扮演工具性活棋的角色。East Asian OECD 應該由東協加六的國家所組成，並含有一些 APEC 的會員，當然還包括美國。就像在巴黎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一樣，East Asian OECD 應該要有一些政策委員會，例如貿易、投資、能源、財金以及環境。並且，藉由各個委員會的執行落實，同儕之間相互學習與能力的建立。或許美國在東亞區域主義的諾言，可能藉由美國加入組織獲得確保。此外，美國參與組織將會強化組織中不同部門功能性合作上的效率。

即便如此，美國可能不願意加入東亞的新組織，理由是可能

有一些東協加六中的國家傾向 East Asian OECD 沒有美國在內。對此，美國的加入則是功能性合作，而非組織本身。這將成為第二個最佳選項，而且，FTAAP 將變成一個很有用的政策工具。然而，APEC 依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論壇，做為亞洲與太平洋之間的橋樑。在 APEC 中，藉由以下期限，茂物目標的完成是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議題：2010 年是那些已開發的會員體，2020 年則是開發中的會員體。其實，茂物目標指的就是「亞太地區貿易與投資的自由開放」，不過這項目標的意義並不清楚。如果貿易與投資的自由開放指的是，除去「所有實質上」的貿易與投資障礙，那麼已開發國家會員體便不太可能在期限前達成此目標。如果實質上所有的貿易與投資障礙能夠在 APEC 特色的方法之下移除，例如「商議好的單邊自由化」與「開放性區域主義」，那是最好不過。假如這不可能，隨著以最惠國(MFN)為基礎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進程，FTAAP 將會是達成「亞太地區貿易與投資的自由開放」最重要的工具。CEPEA 則扮演著核心角色，以及邁向 FTAAP 的探險者角色。2020 年，除了設為開發中會員體達成茂物目標的期限年之外，將設為建立 FTAAP 的目標年。¹⁴⁸

Bergsten 表示，有五個主要的發展因素促使美國轉而認真考慮，並帶頭倡議 FTAAP 新亞太貿易的倡議，對其甚感興趣。首先，杜哈回合協商遲緩疲乏，對於全球自由化，甚至是像 WTO 這樣的制度，產生高度懷疑。第二，特別是美國，不斷增加努力與亞洲邁向貿易自由化，本身便提高了主要新的歧視以及世界三大不穩定的集團（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以及亞洲集團？）的夢魘。第三，更廣泛的雙邊及次區域優惠貿易協定的擴散，如果杜哈回合真的失敗，將會加速發展，但會進一步破壞多邊體系。因為他們

¹⁴⁸ Junichi Sugawara, 2007, "The FTAAP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s approach to regionalism and US engagement in East Asia,"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Paper*, pp. 16-17.

擔心「義大利麵碗效應」，可能強烈地支持 FTAAP 的創立。第四，亞洲懷疑特定 FTAAP 的想法，仍經由如此大膽的新倡議，歡迎美國的積極參與。第五，APEC 辛苦地追求其自身的自由化目標，並且完全白費力氣地支持杜哈回合。是以，FTAAP 的倡議提供以上五項憂慮有效的回應。也許，最重要的是 APEC 之所以追求 FTAAP 倡議，最有可能的就是刺激杜哈回合談判的重新開啟。為了達成這項結果，APEC 將從「認真考慮」以及「對長期展望進一步的研究」，增進到主動討論。並且可能的話，最好是對此概念全然地協商談判。¹⁴⁹

APEC 在河內的領袖會議視 FTAAP 只是一個「長遠、長期的展望」，議程上的議題必須做出決定，都得包括在內，尤其是否尋求美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FTAs)，或是標準較低的中國 FTAs，亦或是中間路線的日本「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APEC 將必須承認這是個協商中的制度，這已經很清楚了，但是，也必須在第一時間保證承諾不變。¹⁵⁰目前，單一最大的問題可能是中國的立場。其提出兩點關注：對於杜哈回合可能會有反效果，以及延遲落實 APEC 本身的茂物目標。然而，中國對杜哈回合不表興趣，並且也沒有明顯的期望達到「區域貿易與投資的自由開放」，藉由茂物目標先進會員國家的期限 2010 年來完成。或許，中國主要希望持續強調其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雙邊及區域貿易協定，這些主要是政治理由，經濟要素較低。而非因為其廣大的地緣範圍以及大概較高的標準，追求 FTAAP 的

¹⁴⁹ C. Fred Bergsten, 2007, "Toward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p. 1-13.

¹⁵⁰ Charles Morrison, 2006, "An APEC Trade Agenda," in *an APEC Trade Agend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n Pacific*. A joint study by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and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 Vinod K. Aggarwal,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A U.S. Perspective," in *an APEC Trade Agend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n Pacific*. A joint study by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and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概念。也或許是中國不願意包括台灣。

FTAAP 的幾個案例。首先，FTAAP 的落實在這世界最大且最為詭譎多變的區域，呈現出巨大的貿易自由化。所有的會員經濟體可能會因此獲得相當大利益的結果。ABAC 稍早的研究表示，每一個 APEC 的經濟體將從 FTAAP 中獲得比 APEC 非歧視性自由化更多的利益。同時，亦表示幾乎所有的東亞經濟體（包括東北亞三大國），從 FTAAP 獲得比起東協加三(APT)或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來得更多的利益。¹⁵¹第二，如前所述，APEC 積極地追求 FTAAP 概念，可能是希望促使杜哈回合成功完成，並且確實可能成為這些談判重新開啟的催化劑。第三，FTAAP 可能在一個屋簷下橫掃大範圍，尤其在雙邊及次區域優惠貿易協定(PTAs)爆炸性的在整個區域中擴散¹⁵²。第四，實行 FTAAP 倡議可以使 APEC 本身恢復生氣。因為不論是區域和全球領域，APEC 聲勢直落，明顯地表現出能力不足以有效地追求其茂物目標。正在弱化的 APEC 應該要使自己本身成為其所有會員經濟體主要的關注焦點。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經濟緊張關係快速成長，並且，可能因為只有亞洲（也許是只有美洲）的經濟協定，增加亞太區域無法整合的風險，這需要跨太平洋的連結與安全制度上的關係，也有經濟上的理由。日本、南韓以及東協國家都在尋求維持區域上，美國積極的交往角色。面對崛起且可能有霸權企圖的中國，做為「避險策略」(hedging strategy)。

總之，現在 FTAAP 倡議的實質例子，比起 2004 年 ABAC 提出倡議想法時要強得多。此外，在河內會議中認真考慮此提案，

¹⁵¹ Robert Scollay, 2004,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Proposal for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Issues Paper for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pp. 25-30.

¹⁵² Richard E. Baldwin, 2006, "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ism: Spaghetti Bowls as Building Blocs on the Path to Global Free Trade," *The World Economy*, Vol. 29, No. 11, pp. 1451-1518.

並且有三個不同的實行步驟：研究概念、討論協商，以及實際執行。根據分析，杜哈回合的可能發展清楚地影響美國對於 FTAAP 的態度。然而，這可以確定的是高傲卓越的，對於美國，乃至其亞洲的夥伴而言。因為他們追求 FTAAP 而不是在區域中進一步增加 PTAs 的「義大利麵碗效應」(spaghetti bowl)。更多的美國 FTA 以及現有的美國 FTAs 藉由與目前的非會員，可能逐漸創造以美國為中心的「軸輻網絡」(hub-and-spoke)，而非一個整合的亞太經濟體系。更有甚者，對於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經濟關係，美國加入經濟面向對中國採取「包圍」的策略，並追求美國在亞太區域上的經濟與安全。換言之，美國所提出的 FTAAP 當中，國際與國內政治，將顯著地影響美中關係。

最後，總而言之，APEC 倡議的 FTAAP 概念已經開始進入研究階段，或許有以下幾點可能：一，杜哈回合的催化劑；二，如果杜哈回合失敗或持續停滯不前，能成為 B 計畫以恢復貿易自由化的動力；三，避免進一步可能雙邊和次區域的 PTAs 擴散時，創造出實質的新歧視與亞太區域間的不調和；四，避免在太平洋上劃清界線的風險，形成東亞與西半球，使得倡議創造出亞太的瓦解而非更廣泛的 APEC 區域整合；第五，提供中美的經濟衝突一個更具建設性與減少衝突的管道，至少避免一些緊張和風險；第六，使 APEC 本身重新有生機，加強亞太的重要性，特別是中美之間的裂縫，或許在短期，甚至是中期是最重要的；第七，維持美國在亞洲的交往，甚至是全球。然而，APEC 領袖們採用茂物目標，並且美國在此過程扮演核心的角色。不管如何，FTAAP 可以，也必須成為之後在全球貿易體系以及亞太區域的架構，發展進化的最重要的一步。¹⁵³以下附上表 3-4：APEC 主要成員對 FTAAP

¹⁵³ C. Fred Bergsten, 2007, "Toward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p. 1-13.

的思維與立場。

表 3-4：APEC 主要成員對 FTAAP 的思維與立場

成員	思維	立場	附註
美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主要目標是支持 WTO 多邊貿易協定的全球策略，而雙邊 FTA/RTA 則為輔助達成前者的策略工具 2. 但由於 WTO 杜哈談判停滯，因此改以積極主導 FTAAP 的經濟整合為目標 3. 支持以美國為輪軸的 FTA 網絡，以協助達成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最終談判 4. 對東亞區域整合的不安，且被排除在東亞主義外的成本激增 	支持 FTAAP，視 FTAAP 為 WTO 杜哈談判停滯的替代方案(Fred Bergsten)。	同屬 NAFTA 成員之 APEC 成員加拿大與墨西哥，均已表態支持。
中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支持東亞主義，並認為應以現有東協加三國為核心，繼續深化東亞區域合作為優先 2. 欲發展成為區域內大國，因此不樂見美國勢力在東亞的呈現 3. 欲成為經貿協定之「制度制定者」，而非跟隨者 4. 支持 FTAAP 做為替代方案之前提是，中國關注議題（如台灣問題，ECOTECH 與 HRD），可先獲得解決 5. 一個涵蓋大多數商品貿易的 FTAAP 對中國相當 	對 FTAAP 持保留態度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但若 APEC 區域內成員普遍支持 FTAAP，亦不願一個排除中國參與的 FTAAP 在發展，因為這將衝擊其對外經貿關係 2. 提出唯有主權國家才能參與的 FTAAP 的主張

	<p>有利</p> <p>6. 中國最大經貿往來在亞太區域，而最大的貿易障礙亦來自此。如，美國礙於政治與意識問題，禁止出口高科技產品與零件至中國</p>		
紐澳	<p>1. 地緣經濟整合位置上，位居劣勢，被排除於美洲與亞洲整合外的隱憂，促使其早支持亞太主義</p> <p>2. 經濟雖仰賴內需市場，但亦透過貿易以供應國內消費，而澳洲與亞太國家的經貿關係原本就密切</p> <p>3. 自二次大戰的美中澳聯盟以對抗日本開始，澳洲持續參與亞太事務，並關注亞太區域安全以其對澳洲的可能衝擊。因此欲以區域整合的防衛，取代自我防衛</p>	支持 FTAAP	
日本	<p>1. 區域內以「東亞經濟整合」為重心；區域外則認為 WTO 比 FTAAP 重要，而亞洲雙邊 FTA 為 FTAAP 的基礎（區域經貿整合政策重點仍置於東亞）</p> <p>2. 日本與 APEC 區域成員的經貿量大於與東亞國家，因此 FTAAP 對其較為有利</p> <p>3. FTAAP 將面臨棘手的農業開放問題，日本在</p>	贊成將 FTAAP 列入長期目標	應注意 FTAAP 與現行 WTO 體制與其它多邊組織(如 ASEAN+3 或+6) 協商機制間的關係

	<p>WTO 的 G10 中態度仍趨保守</p> <p>4. 對外簽署 FTA 原則：確保日本對外經濟利益與經濟關係發展，並有助於結構改革；有助於東亞共同體之建構，並創造有利於日本的國際環境</p>		
東協	<p>1. 支持「東亞經濟共同體」</p> <p>2. 與東亞區域內國家之經貿往來甚密</p> <p>3. FTAAP 僅是構想，尚未有具體執行計畫，並無急迫性。因此目前仍採保留態度</p>	<p>1. 新加坡、汶萊等經濟體支持 FTAAP</p> <p>2. 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等經濟體則持保留</p>	泰國認為 WTO DDA 為首要目標
智利	<p>1. 智利採取單邊自由貿易主義，並支持開放性區域主義</p> <p>2. 智利在 WTO 談判隸屬 G20。智利對於 APEC 貿易自由化的態度上是支持美國建立一個較為約束的機制，以推動亞太區域內的「完全自由化」</p> <p>3. 智利對於 APEC 的期待，在於發展成為南美洲與亞洲的橋樑與貿易平台</p>	支持 FTAAP	

資料來源：洪德生，2007，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對亞太區域政經情勢的影響，頁 17-18。

值得注意的是，2009 年 11 月 5 日，新任的美國歐巴馬政府在亞太經合會(APEC)的「領袖會議周」上，刻意用「長程目標」淡化布希政府過去幾年在 APEC 積極主導推動的「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美國小布希政府在過去三年的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議中，曾主導並強推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到了新上任且第一次參加 APEC 的歐巴馬政府，似乎出現了政策轉向。¹⁵⁴然而，有趣的是，美國歐巴馬政府對於成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態度似乎出現了大轉彎，歐巴馬於 2009 年 11 月 14 日宣佈，美國將積極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 或 TPSEP)進行對話。對此，亞洲國家非常歡迎美國的態度轉變，同時顯示歐巴馬政府不排斥自由貿易。¹⁵⁵

第三節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P4-P8

按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邏輯，亞太區域的國家，特別是東北亞區域的國家將可能使 FTAAP 成形。為了逐步使 FTAAP 倡議成立，亞太區域的國家，尤其是美國，做出不少的努力。對此，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SEP)就是其中之一。由於此協定剛開始發展，尚未有深入探討或研究，是以僅在此大略說明之。2001 年，紐西蘭與新加坡簽署《紐西蘭與新加坡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ANZSCEP)。次年，2002 年，並與智利利用於墨西哥舉行 APEC 經濟領袖高峰會宣布開啟《太平洋三國更緊密經濟夥伴》(P3-CEP)談判（此即 P4 之前身，P4 稍後說明）。而汶萊則於 2004 年的第二輪談判中成為觀察員。2005 年 4 月的第五輪談判中成為正式談判方。最後由新加坡、紐西蘭、智利與汶萊（四國所以俗稱 P4）於同年 7 月簽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SEP)協定。目前的成員包括新加坡、紐西蘭、智利與汶萊，於 2005 年 6 月 3 日簽署完成，最後於 2006 年

¹⁵⁴ 美轉彎，淡化亞太自貿協定，2009 年 11 月 5 日，《聯合報》，華府特派員張智宗。

¹⁵⁵ 歐巴馬效應，亞太自貿區露曙光，2009 年 11 月 16 日，《經濟日報》，編譯廖玉玲。

11 月 8 日在這四個國家之間正式生效。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SEP)是一個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目前的成員以及正式生效日期如上所述。實際上，此協定最初是由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紐西蘭總理 Helen Clark 以及智利總統 Ricardo Lagos 三位領袖於 2002 年 APEC 領袖會議期間召開第一回合的經濟合作談判，主要目的在於建立「太平洋三國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Pacific Three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P3-CEP)，而此協定也因此被視為 TPSEP 的前身。到了 2005 年，如上所述，汶萊在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先前五個回合的談判之後，正式於該年 4 月加入 P3-CEP 的談判行列。然而，原先的 P3-CEP 也隨著成員增加為四個而更名為目前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SEP)。值得注意的是，TPSEP 的四個成員在文化與地理位置上雖有很大的差異，但是，仍具有彼此類似的特性。例如，人口與土地面積都屬於小型國家，而且，也都是 APEC 的正式會員經濟體。如此以來，小國特性就有可能是促成 TPSEP 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然而，在 TPSEP 正式生效之後，其最重要的目的宗旨便是新加坡、紐西蘭、智利以及汶萊彼此之間的貿易裁減關稅，最終形成一個零關稅的自由貿易區。是以，不難被視為是 FTAAP 倡議創立前的努力，其所設定的目標是在 2006 年 1 月 1 日時，將彼此的貿易關稅降低 90%。至 2015 年，則是進一步將所有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活動降低為零關稅。此外，TPSEP 當中所涵蓋的內容合作產業類別包括：商品貿易、原產地原則、海關公文格式制度化、貿易補償、公共衛生機制、科技貿易障礙、競爭政策、智慧財產權、政府採購、服物貿易、臨時入境許可、政府透明化、爭端解決機

制、戰略夥伴關係、貨品相互認證、投資活動，以及商務人士流通等層面。¹⁵⁶原則上，在 2015 年以前，各國廢除 100%（貿易額、品項數目兩方面）的關稅。2008 年 2 月，美國參加投資金融服務的談判。2008 年 9 月 22 日，美國貿易代表 Susan Schwab 宣佈正式協商加入 P4。受此激勵，澳洲、秘魯和越南據傳也將加入。有了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加入，對於 Trans-Pacific SEP 的規模擴大，有相當大的作用力。Trans-Pacific SEP 的官員表示，美國的加入，將包含 21 個會員國的龐大 APEC 長久以來試圖成立的亞太自由貿易協定(FTAAP)，注入新動力。

根據新加坡政府發佈的聲明稿，在 Trans-Pacific SEP 協議下，預定 12 年內，會員國內所有貿易產品關稅將取消，而會員國之間貨物貿易 90% 的關稅將立即解除。其實，TPSEP 可以說是屬於相當全面性的自由貿易協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TPSEP 有一目標企圖在亞太區域整合過程中，建立一個區域貿易合作的典範。並且，採行 APEC 的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舉凡 APEC 會員經濟體，乃至非會員皆可參與。此外，除了 TPSEP 原先成員新加坡、紐西蘭、智利以及汶萊四國外，美國於 2008 年 9 月正式對外表示，未來將會參與 TPSEP。接著，澳洲與秘魯亦於 2008 年 APEC 高峰會議結束後宣布加入 TPSEP。而泰國與越南亦展現出希望加入此協定的態度。其實，目前 TPSEP 成員原本就有與美國、澳洲、秘魯、泰國和越南之間，各自有簽署 FTA 協定。這些 FTA 協定有助於 TPSEP 未來進行擴大時的談判程序。現在，已經確定加入 TPSEP 的成員有：新加坡、紐西蘭、智利、汶萊（原本四國），以及美國、澳洲、秘魯三國。而泰國與越南則是在考慮中。¹⁵⁷

¹⁵⁶ 葉俊廷，2008，台灣參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之 SWOT 分析，《亞太經濟合作評論》，青年論壇，第 16 期，頁 68-70。

¹⁵⁷ 同上註 49。

此外，由於 TPSEP（或稱 P4）具有「開放條款」，特別是針對其他 APEC 經濟體而言。所以，此協定帶有強烈的擴張動力，且相當具有戰略性意義。對此，一方面 ABAC 已經倡議「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SEP）為推動 REI 與 FTAAP 的基礎；另一方面，美國當時的談判代表 Schwab 與 TPSEP 成員在 2008 年 9 月 22 日時，正式對外宣布，雙方將於 2009 年起開始第一回合的談判。並且，明白指出可以透過 TPSEP 的逐步擴大，來強化 APEC 的區域經濟整合，甚至於可作為達成 FTAAP 的墊腳石。在此，由於 APEC 的「區域貿易協定與自由貿易協定」（RTAs/FTAs）過於氾濫，不利經商懷環境。因此，2008 年，ABAC 第二次在莫斯科大會上部份代表提出 TPSEP 或稱 P4 是整合 FTAs 良好的催化劑。同時，亦有代表主張「兩階段途徑」（two-tier approach）來進行，以符合「高品質」的要求。

此外，2008 年，ABAC 在杭州大會上，新加坡談判代表主張擴大 P4 是為 APEC 達成 FTAAP 的大好機會。然而，會後儘管新加坡、智利、紐西蘭與汶萊表示支持，但是，南韓、日本、菲律賓激烈反對，且馬來西亞與泰國私下亦表達反對態度。2008 年 10 月，APEC 秘書長 Juan C. Capunay 訪問台灣時表示，美國宣布加入 TPSEP（或稱 P4）之後，秘魯外長亦聲明將加速進行 TPSEP（或稱 P4）研究。此外，澳洲、越南、墨西哥、泰國等經濟體可能亦表達對之興趣，盼追隨美國的腳步。隨後，2008 年 11 月 21 日，澳洲與秘魯做出加入 TPSEP（或稱 P4）的承諾。而且，智利外長 Alejandro Foxley 與紐西蘭貿易部長 Tim Groser，兩位在秘魯首都利馬舉行貿易部長會議期間更做出宣示，將給予其他 APEC 經濟體一個期限，徵詢是否願意到 2009 年 3 月之前，表達加入下次擴增計畫的意願。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美國之外，澳洲、秘魯與越南已經表達高度加入的意願，並且預計將在 2011 年美國主辦的

APEC 年會之前，完成 TPSEP「P8」的自由貿易協定。¹⁵⁸

目前，TPSEP 最新發展現況如下所示。2008 年 11 月 21 日，智利外交部長出席 APEC 第 20 屆部長會議期間，接受智利國家報的訪問，表示明年（即 2009 年 3 月），將是「跨太平洋策略經濟夥伴協定」（TPSEP；P4）擴大的關鍵時點，智利歡迎其他 APEC 經濟體加入此一自由貿易領域。目前已有美國、澳洲及秘魯於 APEC 利馬會議期間表達加入 TPSEP 之意願。自 2009 年 3 月起，包括智利在內的 7 個 APEC 經濟體將開始諮商自由貿易，並歡迎其他 APEC 成員加入，以期作為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之起點。智利外長同時呼籲已開發國家放棄保護主義，儘速完成已延宕 7 年之杜哈回合談判，並強調創造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區，可因應全球金融危機。為了簡化加入 P4 之程序，未來擬加入之會員，以附加適用該協定方式加入，不須再次展開諮商。由於美國並未被東亞經濟共同體的計畫納入，因此宣佈加入由新加坡、紐西蘭、智利和汶萊四國發起的自由貿易協定跨太平洋策略經濟夥伴（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SEP）。受此激勵，澳洲、秘魯和越南也宣佈要加入，八國預計在 2009 年 3 月開會討論。

此外，2010 年 3 月，美國將參加 TPSEP 擴大成員的第一輪談判。目前，美國貿易代表署已經開始與國會及企業界等加緊協商。希望儘快制定出明確的談判目標，以便美國屆時能提出強有力的立場和觀點。特別是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09 年 11 月訪問日本東京時，首先釋出將參加 TPSEP 的訊息。此後，亦在新加坡舉行的 APEC 領袖會議上正式宣布加入的意願與態度。並且，美國提及藉

¹⁵⁸ 洪財隆，2009，區域合作與整合，《太平洋區域年鑑》，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頁 62-64。

由加入 TPSEP 將可為美國百姓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經濟繁榮。或許能填補美國當前的自由貿易協定缺口，意即缺乏一個泛太平洋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此同時，在美國積極準備參與之際，日本經濟產業省儘管依然認為此際參加 TPSEP 有其困難，但是，也已把參與的目標及方針納入其經濟成長戰略。不難發現，2010 年的 TPSEP 的發展可能有新變化。

相較於美國積極要參與 TPSEP，日本政府的態度也有所改變。日本從原本以主導推動成立東亞共同體為優先，轉而不排除參加 TPSEP。對此，面對美國總統歐巴馬態度的表明，日本外相岡田克亦在新加坡 APEC 會議期間表示對此架構有興趣。儘管日本至今仍然認為參加 TPSEP 有其困難，然而最近日本經濟產業省對於是否參與 TPSEP 的態度則逐漸趨於明確。根據日本經濟新聞於 2009 年 12 月 7 日透露，日本經濟產業省已經把加入 TPSEP 的目標方針納入政府制定的經濟成長戰略當中。並且，認為這是深刻連結亞洲經濟的有力基礎，或許可以進一步考慮建構一個泛 APEC 區域的自由貿易區。目前，TPSEP 的成員有新加坡、汶萊、紐西蘭以及智利。現在，美國和澳洲都已表態要加入。有趣的是，TPSEP 已被視為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核心發展部份。同時，日本也已將 TPSEP 列為經濟外交戰略的主要目標。¹⁵⁹

在此，TPSEP（或稱 P4）擁有幾項特性，如下所示：¹⁶⁰

1. 成員資格具開放性：不同於多數「自由貿易協定」或「區域貿易協定」(FTAs/RTAs)的排他性。TPSEP（或稱 P4）明文表示開放給 APEC 成員或看法相近的其他非會員經濟體，在締約方

¹⁵⁹ 吳福成，2009，2010 年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發展新趨勢，《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12 月號，頁 1-2。

¹⁶⁰ 洪財隆，2009，區域合作與整合，《太平洋區域年鑑》，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頁 62-64。

同意下加入。

2. 內容具廣泛性與高品質：該協定內容廣泛，包括商品貿易、原產地規則、關務、便捷化、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教育、科技合作、爭端解決、環境等，農業議題亦在討論中。與其他 FTA 相較，TPSEP（或稱 P4）品質頗高，並規定 2015 年前將關稅降為零，協定生效後 2 年內要著手談判投資、金融業自由化等，會員間亦簽署和勞工關係相關具有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

3. 談判進程具彈性：TPSEP（或稱 P4）強調「彈性次序、多軌多速」的關稅減讓過程。「彈性次序」是指減讓項目無固定順序；「多軌多速」是指減讓時間表及速度不定，可分階段完成減讓。其優點是可以提升可行性，加上每次檢驗及開放期程較接近，有提示締約國具體落實之作用。

4. 與其他「緊密經濟夥伴關係」（CEP）或 FTA 之包容性：TPSEP（或稱 P4）不妨礙原先 CEP 或 FTA 條款實施。例如 TPSEP（或稱 P4）與《紐西蘭與新加坡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ANZSCEP）之原產地規則不同，而新加坡、紐西蘭兩國依然讓廠商擁有選擇的空間。

5. 條約修改程序簡便：TPSEP（或稱 P4）條文已成範本，欲加入之經濟體無須就內容與締約方進行談判。然而，已加入之締約方可循內部程序修改條文。

簡單小結。職是之故，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看表 3-4，由於中國等區域強權的崛起，以及美國有意創設多邊制度，以東亞區域各國決策者的認知而言，此國際或區域體系權力分配是多極體系，而且在經濟互賴程度加深的此刻，將可能的目標國（如美國或中國）納入多邊制度當中，採取在制度中藉由制度的功能與運作，平衡目標國的影響力。因此，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形成可能性很大。

第四章、排他型制度性平衡：東北亞自由貿易區？

同樣地，延續第二章的論述，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觀點以及研究方法架構，並借用 Kai He 的制度性平衡模型來探討東北亞區域的平衡策略。第四章主要是討論排他型的制度性平衡，排他型係指東北亞中、日、韓三國不願接受東北亞區域之外的強權介入區域事務，特別指冷戰之後世界唯一超強的美國。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東北亞三國皆認為國際體系是單極體系，而且相互間經濟互賴的程度是強的。此章則借用 Vinod Aggarwal 與 Min Gyo Koo 的東北亞區域整合模型路徑圖來分析東北亞區域制度可能的發展。此分析途徑是用來分析 1990 年代貿易安排如何在東亞發展的，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在高度經濟互賴的情況下，兼之視國際體系乃是單極體系，東北亞區域是否會形成進一步制度化的次多邊關係(sub-multilateral level)？為此，Vinod Aggarwal 與 Min Gyo Koo 聚焦在東北亞區域的新制度性平衡上，且由此看出東北亞可能的發展。這是一種情境分析途徑。以下就先從此情境分析路徑圖開始說明，接著探討東北亞中日韓三國的區域策略，最後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角度探究東北亞自由貿易區是否能成形，形成排除區域外強權美國的排他型制度性平衡多邊關係。

第一節、東北亞的經濟整合發展模型

Stephan Haggard 表示，區域主義是一種政治過程，是為促進國家經濟政策的合作與協調。¹⁶¹換言之，區域主義是指那些由國

¹⁶¹ Stephan Haggard, 1997,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48.

家所引導的合作計畫，亦是政府間對話和簽訂條約所導致的結果。¹⁶²而區域主義以區域貿易協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 為主。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統計，1990 年全球只有 27 個 RTAs，預計到 2010 年總數可達 400 多件。¹⁶³整體而言，東亞國家各種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不論是已簽訂、協商中或尚在研究中的自由貿易定，有許多進展與努力。如圖 4-1 所示。

¹⁶² 宋興洲，2005，《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頁 64。

¹⁶³ 廖舜右，2007，東北亞經濟整合可能發展之初探，《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 15 期，頁 52-62。

參與成員			
雙邊		迷你型	
地理位置集中	地理位置分散	地理位置集中	地理位置分散
貿易自由化措施			
(1) ☆新加坡與香港的多種貿易自由化措施 ☆亞太經合會的個別行動計畫 (IAPs)	(2) ☆日本-南韓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 (協議中) ☆中國-南韓的自由貿易協定 (研究中)	(3) ☆新加坡-紐西蘭的更緊密經濟夥伴 (CEP) (2000) ☆日本-新加坡的經濟夥伴協定 (EPA) (2002) ☆南韓-智利的自由貿易協定 (2002) ☆美國-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 (2003) ☆台灣-巴拿馬 (2003) ☆日本-墨西哥 (2004) ☆南韓-新加坡 (2004)	(4) ☆東南亞國協 (ASEAN) (1967) ☆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區 (AFTA) (1991) ☆中國-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協定架構 (2003)
		(5)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1989) ☆東亞經濟預備會議 (EAEC) (1994) ☆亞歐會議 (ASEM) (1996) ☆東協加三 (1998)	(6)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 世界貿易組織 (GATT/WTO) (1947/1995) ☆資訊技術協定 (ITA) (1997) ☆基本電信協定 (BTA) (1998) ☆金融服務協定 (FSA) (1999)

圖 4-1 東亞各種貿易治理的措施

資料來源：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o, 2005,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18, No.2, p.197.

東亞區域整合形式中的 RTA 包含兩大類型：自由貿易協定 (FTA) 與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CEP)。以單邊行動而言，東北亞區域有兩個進展。一者是香港和新加坡採取各種不同的貿易自由化措施，二者是亞太經合會之下的個別行動計畫 (Individual Action Plans, IAPs)。而雙邊 (bilateral) 協定與迷你型 (minilateral) 合作關係則皆具有地理位置集中和分散兩種類型。雙邊且地理位置集中的有二：正在協商中的日韓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正在研究中的中韓自由貿易協定；雙邊且地理位置分散的有七：新加坡與紐西蘭的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日本與新加坡的經濟夥伴協定、南韓與智利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與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台灣與巴拿馬的自由貿易協定、日本與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南韓與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學者稱上述雙邊協定為「新雙邊主義」(New Bilateralism)，不同於二戰後舊金山和約所形成的美國雙邊主義（此乃美國與其他各國的雙邊關係）。¹⁶⁴ 迷你型且地理位置集中的有三：東南亞國協（東協、ASEAN）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協定、以及中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協定架構。迷你型且地理位置分散的有四：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亞太經合會、APEC）、東亞經濟預備會議 (EAEC)、亞歐會議、以及東協加三（東協十國加中日韓三國、APT）。多邊關係方面，有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織、WTO、此前身為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ATT)、資訊技術協定、基本電信協定、以及金融服務協定。

延續 Kai He 的論述，在單極體系且經濟互賴程度強的狀態下，從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觀點來看，勢必採取排他型的制度性平衡策略。是以，在東北亞地區而言，照道理會形成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然而，現實中東北亞區域整合的發展仍尚在

¹⁶⁴ 宋興洲，2007，中、日、韓三國地緣經濟策略之探討，收錄於王效平、李思名、饒美蛟主編的《新世紀的東亞經濟合作》，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頁 127-146。

努力，問題就在於是否可能形成次級區域的自由貿易區？對此，面對複雜、難以預測的東北亞區域局勢，Vinod Aggarwal 和 Min Gyo Koo 則以 WTO 的規範強度、APEC 的整合程度、中日聯盟的可能性，以及經濟互補性等四個變數，探討東北亞整合的各種不同路徑圖，整理出十二種邁向東北亞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¹⁶⁵如圖 4-2 所示。

¹⁶⁵ 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o, 2005,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pp. 189-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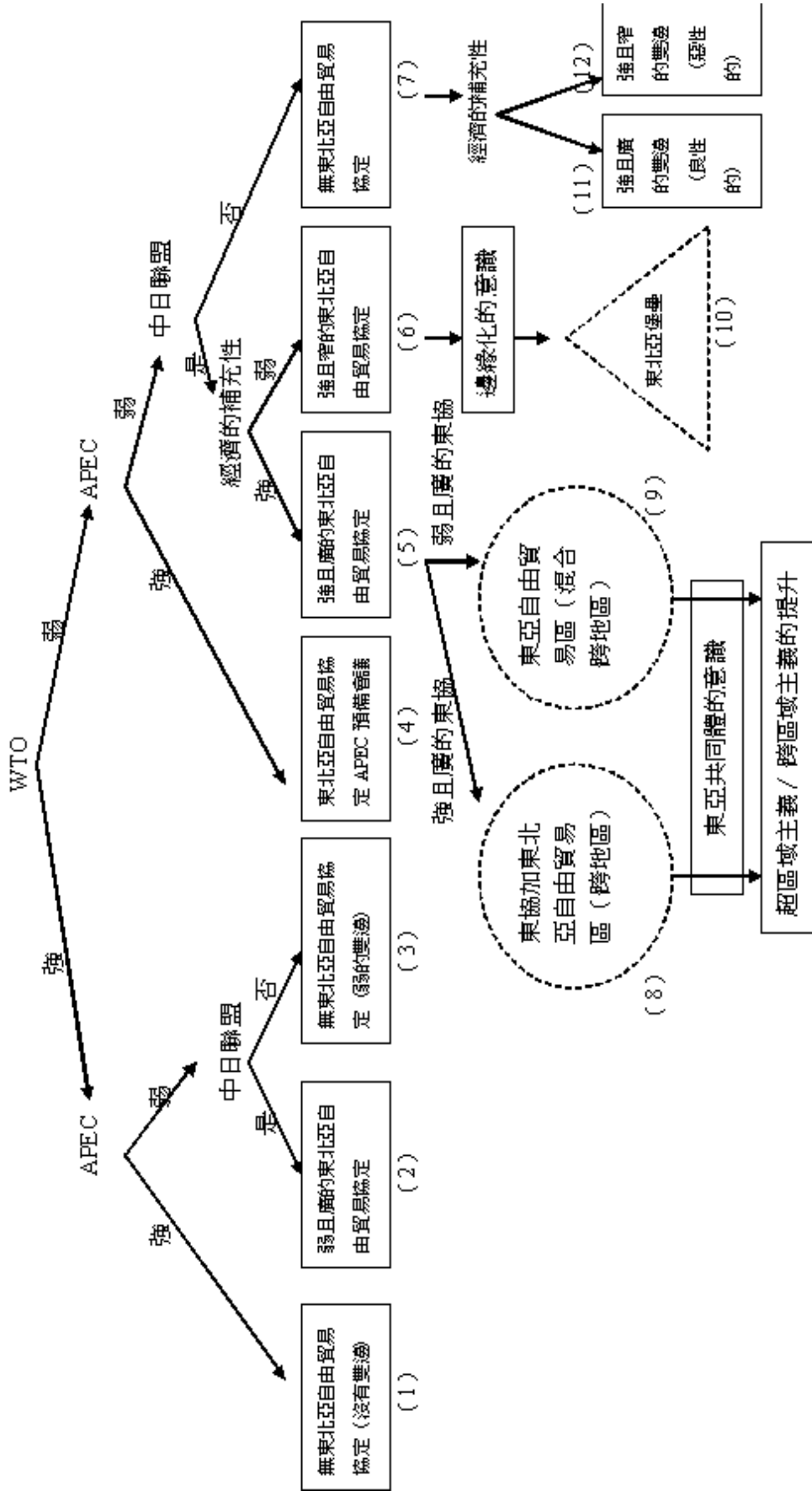


圖 4-2 東北亞區域整合路徑圖

資料來源: 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o, 2005,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18, No.2, p. 208.

東亞地區在二次大戰之後做出了許多努力，希望使區域的經濟關係更加強化制度上的發展，但是真正成功的卻很少。¹⁶⁶分析家在東亞區域主義的獨特性上著墨很多，認為東亞的區域主義特色是市場導向，以及非正式性的整合。此外，並表示在缺乏區域經濟事務正式的制度化機制下，日本的跨國企業網絡以及留學海外的中國人則在形成經濟社群上相信勢必扮演著關鍵的角色。¹⁶⁷然而，到了 1990 年代時，傳統東亞的制度性平衡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在東亞區域中，有許多國家開始擁抱最新的優惠貿易協定浪潮，並企圖制度化他們之間的經濟關係。許多東亞國家意識到緊密的制度化更能提供經濟安全上的承諾，而非鬆散結構的生產網絡。隨著傳統機制如世貿組織(WTO)和亞太經合會(APEC)的制度，東亞國家轉而透過優惠貿易協定(PTAs)以確保其產品的市場。當然，除了考量經濟因素之外，安全關係的考量亦是驅使 PTAs 快速成長的原因之一，如東協-中國的框架自由貿易協定(FTA)。¹⁶⁸

這些優惠貿易協定的優勢不僅反應出行為者的權力差異，並且使國家政府願意放棄一些自主性。近來東亞許多 PTAs 企圖涵蓋更廣大的區域，希望不僅在貿易上而已。在東北亞區域方面，日本和中國是區域上兩大較勁的對手，而南韓則是前兩者之間的橋樑角色，這不僅對東北亞區域互動關係上非常重要，對於東亞其

¹⁶⁶ K. Calder and M. Ye, 2004, "Regionalism and critical junctures: explaining the "organization gap" in North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4, No. 2, pp. 191-226.

¹⁶⁷ A. MacIntyre, 1994,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development: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omparisons," in A. MacIntyre (ed.)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izing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 Bernard and J. Ravenhill, 1995, "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 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 47, No. 2, pp. 191-208.; W. Hatch and K. Yamamura, 1996,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J. Katzenstein, 1997,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in P.J. Katzenstein and T. Shirai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¹⁶⁸ E. Kwei, 2005, "Chinese bilateralism: politics still in command," in V.K. Aggarwal and S. Urata (eds), *Bilateral Trade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Origin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他地區同樣重要。¹⁶⁹面對中日兩大對手國，南韓追求 PTAs 是為了加強其議價的地位以及在外交上說話的份量。日本視 PTAs 為一種工具，以期能達成經濟上的重建。當提及地理區域上與是否參與方面，日本則傾向「一般的雙邊架構」(general bilateral)，藉由開放的雙邊協定在地理上交織成網。

對日本而言，與中國和南韓的三邊協定並不吸引人，這也許反映出日本對中國懷有正反兩面的情感：一面是日本希望整合中國，納入區域當中；但是，同時卻又擔心中國是崛起中的霸權。是以日本於 2002 年的 PTA 中表示，日本遠程目標是創造一個跨區域的東亞自由貿易協定(FTA)，而非只專注在東北亞地區的雙邊協定，因為前者（跨區域的東亞自由貿易協定）能為日本及中國間提供比後者（東北亞區域雙邊協定）更大的緩衝區。¹⁷⁰有趣的是，中國盡其外交所能保護其在世貿組織中的會員位子。對中國領導者而言，自從其近年來在外交上達成卓越成就之後，實在沒有其他能使其分心於多邊機制的方案。Kwei 表示，中國比較傾向「一對多」(one-to-many)的協商或「混合型的雙邊」(hybrid bilateral)協定，而非單純的雙邊 PTAs。¹⁷¹

南韓在 1997-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在政治上採取改革主義，對外則促進 PTA 的談判協商。¹⁷²南韓刻意先專注在跨區域上「輕量級」(lightweight)的 PTA 夥伴，如智利、新加坡、墨西哥

¹⁶⁹ K. Calder and M. Ye, 2004, "Regionalism and critical junctures: explaining the "organization gap" in North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4, No. 2, pp. 191-226.

¹⁷⁰ 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o, 2005,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p. 205.

¹⁷¹ E. Kwei, 2005, "Chinese bilateralism: politics still in command," in V.K. Aggarwal and S. Urata (eds), *Bilateral Trade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Origin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¹⁷² M. G. Koo, 2005, "From multilateralism to bilateralism? A shift in South Korea's trade strategy," in V.K. Aggarwal and S. Urata (eds), *Bilateral Trade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Origin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以及泰國。然而，對南韓而言，最終日本還是最為理想的 PTA 夥伴。如同 Cheong 所指出的，南韓希望透過 PTA 的網絡吸引中國的加入，並形成中國-南韓的 PTA。此外，為了極大化南韓自身的議價地位，以及在其兩大鄰居之間的外交份量，南韓也積極地支持區域與跨區域的計畫方案，例如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與東協加三(APT)。¹⁷³總之，儘管東北亞國家追求 PTAs 並不意謂降低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性，但政策上的改變是很明顯且重要的。原則上，東北亞在參與及地理上新的偏好是開放的。

Vind K. Aggarwal 和 Min Gyo Koo 試圖避免技術上的偏見，以為東北亞在未來制度性的設計上能有更多可能性。理想上，以情境分析的方式，允許所有可能的結果列舉其中。並且，設計如圖 4-2 所示的「制度性議價賽局」模型。然而，要分析到每一種可能的結果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在。因此，Vind K. Aggarwal 和 Min Gyo Koo 便檢視多種可能發展成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的路徑及類型。為了系統化地建構簡易的情境分析，Vind K. Aggarwal 和 Min Gyo Koo 假設在此制度性議價賽局中，變數與變數之間具有一定的階層秩序存在。於此，主要聚焦在三種變數上，分別如下：WTO 和 APEC 制度上的強度、聯盟以及國家之間經濟的互補性。我們將如何從目前東北亞混合的制度中形成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其中有中國、日本和南韓的雙邊區域主義及跨區域主義（普遍性雙邊）、少邊的跨區域主義（APEC 及 APT 東協加三），以及多邊的全球主義(GATT/WTO)。

在此，有四種假設七種結果。首先，假設一，如果 WTO 和 APEC 兩者的制度皆是強的，那麼將沒有任何動機和可能形成東北

¹⁷³ I. Cheong, 2003, "Korea's FTA policy: progress and prosp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KIEP/NEAEP Conference on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Honolulu, Hawaii, 6-7 August.

亞自由貿易區(NEAFTA)。本質上，所有為了保護財貨的動機（即使是透過雙邊協定），都將隨著強有力的制度運作且主導制度空間範圍而消逝。此即為第一種結果。假設二，如果 WTO 是強的，結合弱的 APEC 將使得東北亞地區允許其他制度性空間出現，不論是三邊或是雙邊的區域主義。意即會有兩種結果。如果可能，雖然是短暫的，中國與日本之間若存在聯盟關係（而三邊聯盟則是包括了南韓），那麼弱且廣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將可能形成。此即為第二種結果。按此邏輯，強的 WTO 將阻止區域俱樂部性的公共財產生，但弱的 APEC 卻刺激東北亞國家在政治上聯盟以形成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不論是立即形成或是透過各別的雙邊關係做結合。這些都是為了極大化地緣上及其經濟上的可能利益。

相反地，如果沒有中日聯盟，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則更不可能形成。因為在區域兩強（中、日）之間皆強烈關注相對獲益。但是，並不表示雙邊聯盟的可能消失，仍有可能存在日本與南韓雙邊聯盟，以及中國與南韓的聯盟。此即為第三種結果。假設三，如果是弱的 WTO 和強的 APEC 結合，則可能形成非常弱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弱的 WTO 會促使中、日、南韓三國追求三邊區域制度，即使三國之間並沒有正式的聯盟協定，因為強的 APEC 會減少相對獲益的關注。然而，在此情況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將會降低變成在 APEC 裡面中、日、南韓三國會談。由於 APEC 是貿易自由化運作的主要處所。此即為第四種結果。最後，假設四，如果 WTO 和 APEC 兩者皆弱，可以想見制度上的空間及多樣選項就會出現。如果中國和日本達成政治聯盟（藉此形成區域中的三邊聯盟），那麼要形成強有力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就更有可能了。在此情況下，NEAFTA 的形成就意謂是經濟上的補充劑。如果在中、日、南韓三國間這樣的補充性真的存在，那麼將會擴大經貿上生產的範圍。此即為第

五種結果，意即在強的經濟補足性上，存在強且廣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如果經濟補足性是弱的，預期將出現強且窄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此為第六種結果。相反地，如果中日之間沒有聯盟關係，那麼就不可能有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此為第七種結果。

在這七種可能的情境結果當中，將對其中三種特定結果進一步探討可能的發展路徑，而這些都是在弱的 WTO 和弱的 APEC 結合下發生的。首先，如果我們擴大關注東北亞以外的發展，一個強且廣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即第五種結果，將會如何進展？在東亞，如果 NEAFTA 的型態是由強且廣的東協(ASEAN)結合而成的，那麼最有可能的結果一個區域間的協定（意即在兩個不同的 PTAs 之間簽訂雙邊協定），可能是東協加東北亞自由貿易區(ASEAN Plus NEAFTA, APN)的形式。此為第八種結果。或者，如果強且廣的 NEAFTA 連結上廣卻弱的東協(ASEAN)，那麼我們可以預期混合區域間協定創造東亞自由貿易協定(East Asian FTA, EAFTA)的情況來臨。目前顯示出其不同於 APT 或 EAC 的形式，因為東協是統一的，但是南韓、日本和中國則不是。在此情況下，成員國將以各別東南亞國家及南韓、日本和中國的身份參與加入，如東北亞自由貿易區(NEAFTA)的成員，此為第九種結果。

接著，探討東亞組織的配列(東協加東北亞自由貿易區 APN、東協加三 APT、東亞自由貿易區 EAFTA 或東亞共同體 EAC)如何可能有助於擴大跨區域及(或者)區域間協定，諸如 APEC 和亞歐會議(ASEM)。如果東亞組織配列是穩定的，那麼逐漸成長的相互間連結關係，以及國家間經濟活動的連結，將在東亞國家之間產生出共同體的意識和警覺。¹⁷⁴如果不是東協加東北亞自由貿

¹⁷⁴ T. Terada, 2003,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from EAEC to

易區 (APN)，就是東亞自由貿易區 (EAFTA) 的國家對其能力很有自信，相信能創造屬於他們的跨區域組織，他們可能在跨區域的 APEC 層級上，更有意願擴張其制度化方面的努力，以得到新生活。如此一來，也可能導致更多區域間而非跨區域的結果，如澳洲-紐西蘭更緊密經濟關係 (Australia-New Zeal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CER)、東協加東北亞自由貿易區 (APN) 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這些都在 APEC 中執行運作，猶如三個明顯不同的輪軸中心 (hub)。相同地，東亞共同體意識越是增加，就越可能促成亞歐會議之論壇 (ASEM forum)，並導致單純的亞洲歐洲的區域間主義 (Asia-Europe inter-regionalism)。

那麼，關於第六個結果的可能發展路徑又是如何？在此情況下，我們可以總結此為排他性的形式。例如，「亞洲要塞」、「歐洲要塞」或「美洲要塞」，這是介於東北亞與世界其他地區之間關鍵的戰略關係。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國持續關注其自身的美洲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Americas, FTAA)，以及歐盟 (EU) 繼續他的東擴，或者可能向南擴張發展，那麼其他區域將感到被排除在外。在此情況下，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可能在西方區域安排形成與前兩者對立下，將再次點燃馬哈迪 (Mahathir) 所提倡的具排他性的東亞集團 (exclusive East Asian bloc)。此即為第十種結果。關於第七個結果可能發展的路徑，排除三邊聯盟的可能，在沒有中日聯盟的情況下，仍可能存在兩種雙邊協定關係。一邊是日本與南韓，另一邊則是中國與南韓，這兩造依然保有強烈動機透過在他們之間的雙邊協定來保障其集團財貨和利益。

在此，由於 WTO 和 APEC 兩者皆弱的情形下，將強化雙邊協定安排的程度，並且，這些雙邊關係的運作將成為東北亞貿易自

ASEAN+3,"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pp. 251-277.

由化的主導模式。如果某一造的雙邊關係具有強的經濟上的補足性，則可能導致一個強且廣的雙邊協定關係，此即為第十一個結果。如果這使得其他國家間觸發一具有競爭性的自由化過程，那麼此路徑的發展則可能形成良性的雙邊主義(benign bilateralism)。¹⁷⁵相反地，如果是經濟補足性弱的，那麼則可能導致一個強卻窄的雙邊協定，此為第十二個結果。在此情況下，似乎合理化了東北亞國家在中國與日本兩大陣營形成對峙的兩極，進而逐漸破壞在區域整合上的努力。最後小結，有害且致命的競爭性兩極雙邊網絡，很可能會傷害到其他多邊貿易協定的關係。¹⁷⁶

第二節、中日韓的區域策略

一、中國

在此，大略將中國的東北亞區域策略分為兩方面討論。首先是政治及安全方面，其次則是經濟面向。東北亞是世界上特別複雜的區域之一，尤其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國以驚人的發展速度崛起，在東北亞區域中的角色不容忽視。中國的一舉一動，牽動著此區域的每一條神經，其態度和思想策略格外受人矚目。儘管中國快速崛起，經濟大幅度擴張，但是，卻是不同於日、南韓及台灣經濟奇蹟的發展模式。¹⁷⁷此外，Alastair Johnston 表示，在許多外交方面，中國比起過去更加整合入區域和全球政經體系當中。然而，卻因為「中國正在崛起」，使得東北亞國家之間，尤其

¹⁷⁵ J.J. Schott, 2004, "Free trade agreements: US strategy and prioriti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¹⁷⁶ D.A. Irwin, 1993,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trade policies i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J. Melo and A. Panagariya (eds), *New Dimension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K. Aggarwal and J. Ravenhill, 2001, "Undermining the WTO: the case against 'open sectoralism'," *Asia-Pacific Issues*, Vol. 50, pp. 1-6.; J. Bhagwati, 2002, *Free Trade Toda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¹⁷⁷ Ezra F. Vogel, 2004,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East Asia,"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1, No. 1, pp. 46-57.

是美、日和台灣的不安全感增加。¹⁷⁸對此，Yu Xintain 提到中國現在致力於提供一個基於平等、互利、諮詢及合作的新安全概念。中國正盡最大的努力降低區域上的敏感議題，並且減輕區域的緊張情勢。這些都是在區域安全架構尚未完全建立完成的情況下所做的努力。¹⁷⁹最近這幾年，中國已經主動參與區域性的安全合作，並且促進安全制度的建立。在許多東亞安全合作關係之間，中、日、南韓三國關係是東亞區域穩定的重要關鍵。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必須面對以及處理一些關於促進東北亞安全合作的問題，例如，如何看待現存的美日與美韓軍事聯盟，並消除冷戰氛圍等等。

以上的討論，涉及中國維持現狀的問題。面對中國正快速崛起，關於中國對於國際現狀是否滿意成了重要關鍵。因為任何崛起的強權，都會被視為想改變全球權力分配的角色。權力轉移理論的學者 Organski 和 Kugler 定義維持現狀的國家，是指參與制定「遊戲規則」(rules of the game)並且從中獲得利益。「挑戰者」(Challengers)，或稱之為「修正主義的國家」(revisionist states)，則是在國際社會中擁有一個新的地位，使其地位與權力等量發展名符其實，並且希望重新起草或改寫國家間運作關係的遊戲規則。¹⁸⁰然而，儘管檢視一個國家是否想改變現狀，或者採取維持現狀的態度，是非常不容易且難以清楚明白。但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切入，仍有三項指標可知任何特定的行為者不願意維持國際現狀。¹⁸¹

¹⁷⁸ Alastair Iain Johnston, 2004,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65-100.

¹⁷⁹ Yu Xintian, 2005,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2, pp. 30-38.

¹⁸⁰ A.F.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9-23.; Jacek Kugler, et al., 2000,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

¹⁸¹ Robert Gilpin,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4. ; For a sophisticated summary of IR theory's definitions of revisionism, see Jay Lyall, 2001, *The Revisionist State: Definitions and Measures*, Cornell University. ; Alastair Iain Johnston, 2004, "China's

首先，第一個指標是「不願加入國際制度和國際社會關係的國家行為者」。對此，中國於 1980 年代之後，積極參與國際制度或組織。2001 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1994 年，東協區域論壇(ARF)成立之後，中國亦成為積極建設性的成員。只有一個處理北韓核武議題的「朝鮮半島能源發展組織」(Korea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中國沒有加入，不是成員之一，但是支持該組織的運作。其次，第二個指標是「雖然有參與若干國際制度，但是在制度裡破壞並違反規矩和規範的行為者」。例如，在聯合國內關於人權問題，中國對此最是敏感。以中國自身的觀點和憲法而言，與聯合國人權觀點不盡相同，在運作上出現某種程度的相斥，則變成非常棘手的意識型態問題。Alastair Johnston 表示，中國之所以擁抱全球資本主義的制度，無疑是透過經濟發展，以強化中國共產黨(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的正當性。此外，不僅 WTO 促使中國經濟市場化，APEC 亦在市場化、透明化、降低關稅、標準化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三個指標是「即使加入國際制度，也遵守裡面的規矩、規範，但是只要一有機會改變規則、規範，就會破壞制度原有的目的和制度社群」。然而，即使如此，中國想改變這些規則也沒那麼容易。Alastair Johnston 認為，真正的「問題」不在中國是滿意現狀或是不滿現狀，重點是中國的行為是否與美國利益相違背。¹⁸²根據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mmission)的一份報告指出，中美之間存在基本教義的衝突，對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65-100.

¹⁸² Alastair Iain Johnston, 2004,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65-100.

於全球秩序的觀點不同（多極 vs. 單極）。而中國的軍事及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其實是想把美國勢力排除在東北亞區域之外。

¹⁸³Alastair Johnston 提出三種假設，¹⁸⁴探討中國在東北亞地區逐漸成為「挑戰現狀」（或稱修正主義）的國家。

首先，第一個假設是中國本身的觀點及利益。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國際體系是多極體系，在此中國如何看待國際權力的重分配，就相對重要許多。當美國是單一超級強權時，中國能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下獲得利益，並且在美國霸權提供一定公共財及穩定下，享受全球相對穩定的秩序。在現階段的國際體系與規範下，中國可以確保其國家利益。如有突發狀況，美國的行為可能傷害到他國時，中國可以利用國際制度，即多邊主義而非軍事力量，來限制美國的行為。此即為透過多邊制度性平衡方式，限制美國霸權行為。換言之，中國要在東北亞區域內平衡美國。然而，中國的東北亞外交政策中，是否包含了建立區域霸權的戰略目標，或者更加限制為了捍衛領土而有修正主義（或稱改變現狀）的目標？努力積極地降低美國在區域上的權力與影響力的行為，在國際關係學理上稱之為「平衡」（balancing）行為。在區域上，中國是否正在平衡美國呢？

典型地，國家可以對內（即在區域內將經濟、科技與人力資源轉換成軍事或戰略上的權力）及對外（向區域外找盟友，並共享利益以對抗較強的霸權或主要強權國）做平衡。中國在 1990 年代開始進行軍事現代化計畫，目的就是在經濟快速崛起的同時，能提升能力以期平衡美國的權力。對外聯盟方面，不論是在區域

¹⁸³ See the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uly 2002, at www.USCC.gov/anrp02.htm.

¹⁸⁴ Alastair Iain Johnston, 2004,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74-90.

或是全球上，中國並沒有特別努力建構反美聯盟。目前，東北亞與東南亞國家基本上是支持美國在東亞區域上扮演「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特別是避免中國與日本競爭成為區域霸主。從近來中國積極參與多邊架構來看，中國主要支持多極體系，反對霸權。在經濟關係上依賴美國，在軍事安全上採取多邊制度性平衡美國。而美國則對東北亞採取圍堵政策，一方面目的圍堵北韓共產勢力以及武力行為，二方面不便言明針對崛起快速的中國。美國透過美日聯盟、美韓聯盟以及台灣關係，對東北亞區域採取權力平衡。對於中國，特別在台灣議題上，使中國屈於美國主導的安全秩序下。是以，台灣問題很可能導致強化或擴張中國選擇「修正主義」(revisionist)的路線與利益。

第二個假設是其他國家的因素，主要強調國內的決定，改變中國在東北亞國家間的利益認知。中國快速崛起，其權力和區域目標受到區域上相對於中國的其他崛起國家的權力影響，而非單純中國外交政策本身。毫無意外，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原本就存在著基本利益的衝突，尤其在東北亞區域上。始於中國意圖排除美國勢力於東北亞區域之外。換言之，在中國內部的國內政治意向上，就有此想法。簡言之，國內政治的轉變與決定，影響對外的看法。在此，有點類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而這些轉變意即在意識型態上的轉變。最後，第三個假設是互動下的變化，主要在台灣議題上影響中國的修正主義觀點。在此主要基於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行動以及政策上的互動。中國對外不論是採取何種避險措施，其他國家亦對其有些避險策略，乃至於美國前柯林頓政府與中國交往策略採取「軟圍堵」(soft-containment)策略，這些都是在以「中國威脅論」和「和平崛起論」的基礎上做反應。在這些互動的影響下，可能改變區域上的認知，特別是安全困境的出現，使中國對現狀的滿意度有所改變；反之，也或許有可能降

低兩難困境的緊張情勢。不論如何，對於中國，影響中國外交政策以及是否對國際現狀感到滿意，最明顯的因素正是「台灣議題」。

東亞是世界上特別複雜的區域之一，尤其是在安全議題上。因為冷戰結束之後，只剩下東亞區域保有冷戰時期的對峙狀況，例如南北韓、中國與台灣海峽兩岸。這些都是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對立下所遺留的痕跡。隨著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單一超強，繼續保持其在東亞地區的軍事霸權地位。美國藉由與東亞國家的雙邊軍事合作之軍事聯盟來維持。如果有單一超強主導之，將不需要任何關於安全區域主義的討論。¹⁸⁵而且，在東亞許多國家間仍存在不少爭議，舉凡領土、領海等等。在經濟發展上，亦相當不均衡。此外，在民族、宗教與文化上，仍有很明顯的分歧。因此，許多人相信要在東亞形成任何形式的區域整合，都是非常困難的，更別說安全上的區域主義。中國是東亞一個大的國家，在世界上他擁有多個鄰國，這樣的情況為中國的安全帶來很大的挑戰。但是，另一方面，正由於中國的鄰國包含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以及中亞，所以中國也有更多的機會促進區域上的安全與和平，現在中國正把握這個機會，在區域穩定上做出努力。並且致力於提供一個基於平等、互利、諮詢與合作的新安全概念。

在此過程中，中國正盡最大的努力降低區域上的敏感議題，並減輕區域的緊張情勢。此外，思考和平的方式以解決區域上的問題。對此，Yu Xintain 提及目前東北亞區域的兩大問題。一是南北韓之間存在北韓核武議題，二是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兩岸關係議題。相較於東南亞地區，東北亞的安全合作程度較低，而且東北亞是強權雲集之地，特別是在許多東亞安全合作關係之間，中、

¹⁸⁵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2003, *Regional Power: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6-63.

日、韓關係著東北亞與東亞區域秩序的穩定，是以中國主動參與並建設區域安全制度。Yu Xintian 表示，或許可從能源合作機制開始，降低東北亞中日韓三方之間的敏感神經，希望能創造三贏。然而，仍存在一些關係到促進東亞安全合作的問題，如：如何看待現存的美日與美韓軍事聯盟、如何使韓國成為東北亞安全合作的主導角色，以及為了消除冷戰氛圍，建立信任和認同，以促成東亞安全合作。¹⁸⁶關於現存的美日與美韓軍事聯盟，美國在東亞擁有重要的利益與影響力。在安全方面，美國執行權力平衡政策 (balance of power)，主要透過軍事聯盟與軍事合作。東協(ASEAN)則透過東協區域論壇(ARF)以達到平衡東協與大國之間的權力。冷戰結束後，美國與日本曾建議將美日安全聯盟(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變成區域安全保證，而非單純的防衛日本的協定。

南韓政府亦改變美韓軍事聯盟的意義，在美國與亞洲之間做出更多的平衡改革，並且在建立東亞安全合作機制上扮演積極的角色。因此，如果美日安保聯盟將扮演區域安全制度的角色時，其目標以及涵蓋的地區等，都得做改變。中國則表示願意與希望接觸美日與美韓聯盟，並與之對話，以便在一定共同區域利益的基礎上，進行合作。但是，中國不願加台灣以國家名義納入其中。第二，如何使韓國成為東北亞安全合作的主導角色，關鍵在於，從地緣關係而言，韓國東北亞三國之間位處中心。以戰略關係而言，韓國可以在東北亞安全合作上扮演中心的角色。並且，能以橋樑的角色，遊走於美國與中國之間，乃至於日本與中國之間。最後，第三，在東北亞安全上，沒有互信關係，就沒有制度可言。因此，要降低並消除冷戰氛圍，建立信任與認同，減少雙邊誤解，如中日之間，如此才可能促成東北亞安全更進一步的合作。

¹⁸⁶ Yu Xintian, 2005,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2, pp. 30-38.

經濟方面，中國的經濟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當中。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世代夢想著國家富強。如今拜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所賜，現在正在實現。但是，中國的快速成長模式不同於日本、台灣和韓國。過去，日本、南韓和台灣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勞動力短缺，而且，在競爭之下，勞動人口迫使公司企業提高薪資。如此有了一段以勞力導向的高成長時期。然而，現在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則不同。根據估計，大約有一億五千萬的失業鄉村人口正急於找工作。在如此驚人的經濟成長下，中國的基本工資仍相當低，同時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導，這樣的情況很可能還得持續二十年之久。¹⁸⁷就目前為止，中國內陸地區的中產階級仍然屬於少數。中國的經濟尚有許多問題，失業就是一大問題。尤其沿海地區的生活水準與內陸地區有著相當大的差距。然而，儘管如此，這樣的情況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得到很大的改進。因為中國自1977年開放出國留學，受過外國高等教育的人才可能將新知湧回中國。教育會快速改變中國的思想 and 社會，加上現在中國有許多省份都會送一些官員到海外受訓，接受新知。但是，在民主實踐與精神上，中國依然遠落後於西方、日本、南韓和台灣。不過，自1990年代之後，快速崛起的中國變得越來越有自信，開始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如世貿組織(WTO)、亞太經合會(APEC)、上海合作組織(SCO)等等。中國亦想成為主導國際的強權。

由此可知，中國深化參與世界經濟已是不可否認的。就多邊主義而言，中國參與許多全球和區域上重要的經濟制度，例如：世貿組織(WTO)、亞太經合會(APEC)、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亞洲開發銀行、亞歐會議(ASEM)對話和東

¹⁸⁷ Ezra F. Vogel, 2004,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East Asia,"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1, No. 1, pp. 46-57.

協加三 (ASEAN Plus Three, APT; 東協十國加上中日韓三國)。中國現在是全球市場的重要成員。的確，中國對外經濟關係在現今定義為參與全球生產和交流的程度。在世界政治經濟上，中國以後來居上的角色影響著「商業」與「國家」兩者的位階秩序 (hierarchy)。¹⁸⁸ 中國以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姿態崛起，並成為世界 (生產) 工廠。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體系正在進行革新。自從 2001 年加入 WTO 之後，中國的制度從對外貿易制度、外匯投資法和智慧財產權的標準等，產生了重組和改革的效應。在此過程中，或許更重要的是引領中國經濟向上發展的夥伴。目前，中國正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體系的行列，且已完成不少，但沒有實質妥協一些規範、原則和規則，以建造自由的國際經濟體系。於此，以東北亞區域而言，中國最近的整合行動已完成許多，且夥伴遍及東北亞。¹⁸⁹

自 1996 年起，歷經了 15 年的努力，終於在 2001 年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WTO)，正式宣告參與世界經濟體系的行列。一個崛起的經濟強權，中國。加入 WTO 之後，帶給世界一定的衝擊。特別是東亞地區，因為不確定中國崛起對於區域經濟而言，是機會或是威脅？另一方面，中國的企業增強了競爭力，可能取代東協等開發中國家，甚至是日本、南韓及台灣之已開發國家的出口市場。然而，隨著時間的改變，中國在區域經濟上的角色也許會變得更具建設性，並承諾參與多邊經濟的合作。換言之，快速崛起的中國，其所得不必然是鄰國的所失。自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之

¹⁸⁸ Thomas G. Moore, 2004,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101-134.

¹⁸⁹ Margaret Pearson, 1999,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gime,"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Margaret Pearson, 1999, "The Maj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Engage Chin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後，並且加入 APEC 與 WTO 之後，中國除了踏出一大步整合入世界經濟大家族的行列之外，最明顯的變化便是對外貿易與外來直接投資有了大幅度的成長。此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來臨，以及東亞區域不斷擴張的多邊主義發展，中國在東北亞的雙邊經濟關係仍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對中國而言，互利的經濟關係通常也有助於降低政治或安全上的緊張關係。以下簡短討論中國與南韓、日本及美國的雙邊經濟關係。

中國自從 1992 年與南韓建立外交關係以來，與南韓的經濟關係擴張地很快。雙方的經濟關係不僅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增加中國對朝鮮半島的興趣。到了 2001 年，中國視南韓為繼日本之後第二大的貿易夥伴。從世界的角度來看，南韓則是中國第四大的貿易夥伴。此外，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儘管在歷史上有糾紛、意識型態也大相逕庭，且在地緣政治上是對手關係，但是，自 1972 年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後，中日雙方的經濟合作就益加重要。在經濟關係上，中日雙方各自都是對方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然而，隨著中日兩國的經濟互賴程度增加，卻也造成政治上的緊張氣氛。因為中國加入 WTO，不僅在亞洲區域上，在世界經濟版圖上亦被視為是崛起的經濟強權。這對東亞區域巨頭日本而言，不啻是一種威脅。中國與日本在競爭亞洲區域經濟的龍頭領導角色，特別是在東協加三 (APT) 當中。此外，中國與美國的雙邊關係，在 2001 年 911 事件之後深化關係。

中國參與東北亞經濟的區域主義，特別是在一些區域經濟論壇中與其東北亞的夥伴互動，如：APEC、東協加三 (APT)、上海合作組織 (SCO)、博熬論壇 (the Boao Forum for Asia)、圖門江開發計畫 (TRADP) 等。APEC 自 1989 年成立之後，其年會逐漸被受重視，是亞太區的重要年會。然而，在促進自由貿易和投資進展

上成效不大，而被稱為政治性「談話場所」。可是，中國加入 APEC 之後，仍積極努力追求各種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如此，顯示其一貫立場，堅持發展議題與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努力同樣重要。而美國則努力想將 APEC 轉型為更正式、以規則為基礎的組織，但中國則扮演阻撓的角色。¹⁹⁰自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亞經濟區域主義的重心已漸從 APEC 轉移至東協加三 (APT)。在實行上，APT 可說是東亞經濟團體 (EAEG) 的化身。EAEG 是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於 1990 年所倡議的，並於 1991 年改名為東亞經濟預備會議 (EAEC)。當時，美國、日本、南韓和新加坡把重心放在 APEC 上，並視 APEC 為重要的區域論壇。但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日本、南韓和新加坡等國在不同程度上，開始將重心轉向 APT 的發展，並且研究未來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

然而，中國的願景不若南韓那樣宏大，南韓希望能更緊密的區域經濟整合，並朝向「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 的方向發展。中國則視 APT 為「東亞合作的主要管道」，而且 APT 對外亦保持開放，並且適當情況下，準備與世界其他區域的合作機制建立交往關係。¹⁹¹此外，APT 亦提供東北亞三國（中、日和南韓）之間的對話機制。現在，中國真心希望 APT 專心在區域經濟合作上，並輔助性的關注非傳統安全議題。值得注意的是，2000 年末葉，中國開始研究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經過一年辛苦對話之後，中國與東協雙方簽訂「綜合經濟合作的架構協定」。目標是中國與東協五個創始會員國於 2010 年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FTA)，以及與東協另外四個新加入的會員國（柬埔寨、寮國、緬甸及越南）於 2015 年，建立自由貿易關係。而今，中國東

¹⁹⁰ Thomas G. Moore and Dixia Yang, 1999, "China, APEC, and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13, No. 2, pp. 361-411.

¹⁹¹ Thomas G. Moore, 2004,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101-134.

協的自由貿易區已於 2010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路。

面對全球化與區域主義兩股勢力，中國視為彼此互補的力量。對此，中國對外採取「有限的開放」(controlled opening)，意即「策略性的開放」，而非「無限制的開放」。對中國而言，自由貿易區是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形式，並且意識到區域秩序穩定的重要性。因此，對外經濟關係以「互賴」(interdependence)為主要外交政策，採取接納、包容的態度，不排斥全球化，也不拒絕區域主義。¹⁹²中國的世界觀在改變，觀念和看法正在轉變，願意透過多邊合作機制來追求經濟上的安全與國家發展。然而，儘管正面看待區域經濟的多邊合作，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多邊合作機制只是新自由主義的手段，以便達到現實主義的目的。增強國家實力與國際影響力，才是中國真正目的。

二、日本

面對中國快速崛起，不少評論表示中國將取代日本成為亞洲霸主。對此，Aurelia Mulgan 並不認同。相反地，欲了解東北亞的未來，乃至更廣泛的亞太地區，認為只看見崛起的中國而貶低日本，就是個錯誤的看法。Aurelia Mulgan 表示，中國的崛起不必然代表日本的衰落。日本亦是崛起的強權，而非過氣將淘汰的強國。中國的崛起，只是意謂著日本在區域上與全球上的地位有了轉變。換言之，事實上，中國的崛起將伴隨著日本的持續崛起。從經濟面上而言，根據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的官方數字，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民生產毛額亦是中國的 2.5 倍，軍事國防預算亦排第二名。儘管中國在貿易上快速成長，日本在金融上的

¹⁹² 宋興洲，2007，中、日、韓三國地緣經濟策略之探討，收錄於王效平、李思名、饒美蛟主編的《新世紀的東亞經濟合作》，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頁 127-146。

實力，在亞洲地區仍然領先群雄。即便可能將被中國取代，日本的在世界上依然是第三大經濟體。¹⁹³在軍事科技方面，乃至於商業民生工業上，日本都領先中國。只是，在勞動力人口上，未來日本得面臨兩大危機：低出生率以及人口老化。這是日本的嚴峻課題之一。

在外交影響力方面，日本積極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的位子，並且持續努力使日本成為「正常化」國家。在國際合作及人道救援行動上，日本把握機會將軍力移動至海外，以執行救援任務。另外，在軟權力方面，日本在文化藝術上的影響日益擴大，如日本動畫遍及世界各地。同時，在體育界亦鼓勵與支持跨國交流與合作。之所以中國崛起會使日本在戰略上更加重要，是因為在政治、經濟及軍力的份量上，只有日本足堪擔當區域上制衡中國的平衡者角色(balancer)。然而，並非鼓勵中日衝突，只是說明在某些方面，快速崛起的中國使得日本相較於美國和亞太其他國家，加倍重要。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日本會平衡中國，而非扈從之。對美國而言，因為與中國有著地緣戰略位子上的關係，日本更具戰略價值，是以美日聯盟關係相形重要。

隨著中國快速崛起，日本面臨許多挑戰，舉凡政治、經濟、安全以及環境。對此，有些日本決策者認為是「威脅」。然而，對於日本的中國政策，Vogel 認為日本已經與中國深入交往，因為對中國與日本而言，經濟關係相當重要。儘管如此，歷史糾葛依舊擋在眼前。此外，在東南亞區域上，日本長期對東協財力上的援助，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之於東南亞則更具影響力。因此，中日雙方在東南亞地區上亦有一番角足。對於美國，日本積極協助

¹⁹³ Aurelia George Mulgan, 2005, "Why Japan Still Matters,"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2, pp. 104-121.

美國重建伊拉克，除了強化與美國的關係之外，更希望在面對中國軍事現代化與強大化時，能夠成為正常國家，可將其自衛隊移動至他國執行任務。是以關於安全，Vogel 認為美日之間的合作，至關重要，而非單獨採取防衛政策。¹⁹⁴對此，Hughes 則主張日本採取「預設性交往策略」(default engagement strategy)來回應中國的崛起。¹⁹⁵在區域上，採取與中國交往，以便進一步經濟發展，此乃世界不可逆的趨勢。在全球戰略上，則透過雙邊（美日安保、日俄、日澳、日印等）或三邊（美、日、中）的互動關係，採取圍堵平衡中國的策略。

日本未來選擇與中國既競爭又合作，都將影響著中國在區域上崛起發展。的確，日本與中國在管理兩者關係的能力上，經常被視為是中國未來在區域上的地位最重要的考驗。在中日之間的關係，存在著許多可能的情境發生，從和平共處到關係急轉直下，甚至爆發軍事衝突。¹⁹⁶當然，日本面對崛起中國的任何回應，不只對區域，也對全球造成影響。除了國際間的互動，國內政治亦影響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其實，日本已經表現出圍堵政策的徵兆，以便平衡中國，並強化其自身的軍事力量，與美日安全合作更加緊密，且靜靜地平衡中國。在區域上，中國在長期政治、經濟，甚至是安全上，是非常重要的夥伴，以致於不能切割與日本，及其他東亞國家的關係。¹⁹⁷然而，在安全上，日中關係仍有所限制，日本最終還是依賴美日安保條約。只因為日本採取的是，經濟自由主義，政治民族主義。因此，日中之間的关系，並沒有因為經

¹⁹⁴ Ezra F. Vogel, 2004,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East Asia,"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1, No. 1, pp. 46-57.

¹⁹⁵ Christopher W. Hughes, 2009, "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re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4, pp. 837-856.

¹⁹⁶ Denny Roy, 2005, "The sources and limits of Sino-Japanese tensions," *Survival*, Vol. 42, No. 2, pp. 191-214. ; Bill Emmott, 2008, *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 London: Allen Lane.

¹⁹⁷ Glenn D. Hook, Julie Gilson, Christopher W. Hughes and Hugo Dobson, 2005,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pp. 191-192.

濟貿易關係而變得順遂。¹⁹⁸自從冷戰結束之後，進入了後冷戰時期，日本面對來自中國新的政治、經濟及安全上的挑戰。

首先，中國崛起已經影響到日本其對主導東亞國家的地位，以及區域整合努力的領導者角色。對此，日本與東協國家的「特別關係」正與中國的南向交往政策互別苗頭。此外，日本也已受南韓調戲日本似的與中國關係緊密，而感到不安。¹⁹⁹然而，日本深化與中國的雙邊經濟整合，是非國家以及政府間層級合作的重要助力。但是，這卻也提高了日本的焦慮，擔憂中日之間的互賴關係之重心導向中國，亦即日本擔心依賴中國程度較高。²⁰⁰對日本而言，除了經濟安全威脅，尚有軍事安全的顧慮。如果說北韓核武危機是短期間的主要威脅，那麼中國則是對日本國家安全上，最大的長期威脅。²⁰¹日本的決策者擔憂中國的傳統武器以及核武能力不斷地現代化，並且持續倍數增加其軍事預算。中國因為軍事計畫缺乏透明化的情況下，已使其鄰國感到不安。此外，關於共同戰略利益上，目前中日兩國最主要的「互利關係」(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就是企圖解決東中國海(East China Sea)天然氣田的爭議。

日本之所以持續與中國進行雙邊交往，乃希望使中國在區域崛起的影響力能有和緩適宜的結果。雖然日本的決策者並非一直只有依賴雙邊機制而已，相反地，努力通過三邊架構，包括日本、中國以及美國。對日本而言，現在與美國的關係已不再是與中國

¹⁹⁸ Ming Wan, 2006,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83-108.

¹⁹⁹ David Shambaugh, 2005,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p. 75-80.

²⁰⁰ David C. Kang,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76-177.

²⁰¹ Christopher W. Hughes, 2009, "'Super-sizing' the DPRK threat: Japan's evolving military posture and North Korea,"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March-April.

交往的主要國際背景。美國留在東亞區域的主要重點，就是平衡中國不斷崛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並且，最重要的就是透過美日聯盟提供區域的安全保證。在此區域，面對北韓核武及台灣問題，美日雙方的焦點則從雙邊安全轉移至日本在東亞更廣泛的地區。為此，美軍和日本自衛隊將進一步合作，並擴大其聯盟合作的功能與地理範圍。當然，日軍亦進行轉型以提升其本身國家軍事能力，才足以支援美日聯盟的任務。²⁰²自 1990 年中期，日本則強化與美國的安全關係，以提供必要的安全支持面對中國崛起，並且保持美國在三邊機制當中。同時，亦清楚地提高聯盟的兩難困境。首先，日本冒險利用台灣誘發中美衝突；其次，美國則考量其利益，最好是強化與崛起的中國間的關係，而非發展停滯不前的日本。如此一來，三邊機制各自盤算避險策略，透過相互制衡的方式，追求各自利益。

日本透過雙邊與三邊架構上加倍努力，以面對中國的崛起。不論是在亞太經合會(APEC)、亞歐會議(ASEM)或是東協加三(APT)，日本透過東亞各種架構功能與中國交往，並試圖沖淡以減弱中國崛起的實力。然而，日本外交部發現，2000 年在東協加三會議(APT)下產生的清邁倡議(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已經能夠與其對手中國建立緊密的工作關係，而且，中國準備放棄一些區域財金合作事務上的領導角色給日本。²⁰³然而，日本仍擔心只單純在東協加三架構中與中國交往。是以，日本另外再與其他深受中國影響的國家，例如新加坡和印尼，以促進額外的區域主

²⁰² Christopher W. Hughes and Ellis S. Krauss, 2007, "Japan's new security agenda," *Survival*, Vol. 49, No. 2, pp. 157-176.

²⁰³ Helen E. S. Nesadurai, 2008, "Southeast Asia's new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for cooperation in trade and finance," in 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 eds, *Asia's new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evolving structures for managing trade, financial, and security relations*, Berlin: Springer, pp. 171-173. ; William W. Grimes, 2009, *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 the great power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g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05-109.

義形式。²⁰⁴此外，日本藉由與東協個別國家簽訂雙邊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s)，以回應中國在東南亞逐漸增加的影響力。並且，促使日本於2008年4月與東協簽署日本-東協綜合經濟夥伴協定(Japan-ASE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CEPA)，包含自由貿易、投資、服務以及經濟上的合作。²⁰⁵日本做了很多努力，舉凡在金融合作上的交往策略，或者是所謂的「圍堵」(blocking)策略，都已成功地防止中國達到崛起實力的完全體。²⁰⁶然而，這樣的策略並非沒有風險。日本想融合更具連貫性、以東亞為中心的區域、更廣泛的圍堵策略，例如可從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為例，這是完成一個廣大區域自由貿易區的重要一步。但是，這也許會有反彈，正如同日本發現自己可能被孤立於區域整合的努力之外。

除此之外，面對中國崛起，中國擴張其全球權力，並且以此提升其區域權力，日本有必要以新的全球策略回應之，主要的目的在於圍堵，而非交往。對其他區域的回應，首先是俄羅斯與中亞，日本與俄羅斯進一步達成新戰略關係，特別是能源和石油的合作。其次是日本希望拉攏澳洲，並與澳洲深化雙邊經濟及安全合作。當然，還有印度，日本視印度為重要的安全夥伴。²⁰⁷加上美國的角色，日、澳、印、美四強可形成「民主國家交響樂」。目的都是為了平衡中國崛起的影響。此外，還和中國在中亞區域展開競逐，以及爭取非洲，企圖對抗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並且，在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上，不放棄努力。日本的決策者

²⁰⁴ Takashi Terada, 2006,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ASEAN+3," in Bertrand Fort and Douglas Webber, ed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London: Routledge, pp. 229-233.

²⁰⁵ Christopher W. Hughes, 2009, "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re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4, pp. 837-856.

²⁰⁶ David P. Rapkin, 2001, "The US, Japan and the power to block: the APEC and AMF cases,"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pp. 373-410.

²⁰⁷ Satu Limaye, 2006, "Japan and India after the Cold War," in Yoichiro Sato and Satu Limaye, *Japan in a dynamic Asia: coping with new security challenges*, London, MD: Lexington, pp. 234-239.

仍決定分配國家資源以確保面對中國崛起的利益，並且不放棄成為區域領袖的地位，不讓對手中國輕易得手。對日本而言，日本的預設性交往策略只是與中國交往的方式之一。日本得持續依賴經濟實力，這是與中國交往的主要手段。而要維持美國在東北亞的角色，就得逐漸擴張美日軍事聯盟的合作，以及日本自身的國家軍事能力。日本的全新全球戰略不只地緣廣闊，透過利用不同的權力資源，展現出能及時主動地包含中國的影響力。簡單的說，在區域經濟上，採取與中國交往合作，以促進經濟發展。在全球戰略上，則透過雙邊（美日、日俄、日澳、日印等）或三邊（美、日、中）互動機制，對中國採取圍堵平衡的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主黨政府於 2010 年 2 月 18 日，在首相官邸為預定年底修訂的「防衛計畫大綱」（防衛大綱），首度召開直屬日相鳩山由紀夫的討論會議，「新時代安全保障與防衛力懇談會」。所謂日本的「防衛計畫大綱」如下表 4-1 所示。此次日本修訂防衛大綱的重點在為日本日後如何因應北韓與中國擴軍威脅，一般預料，日本如何面對北韓與中國威脅將是核心課題。並且，修訂結果將反映執政民主黨的安保政策，因此備受關注。²⁰⁸過去，日本曾兩度根據國際局勢，修訂主導防衛走向的防衛大綱。鳩山首相於 18 日當天於會中表示，「重新檢視防衛體制，須『持續』與『變化』兩者兼具，希望與會人員能毫無顧忌地以各種角度深入討論。」鳩山首相也在言談間透露，日本如何因應北韓核武、飛彈研發，以及中國軍事現代化等等，將是防衛大綱修訂的核心課題之一。預計今年夏季 8 月底前提交報告書，年底前完成修訂。日本「每日新聞」報導指出，此次修訂討論會的主要議題是中國威脅。中國擴軍至今未曾透明化，其國防經費連續 21 年成長，而且中國海軍在日本近海活動也日趨頻繁。日本政府內部對

²⁰⁸ 鄭曉蘭編譯，2010 年 2 月 20 日，日修防衛大綱，鎖定中國擴軍，《自由時報》，A12 版。

此疑慮漸深。另一方面，民主黨小澤一郎去年底率百多名國會議員在內的參訪團，赴中國訪問，遭外界認為「與中國靠攏」。在此矛盾下，如何定位中國，將是日本的重大課題。此外，會中預料將討論放寬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則」，²⁰⁹並准許日本與他國合作研發武器的可能性。而且，其他可能觸及的議題，還包括美日同盟深化、集體自衛權（協防友邦）的憲法限制等等。

表 4-1 日本的「防衛計畫大綱」²¹⁰

防衛大綱的時代背景與基本思維	
	「51 大綱」(昭和 51 年、1967 年制定)
冷戰緊張情勢緩和	「基礎防衛力構想」, 重視最低必要程度的嚇阻效果
	「07 大綱」(平成 7 年、1995 年修訂)
冷戰結束、阪神大地震	沿襲「基礎防衛力構想」, 為自衛隊增加因應大規模災害等主要任務
	「16 大綱」(平成 16 年、2004 年修訂)
全球面臨恐怖攻擊 北韓核子或飛彈等新威脅	重新審視「基礎防衛力構想」, 「重視嚇阻」轉換成「重視對應」
	「22 大綱」(平成 22 年、預定 2010 年修訂)
中國軍事擴張、北韓核武以及飛彈威脅增強	?

資料來源：日本「讀賣新聞」，製表：編譯鄭曉蘭

三、南韓

南韓的外交政策目的是「富國強兵」，走現實主義路線。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世界裡，以確保南韓以主權獨立國家生存下去。為確保國家生存，現實主義觀念強調極大化物理實力，以便做到軍事力量的自助(self-help)，還有人力的有效動員、物質資源以及追求與美國的聯盟關係。在冷戰期間，南韓的安全實踐就是加強型現實主義的最好描述。南韓也已經從追求發展式的現實主

²⁰⁹ 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則」：不出口至共產國、聯合國禁止國，以及國際紛爭國。

²¹⁰ 最初訂於 1967 年冷戰時期，為日本國家安全保障的基本方針，並據此擬定主要軍備數量或 5 年中期防衛能力整備經費與計畫。

義下，非常成功地確保其國家生存和促進其經濟繁榮。然而，自 1980 年代末，南韓面臨了新的內外環境的嚴厲挑戰。後冷戰時期的到來，全球化的擴散，以及民主化的過程，這些對南韓外交政策提出了深厚的挑戰，並且最終改變內在與外在環境。²¹¹冷戰結構瓦解以及新出現的戰略變數已經有顯而易見的影響。²¹²然而，雖然冷戰結束後帶來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但是，南韓依然一如往昔的感到不安全與不確定感。以下有幾個因素強調此趨勢：首先，儘管歷史上於 2000 年 6 月南北韓舉行了高峰會談，但是，兩韓仍然沒有達成任何有意義的措施，以降低雙方的軍事緊張，並且建立互信機制；其次，儘管冷戰結束了，但是有限的嚇阻結構依然存在；²¹³最後，美國對區域的承諾不能視之理所當然。

隨著蘇聯解體之後，東北亞進入單極美國霸權的階段。但是，對於美國是否有意願或企圖在此區域扮演霸權的角色，並不清楚。另外，同樣重要的是全球化的影響。全球化影響南韓有兩個重要的方式。首先，無法控制的外在震撼，使體系的脆弱性逐漸增加，並且國際經濟體系亦影響國內經濟。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全球化的負面效應最明顯的例子。此外，第二則是全球化對國內制度的影響。全球經濟自由化的散播，已經根本性地破壞了舊的對內與對外管理模式。南韓不太能繼續享有舊的搭便車行為，例如透過其他刺激的形式有系統地促進出口、不願引進自由化，以及不履行國際協定。隨著全球化的效應，逐步地弱化了傳統發展國家的角色。然而，逐漸深化的國際經濟交易本質，折損

²¹¹ Chung-in Moon and Taehwan Kim, 2004, "South Ko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llenges to Development Realism?"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251-279.

²¹² Chung-in Moon, Odd Arne Westad, and Gyoo-hyoung Kahng, eds., 2001, *Ending the Cold War in Kore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²¹³ Chung-in Moon, 2000, "Changing Threat Environment, Force Structure, and Defense Planning: The South Korea Case," in Natalie Crawford and Chung-in Moon, ed., *Emerging Threats, Force Structures, and the Role of Air Power in Korea*,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pp. 89-114.

了其監聽與調節的能力，順從國際標準以及非政府行為者的增加，包括一些交易單位，也都侵蝕了南韓的自主性與指導對外經濟政策的力量。²¹⁴最後，民主轉型和鞏固基本上在南韓的對外行為之下，重整國內的情勢。換言之，外交政策的制定與結構，正在新的民主轉型與鞏固時期進行改變。

面對以下外在與內在的挑戰，南韓該如何達成外交目標？以下提出四個主要選項。首先，第一個是單邊的外在關係管理。在地緣政治方面，這可能涉及與美國聯盟關係的結束後，不是追求中等強權，就是追求永遠的中立國地位。如果兩韓之間的關係有很大的突破，如兩韓統一，不論是國家聯盟、聯邦、邦聯或是單一的統一國家，那麼重新聯盟地緣政治的關係就變得比較合理。在地緣經濟上，單邊管理被視為若不是追求自我信任，就是繼續重商主義的政策。然而，從南韓現階段在國際經濟上的狀況，以及其多邊和雙邊契約義務和壓力，單邊管理的選項似乎很高的程度不太可能。其次，第二個選項是雙邊管理，即強調在其對外關係上雙方互動的重要性。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角度而言，雙邊主義是最基本的對外管理形式。雖然在近幾年來，有許多邁向區域和多邊合作的努力，但是南韓還是將其外交與安全政策寄託在雙邊管理上，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南韓與美國的雙邊聯盟關係。

然而，在地緣經濟上則有所不同。儘管現在國際經濟貿易有被多邊機制取代的跡象，例如世貿組織(WTO)的規範、原則與規則。可是，南韓一樣可以透過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達成雙邊管理。還有，像是雙邊優惠貿易協定亦可以加強貿易與經濟上的成長。第三個可能的選項涉及區域主義(regionalism)。南韓可以透過

²¹⁴ Eun Mee Kim, 1999, "Cri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e in South Korea," *Asian Perspective*, Vol. 23, No. 2, pp. 35-55. ; Susan Strange, 1996,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與區域其他行為者集體協調與合作，以追求其安全與繁榮。在管理地緣政治的議題上，其可以是協調其他國家的角色，如同區域協定的一部份，²¹⁵或者區域多邊的安全機制可以協調三個或更多的國家間關係。²¹⁶與此同時，面對地緣經濟議題，南韓可以尋求開放式的或是封閉式的區域主義。²¹⁷第四個選項，南韓也許可能尋求多邊的其他方式，來面對後冷戰時期及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為了處理目前地緣政治的議題，南韓能考慮多邊安全合作的選項，例如透過聯合國加強集體安全機制。即便是朝鮮發生衝突，亦可在此架構下處理。全球經濟自由化立基於多邊主義，亦可提供機制以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南韓可以加倍努力維持全球經濟自由化，藉由如 WTO、國際貨幣基金(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國際機制的方式。²¹⁸

冷戰結束之後，南韓面臨一系列的地緣政治議題，最立即的任務就是如何處理朝鮮衝突。2000 年的朝鮮高峰會議就是希望改善兩韓之間的關係，避免任何的基本變化朝向威脅及軍事計畫等方向發展。透過有效地軍事嚇阻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此方式依然是地緣政治議程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除了兩韓之間的關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飛彈持續影響南韓地緣政治的情況，例如北韓核武威脅。對此，南韓的決策者非常關心東北亞區域未來的戰略穩定。只要有美國繼續在區域中，南韓相信區域將維持一定的穩定。此外，雙邊管理構成南韓在後冷戰時期地緣戰略外交

²¹⁵ Susan L. Shirk and Christopher P. Twomey, eds., 1996, *Power and Prosperity: Economics and Security Linkages in Asia-Pacific*, Somerst, N.J.: Transaction. ; Charles A. Kupchan, ed., 1998, *Atlantic Security: Contending Vision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²¹⁶ P. Kerr, A. Mack, and P. Evans, 1995, "The Evolving Security Discourse in the Asia-Pacific," in Andrew Mack and John Ravenhill, ed.,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p. 233-255.

²¹⁷ Fred Bergsten, 1994, "APEC and World Trade: A Force for Worldwide Liber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pp. 20-26. ; Robert D. Hormats, 1994, "Making Regionalism Safe," *Foreign Affairs*, pp. 97-108.

²¹⁸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Jr., 1985, "Two Cheers for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Vol. 60. ; John G. Ruggie,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的核心。美韓聯盟就是最成功的西方聯盟之一，而此則展現了恩庇扈從關係(patron-client)，美國像是善良的老闆，南韓則是忠心的隨從。後冷戰時期，美國在朝鮮半島上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首先，南韓試著利用美國成為朝鮮的維和者(peacekeeper)。許多官方高層、國防人員以及南韓百姓，都視在南韓的美軍是避免戰爭爆發最重要的設置，這是一種有效嚇阻的方式。其次，美國可以在維持和平上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當維持和平是為了避免戰爭爆發，或是透過嚇阻與壓制衝突來維持現狀，那麼維持和平則涉及衝突情況的轉型過程，並進入一個更加和平的關係。第三，也是最後一個，則是南韓想看到美國在建立和平過程上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並且更關注在穩定的和平上，而非「缺乏對戰爭的準備，或嚴肅地期待戰爭」。

對此，美國應該更努力散播自由市場機制。如商業自由主義所表示，市場經濟與經濟互賴的深化，有助於降低戰爭的發生²¹⁹。此外，美國亦努力散播民主和平論，並試著將自由民主傳遍東亞地區。由於至今民主國家之間並沒有互相衝突發生，因此擴大將民主輸入北韓，乃至整個東亞地區，不僅對穩定和平有助益，亦為朝鮮半島帶來和平契機。對南韓而言，除了美國之外，日本是另一個重要的安全夥伴。日本和南韓在美國安全保護傘下，維持著類似聯盟的關係。Cha 指出，因為害怕美國放棄維持區域的安全，使得日本和南韓在安全合作的關係上更加緊密。²²⁰然而，對於日本殖民歷史的記憶，亞洲其他國家對於日本可能的軍國主義再現，特別敏感。對此，應該是南韓有最強烈的感覺。是以，日本的新安全倡議和南韓的打算，最終還是較傾向形塑日本、南韓

²¹⁹ Robert Keohane, 1989,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in John Dunn, ed., *The Economic Limits of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65-194.

²²⁰ Victor D. Cha, 1999,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和美國三邊關係的結構。此外，在東北亞區域，中國對於朝鮮半島的傳統政策是「既非統一，也非戰爭」，南韓則有效地利用這點。²²¹有趣的是，南韓與中國的關係，不僅在經濟和政治上有明顯的發展，南韓亦積極地與中國在軍事接觸與交流上進一步交往。此趨勢可以解釋一部份是因為 1997 年美日安保體系建立之後，中國努力增進其與南韓的安全關係。

然而，有幾點因素影響著南韓與中國之間的雙邊關係。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國。如果美國相信權力轉移理論 (power-transition hypothesis)，²²²並企圖圍堵中國，因為「中國威脅」論 (China threat thesis)。那麼，南韓與中國之間的友誼關係就非常難以維持，只因此舉對於南韓與美國的聯盟關係會有風險和危機。此外，第二個關鍵因素則是北韓。還有，第三個可能的因素是台海危機 (Taiwan Strait crisis)。這些在在影響著南韓與中國的雙邊關係。除了雙邊管理外，南韓也追求其他混合不同的策略，例如與美國及日本的三邊合作關係等。南韓亦對美國能長期做為東北亞霸權穩定者的角色之想法，認為不可過度盡信。面對新的區域無政府狀態結構，南韓的決策者展開尋求區域多邊安全合作的機制。1993 年 5 月，南韓前總統金泳三強調區域多邊安全對話的重要性，此番談話是在亞太經合會 (APEC) 的高峰會上所提出。並且，在 1994 年 7 月，南韓外交部長提議建立東北亞多邊安全對話機制，與東協區域論壇 (ARF) 並駕齊驅。²²³南韓希望能夠落實其所提倡的，建立一類似歐洲安全合作會議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的新多邊安全合作建制。只

²²¹ Fei-Ling Wang, 1998, "China and Korea Unification: A Policy of Status Quo,"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Vol. 23, No. 2, pp. 180-184.

²²² Ronald L. Tammen, et al.,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²²³ Chung-in Moon and Taehwan Kim, 2004, "South Ko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llenges to Developmental Realism?"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251-279.

是，雖然現有東協區域論壇(ARF)，但仍沒有具體計畫以討論朝鮮問題的多邊安全合作建制出現。此外，儘管有東協加三(APT)，但是在經濟議題上的涉及非常有限。

在經濟策略上，南韓經濟體制已經轉型成為新工業化國家，對此將面臨一些內在與外在的挑戰。最明顯的挑戰，是來自市場開放與經濟自由化的外部壓力。外部壓力有雙邊和多邊兩種。雙邊的部份，主要是美國面對與南韓的貿易赤字，而自年代對起南韓採取攻擊性貿易政策。²²⁴還有日本和歐盟，對南韓進行密集的雙邊壓力，以抑制南韓的搭便車(free-riding)和搶奪的行為。而多邊部份，南韓在經濟自由化上，受到來自WTO和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的多邊壓力。另一個主要的挑戰，是關於國際競爭的範圍正在改變。過去，南韓以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姿態展現，就能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下獲取豐盛利益。但是，自從1980年代末開始，南韓的經濟面臨各方而來的強烈競爭。正當先進工業化國家開始透過保護主義的方式對抗市場競爭機制時，新興工業化國家則反其道而行，增強彼此之間的競爭。²²⁵此外，中國與第二代新興工業化國家(如大多數的東南亞國家)，則開始削弱南韓在勞力密集產業上的地位。

其次，國內情勢的改變亦為南韓處理對外經濟關係的主要挑戰之一。歷經很長一段時間的威權統治，南韓於1987年開始經歷民主轉型。雖然很難證明民主治理與經濟表現之間的确切關係，但是，民主轉型以及近來工會與非政府組織的權力不斷上升，或多或少影響南韓的經濟表現。最後，全球化是南韓的新挑戰。南

²²⁴ Thomas O. Bayard and Kimberly A. Elliott, 1994, *Reciprocity and Retaliation in U.S.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²²⁵ Ku-Hyun Jung and Dong-Jae Kim, 1999,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Case of Korea," in Chung-in Moon and Jongryn Mo, ed., *Democra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Korea: Assessments and Prospects*,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pp. 349-367.

韓在過去十年中受過兩波全球化浪潮的洗禮。第一波是自願性、管理式的全球化。第二波是 1997 年經濟危機造成的強迫性全球化。然而，處理以上內在與外在挑戰，什麼才是南韓最好的選擇？很明顯地，第一個選項是訴諸鑲嵌於重商主義中，舊的單邊主義模式。另一個，則是雙邊主義管理模式。雙邊主義的管理模式可分為兩種：一是雙邊貿易夥伴分散化 (diversification)，二是以雙邊為基礎，形成優惠貿易與投資安排。以前者而言，中國是最主要的目標。1990 年之後，南韓開始相對於美韓和日韓的出口市場，增加對其他地區的出口量。後者則是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FTA)，在執行上比起區域或多邊自由貿易要容易許多。值得注意的是，南韓最終的興趣是建立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合作組織。

南韓除了追求次區域、區域優惠貿易以及金融貨幣安排外，自 1989 年亞太經合會 (APEC) 成立之後，便積極參與。APEC 為南韓帶來兩大好處：一是容易取得區域內的工業化國家之出口市場和資金；二則是從資源豐富的國家，如澳洲和東南亞國家，獲得原物料供給的保障。但是，因為區域內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進程緩慢，於是與強化中的 WTO 做連結，此舉無形中淡化了 APEC 對南韓的戰略價值。更重要的是，美國提倡將 APEC 轉型為一自由貿易區，南韓為此感到驚慌擔心。對此，南韓與日本聯盟共同抵制農產品市場的開放，以及採納自願性部門提早自由化原則，強調他們拒絕美國的提議。日本和南韓在開放性區域主義的議題上，持相同的立場。²²⁶最後，多邊主義依然是南韓對外經濟管理關係的主要基礎。無疑地，遵守 WTO 和 OECD 的規範、原則及規則，指導著南韓經濟自由化的方向。

²²⁶ Yong Deung, 1997, "Japan in APEC," *Asian Survey*, Vol. 37, No. 4, pp. 357-367.

第三節、美國的策略與東北亞自由貿易區？

一、美國的策略

對美國而言，東北亞不可否認地是最重要的區域之一。在地緣政治上，與中、日、韓關係穩定，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支柱。

²²⁷Calder 表示，1951 年的舊金山和約(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為美國的東北亞政策制度化的開端，並表示舊金山體系有五個基本特色：(1)雙邊關係（與美國的安全聯盟，有著高度不平等的關係）(2)以美軍為主、(3)不對等的經濟協定安排、(4)選擇性的排除美軍，以及(5)少許的多邊安全或經濟的建制(regime)。1990 年代初，美國在舊金山體系下形成了「軸輻」(hub and spokes)的安全機制，²²⁸意即以美國華府為中心，向外輻射出去的不對稱關係網絡。面對共產主義的威脅，此軸輻結構在冷戰時期得到強化，即便與美國存在不對稱的關係，仍可維持安全連結。在東北亞區域上，日本、南韓，乃至台灣，都是美國的區域盟友。直到冷戰結束後，舊金山體系受到挑戰，特別是與美國不對稱關係的東北亞盟邦的回應。

Calder 表示，有三大長期性的壓力促使東北亞正在改變。首先，是民主化為東北亞帶來更和平的世界。以南韓和台灣為例，皆從威權政體轉變為民主體制。對日本而言，民意在外交政策也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然而，北韓的人民依然被封鎖於世界之外。由於嚴重的飢荒，北韓活在黑暗世界之中，同時持續透過擴張軍力以對抗外在世界，並以核武為要脅，希望外在世界給予其所希

²²⁷ Zbigniew Brzezinski, 1997,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pp. 151-193.

²²⁸ Kent E. Calder, 2004, "U.S. Foreign Policy in Northeast Asia,"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225-248.

望的援助。其次，面對科技的日新月異，今日對東北亞地區的領導者們而言，最嚴重的就是科技的危險，也就是飛彈的擴散。此點同樣針對並批評美國。最後一個主要壓力和挑戰，便是快速變化中的國際環境。目前，新的國際環境存在三項挑戰：一是現在的世界變得無法完全獨力面對與處理，這點對美國而言最是挫折；二是關於後平壤情況的特色是被動的，包括對七大工業國(G-7)及國際金融制度表現被動；三則是東北亞現存的制度不足以處理區域問題。以東協區域論壇(ARF)為例，是一個有用的國家間對話管道，但是並不是在解決問題。東北亞缺乏像北約組織(NATO)、歐盟(EU)的制度以因應新挑戰。

東北亞的國家以及美國，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北太平洋架構，以強化與穩定可能變動很快的未來。目前，對美國而言，最重要的是強化與日本的軍事政治聯盟，以便穩定東北亞區域秩序。美國在東北亞的軍事部署牽涉到與日本的關係，當然還包括南韓。美國必須與部署當地國的軍事單位培養更深化、更平等的夥伴關係。然而，為了強化聯盟的政治信任關係，美國與日本必須解釋他們的綜合安全目標。在美日兩國之間，要深化共同議程，則需要聚焦在更高層級的議題，以吸引更廣的公共興趣。例如，能源、大規模移民、地震研究以及資訊時代的教育。在後冷戰時期，美日聯盟的夥伴更是需要共享的世界觀。此外，在經濟政策上，同樣也可以強化更廣泛的聯盟關係。例如，美日兩國研究並在綜合開放市場議題上進行協商，並聚焦在高科技和服務業方面。美國與南韓的關係，在東北亞的地緣政治上同樣重要。然而，跨太平洋區的複雜性，在政治經濟方面尚存在不同文化和歷史的糾葛。

東北亞的地緣政治亟需日本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不論是與美國的聯盟關係，或是在全球事務上。日本是東北亞真正的巨人，

同時，亦是最具潛力促使區域穩定與繁榮的角色。在過去十年間，美國對日本的政策，採取支持日本在國際事務上的積極主義，特別是在軍事及對外援助方面。日本為了在國際上扮演真正有意義與積極的角色，日本提出大量的政治與經濟上的改革。有三個優先需要考量的部份：首先，日本需要改革其過度規律的經濟。自1998年，隨著日本在財金事務上的「大爆炸」(Big Bang)、新的破產法、合併帳戶以及新風險市場的到來，日本已經邁向一個新的商業典範。²²⁹這些改革如果完成生效，將加速日本的成長，並深化其與外國貿易夥伴的互賴關係，使得日本成為許多外來公司最具活力的投資競爭環境。第二，政治的重組也是必要的。最後，在新地緣政治方面，具創意的決定與外交政策，使日本政黨的偷懶行徑變為最迫切的問題。面對亞洲新的地緣政治形貌，特別是現狀下的強權美國和日本，或多或少受到挑戰。在此區域，確定的是美日與美-南韓的安全聯盟，是舊金山體系下的軸輻結構。在美國的安全傘之下，維持區域穩定。

美國在東北亞的政策依舊是以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為主，在國際政治經濟上，從柯林頓政府時期便開始強化 APEC。整體而言，美國政策關注東北亞經濟和安全制度的建立，處理北韓核武議題上，亦從四方會談(four-party talks)增加日俄兩個主要玩家，形成談判桌上的六方會談(six-party talks)，目的是為了朝鮮半島的議題獲得解決，以及東北亞的區域穩定。美國決策者留心注意1990年代末出現的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之外交架構，主要此框架排除美國在外，而且似乎 APT 具有強力的首腦，也比起任何一種形式、以美國華府為中心的舊金山體系來得更有效率。²³⁰此外，在多邊主義下，美國的東北亞策略採取雙軌制度，

²²⁹ M. Diana Helweg, 2000, "Japan: A Rising Su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pp. 40-52.

²³⁰ Richard Stubbs, 2002,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May-June, pp. 440-455.

意即透過官方與非官方兩軌並進的方式，尤其是台灣相關的議題上，雙軌程序最適合。²³¹

Stackpole 表示，許多亞洲國家對美國的印象都不太好。美國不論在日本或南韓，都會受到挑戰。但是，依然是亞洲區域和平穩定的關鍵角色。此外，若要發展新的亞洲安全政策，認為美國必須了解亞洲對美國的看法和認知。首先，韓國認為美國人傲慢自大、粗野庸俗、不尊重人，並且墮落的。總是以一副老大哥的態度，甚至還稱呼北韓為邪惡軸心，實在不值得尊敬。其次，許多中國人視美國為霸權，並且是有意防止「中國崛起」的霸權。中國所定義的「和平發展」，也許跟美國的看法大不相同。而且，經常有意無意藉口人權干涉中國的事務。最後，日本則仍然支持美日安保條約，亦非常關心中美關係的未來。但是，日本想要更多的外交空間，並且成為「正常」國家。根據中國智庫表示，要建立一個亞太安全共同體是可能的，因為在此區域的國家在和平與穩定的安全環境上，擁有共享的利益。這是因為經濟互動增加所帶來的利益。此區域安全的初期機制，將在安全議題上，逐漸成為更有效率以促進區域合作的機制。當然，在此美國的角色很重要，但不是以一個霸權，而是關鍵角色。²³²

Cossa 則強調，美日同盟是美國在東亞安全戰略上的基石。自小布希政府時期便支持日本成為更「正常化」的國家。到了第二任（連任後），繼續鼓勵日本在區域安全上扮演更主動的角色。與此同時，美國將持續支持制度化的多邊機制（包括那些沒有包含美國的次區域機制），以成為促進區域安全和協調反恐怖主義的有

²³¹ Kent E. Calder, 2004, "U.S. Foreign Policy in Northeast Asia,"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 225-248.

²³² H.C. Stackpole, 2002, "A US Security Approac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 9, No. 1, pp. 77-87.

用手段，依賴特別的聯盟（或單邊行動，如果必要的話）來面對特定威脅，或保護其盟友的安全。美國每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書，在東亞戰略上，主軸仍以維持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關係結構，並且主要以美日安保聯盟為中心。Cossa 的看法是，認為美日安保聯盟仍是東亞未來穩定與否的重要關鍵，²³³從美國的觀點來看，南韓與日本之間的關係，是開放地敵對關係。一個再度統一的韓國視日本為其主要的對手國，將變得非常不穩定。相反地，如果形成美、日、南韓三邊聯盟，則明顯是針對中國。

美國的亞洲未來願景，意即「如何面對崛起的中國」。對此，Cossa 亦表示，強的美國之聯盟網絡，不僅能針對中國，避免中國威脅，也能夠促進區域的穩定與加強回應危機的能力。此外，亦有助於提供管道或引導中國崛起往更有益的方向發展。在美國與南韓關係而言，美韓聯盟提供南韓能與其他東北亞鄰國維持良好的機會。從美國的觀點來看，南韓視中國為其主要的戰略夥伴，特別是南韓與中國都視日本為其未來主要的敵人或威脅。然而，如果在此情況下，南北韓或者中韓的關係建立起來，並且隨著日本的崛起（今天共同關注之，但未來就成了威脅），如此一來，將使得韓國與美國有所抵觸衝突。而且，韓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是建立在與美日安保關係緊密的基礎上，同時，東北亞區域的安全事務有日本的大力參與。

總而言之，美日與美韓聯盟，以及更廣大的美國之東亞雙邊聯盟結構，在冷戰期間能維持區域和平與穩定，一旦北韓威脅平息下來，相信如果適當的話，亦能促進未來的和平與穩定，保持注意區域的穩定，而非嚇阻或是圍堵。當然，只要北韓仍保持其

²³³ Ralph A. Cossa, 2005, "US Security Strategy in Asia and the Prospects for an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Regime,"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1, pp. 64-86.

與南韓分裂的政體，那麼在朝鮮半島的秩序，就依然是倚靠嚇阻策略。但是，美國、日本與南韓現在就應該發展三邊安全合作機制，以因應朝鮮統一之後的東北亞局勢。然而，這樣的安排不該是針對中國，亦不該是試圖避免中國的和平崛起。反而，應該幫助引導中國的崛起，面對朝鮮半島及韓國的鄰居，或者更廣泛的國際社區，都保持著非威脅性。

二、東北亞自由貿易區能否成形

從上述討論中，可知東北亞中、日、南韓及美國正視多邊制度，如 WTO 和 APEC 的角色。只是，各自有其盤算和策略。以中國而言，雖然比起日本與南韓來得有意願促進具有排他型的東亞區域主義，但是，為了和平崛起以穩定經濟發展，採取積極加入國際制度與多邊機制，並且遵守規則、規範等多邊遊戲規則。而日本，則採取既平衡中國崛起，又與之交往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強化美日聯盟的關係。南韓則身為中日之間的緩衝橋樑，在維繫與美國的聯盟關係同時，採取從中得利的策略，小心使得萬年船。至於美國，面對崛起的中國，以及東北亞存在的北韓核武危機，當然採取強化軸輻體系，與東北亞盟國的關係，如美日與美韓。此外，在經濟上，亦不敢忽視中國的經濟效益與發展性，並希望能在與其互動間，使其內部產生質變，進行民主化。

現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有越來越多國家追求區域多邊主義更進一步的制度化，且積極地使優惠貿易安排(PTAs)交織成網。基本上，當提及經濟、政治策略以及社會建構主義的論點如何影響貿易協定時，大多數的研究幾乎主要都聚焦在「區域主義」(regionalism)上，但是，這並不足以掌握到貿易治理方式的多樣性。為此，Vinod Aggarwal 和 Min Gyo Koo 設計了一組情境分析

途徑，並且展示出此途徑如何有助於系統化地分類東亞的貿易協定。要一一解釋與分析這許多的貿易協定，的確是一大挑戰。為了努力了解協定的多樣性，於是便提出此制度性議價賽局 (institutional bargaining-game approach) 的模型，主要關注在貨物、國家的個別情況，以及符合現有的協定安排。首先，在貨物方面，假設任何在貿易自由化準備上的不安與焦慮，都是公共財 (public goods) 刺激國家尋求集體財 (club goods)，亦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選項。在國家個別情況方面，主要關注在各國的國際戰略與經濟利益，以及其建制的形態和擴散在世界其他地方的 PTAs 下，追求貿易安排的價值觀。

制度性議價賽路途徑方便我們探討東亞的貿易協定如何進展地更普及，特別是 1990 年代的東北亞地區。除了分析過去發生過的事件，亦探討東北亞未來可能的發展路線，向更正式的經濟整合發展。Vinod Aggarwal 和 Min Gyo Koo 表示，WTO 的強或弱，以及 APEC 開放性或非開放性的制度空間，影響公共財的供給以及刺激集體財。如果 WTO 和 APEC 的制度較弱，東北亞自由貿易區 (NEAFTA) 就比較可能形成。此外，還得視中日聯盟的可能性，以及區域內個別國家在經濟上的互補性為主。並且，檢視 NEAFTA 的可能發展，是更廣泛的跨區域主義，或者是區域間的區域主義。然而，在此情境分析指出，NEAFTA 具有好壞兩種要素，端視區域內的國家行為者所持的想法和信念。有鑑於全球經濟上，非常大的政治與經濟不確定性，因此，不論是東北亞、東亞，乃至全球體系的自由貿易道路發展，仍是一條顛簸不平的路。²³⁴總之，現在東北亞的確是在選擇貿易安排的交叉路上。

²³⁴ 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o, 2005,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8, No. 2, pp. 189-216.

由上述討論可知，東北亞三國（中、日、南韓）皆強調多邊主義以及合作，是以排他型的制度性平衡，如東北亞自由貿易區，便不太可能成形。而且，以中、日、南韓三個雙邊關係而言，中日兩國間的聯盟，尚有許多糾葛擋在眼前，在短期內不易建立雙邊聯盟關係。儘管日韓兩國已經討論未來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協定，但是均在保護各自農業部門上，未能確定能否達成協議。有此可知，日韓的雙邊貿易協定未來很可能對農產品的進口會有許多限制，單是東北亞三國的雙邊協定就尚未成形了，更別說三邊聯盟。況且，目前東北亞三國皆以 WTO 和 APEC 的經貿規範為準則，美國在東北亞區域的角色定位，對東北亞三國而言，各自有其取捨的重點，要形成排除美國角色的排他型制度性平衡機制，似乎不太可能。

但是，有趣的是，根據 2009 年 10 月 12 日的新聞：「中日韓擬簽自由貿易協定」，中共總理溫家寶、韓國總統李明博、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三國領導人於北京舉行中日韓高峰會，除了確定重啟六方會談，也考慮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中國表示，中日韓三國應加快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聯合研究，儘早達成中日韓投資協定，以促進區域的經濟金融穩定，²³⁵特別是在 2008 年美國次級房貸的金融海嘯之後，更別具意義。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從國際體系權力結構影響國內政治的外交政策行為而言，上述中國、日本、南韓以及美國四國的基本區域態度與戰略思維，其實並非沒有可能性。根據聯合報 2010 年 5 月 30 日以及 Taipei Times 2010 年 5 月 24 日的報導，中日韓三國領導 29 日韓國召開中日韓峰會，並在會中承諾加速自由貿易談判，希望在 2012 年以前完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聯合研究，且在 2011 年在韓國建立三國合作秘書

²³⁵記者林庭瑤，2009 年 10 月 12 日，中日韓擬簽自由貿易協定，《經濟日報》。

處，以期建立東北亞單一經濟區。²³⁶

2010年5月，儘管面對天安艦沉船事件的緊張情勢，中日韓三國領袖高峰會議依然在南韓濟州島登場，三方協議在2012年完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影響深遠的是，很可能是「東協加三」的前置作業。尤其是2010年1月1日開始，東協十國與中國的「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協定正式啟動，對此，日本和南韓深知如果不趕快爭取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合作，勢必會使利益受損。回顧2002年，中國積極倡議成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但當時日韓態度相當冷漠，隨著中國大陸快速且驚人的經濟成長，並早先一步與東協合作，因此使得日韓的態度丕變。根據資料顯示，目前中國、日本和南韓分別是亞洲第一、第二和第四大經濟體，總計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占亞洲總量70%，消費市場合計15億人口，占全球23%，對全球GDP貢獻度達18%。一旦成立東北亞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將使三國GDP分別多成長2.9%、0.5%以及3.1%，勢力足以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美、加、墨）以及歐盟(EU)相抗衡。²³⁷簡單小結，儘管中日韓以及美國有各自的盤算和策略，東北亞自由貿易區似乎不易成形，但是，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行為，在此例子中，可看出2008年的美國金融風暴引起東北亞國家的疑慮，加上中國近年來經濟快速崛起，成長的幅大相當驚人，使得東北亞區域中日韓三個主要國家積極採取進一步的整合，形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或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因此，對東北亞中日韓三國而言，要形成如Kai He所設計的制度性平衡模型中的排他型制度性平衡機制，排除美國的角色，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²³⁶記者林則宏，2010年5月30日，中日韓峰會，承諾加速自貿談判，《聯合報》，A10版。或參閱“S Korea trade chief hosts meeting with China and Japan,” May 24, 2010, *Taipei Times*, AP Soul, page 10.

²³⁷葉亭均，2010年6月14日，中日韓自由貿易腳步加快了，《非凡新聞周刊》，第217期。

第五章、結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

一、本文所採取的是 Kai He 所設計的制度性平衡模型(model of institutional balancing)，有鑑於承認國際制度的創立，特別是經貿上的制度因為全球經濟相互依賴提高而發展出來，而且認為亞洲深受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觀念影響，於是整合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而設計出制度性平衡模型(model of institutional balancing)。然而，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係屬不同的研究視角的理論，在解釋議題上，不斷變換理論立場並不恰當，因此有必要單一理論立場做為切入視角。對於面對國際經濟互賴程度加深，仍強調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結構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行為，Kai He 的立場應屬新古典現實主義。遂本文主要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觀點，做為分析解釋的理論視角，並搭配制度性平衡模型，說明東北亞區域的制度發展。

二、本文假設排他型的制度性平衡係指東北亞中、日、韓三國不願接受東北亞區域之外的強權美國介入區域事務，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東北亞三國皆認為國際體系是單極體系，而且相互間經濟互賴的程度是強的。在此借用 Vinod Aggarwal 與 Min Gyo Koo 的東北亞區域整合模型路徑圖來分析東北亞可能的發展。此分析途徑是用來分析 1990 年代貿易安排如何在東亞發展的，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在高度經濟互賴的情況下，兼之視國際體系乃是單極體系，東北亞區域是否會形成進一步制度化的次多邊關係(sub-multilateral level)，如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從本文第四章的分析探討可知，東北亞三國（中、日、南韓）皆強調多邊主義以及合作，儘管東北亞中、日、南韓及美國重視多邊制度如 WTO 和 APEC 的角色，且各別有其盤算和策略。然而，儘管東

北亞中日韓三國間存在歷史的糾葛等問題，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在後冷戰時期，面對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結構的影響以及國家決策者的認知，隨著國際間經濟互賴程度的加深，特別是在 2008 年美國次級房貸的金融風暴之後，東北亞區域很可能進一步整合形成排除美國角色的區域制度。例如，2009 年 10 月 12 日的新聞：「中日韓擬簽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根據聯合報 2010 年 5 月 30 日的報導，中日韓三國領導 29 日韓國召開中日韓峰會，並在會中承諾加速自由貿易談判，希望在 2012 年以前完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聯合研究。²³⁸

三、關於包含型制度性平衡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根據本文第三章的討論，隨著中國近年來快速崛起，經濟實力每年以驚人速度在成長，面對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的不確定性，不僅中國在崛起，許多亞洲國家也在崛起。此外，在 APEC 或 WTO 中，鑑於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發展停滯不前，隨著亞太經合會區域內的「區域貿易協定」(RTAs)與「自由貿易協定」(FTAs)的數目日趨增加，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概念不僅沒有消弭，還有積極促使 ABAC 探討這個新概念。因此，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國家決策者對於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結構的認知，影響外交政策行為，此時的東亞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的決策者認知到區域的權力分配乃是多極體系。基本假設是自願性原則且具論壇性質的亞太經合會(APEC)進一步制度化，形成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並且是因為東北亞中日韓三國將目標國美國（有時中國也是潛在目標國）納入制度中，透過制度的功能與運作平衡美國強權的影響力。有趣的是，不少學者認為亞太經合會議題現階段重要性不高，也以為美國歐巴馬政府已經淡化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倡議。然

²³⁸記者林則宏，2010 年 5 月 30 日，中日韓峰會，承諾加速自貿談判，《聯合報》，A10 版。或參閱“S Korea trade chief hosts meeting with China and Japan,” May 24, 2010, *Taipei Times*, AP Soul, page 10.

而，從 2009 年 11 月 5 日新聞報導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議中美國態度淡化亞太自由貿易區，²³⁹旋即於 2009 年 11 月 14 日美國總統歐巴馬宣佈，美國將積極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SEP or TPP)進行對話可知，此舉有助提高亞太自由貿易區實現的可能性。²⁴⁰

四、總結討論，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屬於不確定狀態，是否會造成衝突或形成合作，須視情況而定，特別是特定的國家間關係以及外交政策行為等因素。最重要的是，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權力分配是影響外交政策行為最主要的關鍵因素，而外交政策則是由決策者制定，一國的決策者對於國際權力分配結構的認知，則決定了該國的外交政策行為。與此同時，搭配 Kai He 所設計的制度性平衡模型，排他型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區與包含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皆可能成形，換言之，東北亞區域具有制度性平衡機制的潛力，如同東南亞區域一般，將可能存在制度性平衡的機制。

第二節、省思與未來研究方向

如同第一章緒論所述，近年來亞洲的經濟快速成長，尤其是中國的重新崛起。對此，開始出現關於亞洲的國際關係仍是權力平衡，或為了避免衝突對立而形成較穩定且和平的秩序之討論。對 Aaron Friedberg 而言，亞洲依然是深受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影響。在國際無政府的狀態下，為了維持國際體系的權力平衡與秩序，如果強權數越多，那麼秩序就越不易穩定。按此邏輯，亞洲地區是「大國」集合地，這裡的強權有日本、印度、俄羅斯和中

²³⁹特派員張宗智，2009 年 11 月 5 日，美轉彎，淡化亞太自由貿易協定，《聯合報》。

²⁴⁰編譯廖玉玲，2009 年 11 月 16 日，歐巴馬效應，亞太設自貿區露曙光，《經濟日報》。

國，當然還有美國的角色。²⁴¹對此，Kai He 同意 Aaron Friedberg 的看法，認為亞洲深受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觀念影響。有鑑於承認國際制度的創立，特別是經貿上的制度因為全球經濟相互依賴提高而發展出來，於是，設計了一套整合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的制度性平衡模型(model of institutional balancing)。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是欲了解東北亞是否有與東南亞區域相似的制度性平衡機制，除借用此模型分析東北亞區域發展之外，並採取 Kai He 原文中所提及的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觀點。²⁴²

對於後冷戰時期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結構，國家要怎麼自處，不僅有賴對當下情況的評估而定，還反映出國家對於未來的期望值。除了權力分配之外，制度性平衡亦強調經濟互賴的影響。制度性平衡模型的主要假設是，在國際體系中，相互間權力分配以及國家間經濟互賴決定國家的行為，不論是硬性平衡或是軟性的制度性平衡。在此，平衡模型的核心關鍵是以理性為基礎，理性地計算成本效益以及國家在制定決策時的期待。決策者對於互賴的認知和理解愈強烈，國家選擇軍事平衡的風險和成本就愈高，而國家就愈可能採取制度性平衡策略。此點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觀點不謀而合，強調國際權力分配是影響外交政策行為最主要的因素，而外交政策是由國家決策者制定，一國的決策者對國際權力分配的認知，決定了一國的外交政策行為。²⁴³

目前，在國際關係的軟性平衡(soft balancing)辯論上，主要聚焦在軟性平衡是否為單極體系(uni-polarity)之下，獨特的或特有的

²⁴¹ Aaron L. Friedberg, 1998, "Europe's Past, Asia's Future?" *SAIS Policy Forum Series Number Thre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1-15.

²⁴² Kai He,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pp. 489-518.

²⁴³ Gideon Rose,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pp. 144-172.

外交政策行為。當軟性權力平衡理論的支持者認為美國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已經激怒了其他國家，這些國家第一便是要針對美國採取軟性平衡。批評家表示，這些所謂的軟性平衡行為，其實只是「單極政治的常態」或是「外交上的磨擦不和」而已。²⁴⁴在此，借用 Kai He 設計的制度性平衡模型，檢視東北亞國家（中、日、南韓，還有美國）如何使用此兩種不同的軟性平衡策略：包含型(inclusive)制度性平衡以及排他型(exclusive)制度性平衡，以便在國際的無政府狀態下追求國家安全。此種研究不僅強化了軟性平衡論點的理論架構，同時亦以有力且具有經驗的方式，回應了對軟性平衡的批評。高度經濟互賴是必要的條件，在此情況下，國家偏好採取制度性平衡，而非軍事平衡。冷戰體系結束之後，有三種策略上的不確定性（即美國的承諾、中國的崛起以及不清楚、不明確的區域權力分配），使得東北亞國家在後冷戰時期在重新定義安全上出現挑戰。隨著國際貿易與外來投資，使區域的經濟互賴程度逐漸增加，並在後冷戰時期顯示出傳統的軍事平衡不足以處理區域的安全情勢。因此，本文大膽假設東北亞國家亦會同東南亞國家（如東協）選擇制度性平衡來追求安全。

在 1990 年代初期，以東南亞區域為例，1994 年時，為了面對中國在南中國海逐漸增加的影響力，東協國家於是倡議並建立了東協區域論壇(ARF)。東協加三(APT)與之後的東亞高峰會(EAS)，都植基於區域上對於美國的怨恨和不滿。在 1997 年經濟危機時，迫切性地需要區域金融合作，以對抗美國領導的單極世界。美國與西方的多邊制度，例如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這些都是主要平衡東協加三(APT)和東亞高峰會(EAS)的目標架構。如 Stuart Harris 表示，區域的多邊主義，在亞洲例如東協

²⁴⁴ Keir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2005,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pp. 109-139.

(ASEAN)、東協區域論壇(ARF)、亞太經合會(APEC)以及亞歐會議(ASEM)，幫助小型國家透過規範和同儕壓力，平衡區域的優勢國家印尼和日本，並整合中國進入區域中，同時限制美國的單邊主義。²⁴⁵那麼東北亞區域是否存在制度性平衡機制，便透過 Kai He 的制度性平衡模型來探討東北亞區域的平衡策略，並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觀點做為探究的視角。

本文假設排他型的制度性平衡係指東北亞中、日、韓三國形成排除美國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東北亞三國皆認為國際體系是單極體系，而且相互間經濟互賴的程度是強的，並借用 Vinod Aggarwal 與 Min Gyo Koo 的東北亞區域整合模型路徑圖來分析東北亞可能的發展。這是一種情境分析途徑。以中國而言，雖然為了和平崛起以穩定經濟發展，於是採取積極加入國際制度與多邊機制，並且遵守規則、規範等多邊遊戲規則，但是比起日本與南韓來得有意願促進東亞區域主義。而日本，則採取既平衡中國崛起，並且與之交往促進經濟發展，同時強化美日聯盟的關係。南韓則身為中日之間的緩衝橋樑，在維繫與美國的聯盟關係同時，採取從中得利的策略。至於美國，面對崛起的中國，以及東北亞存在的北韓核武危機，當然採取強化與東北亞盟國的軸輻體系關係，如美日與美韓。但是，在經濟上，亦不敢忽視中國的經濟效益與發展性，並希望能在與其互動間，使其內部產生質變，更理想的是使其發展民主化。

另外，包含型制度性平衡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在制度性平衡模型中，「包含型」(inclusively)的平衡是指把目標國綁在同一個制度裡進行平衡，基本假設是自願性原則且具論壇性質的亞

²⁴⁵ Stuart Harris, 2000, "Asia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Response to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3, No. 3, pp. 495-516.

太經合會(APEC)進一步制度化，形成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並且是因為東北亞中日韓三國將目標國美國（有時中國也是潛在目標國）納入制度中，透過制度的功能與運作平衡美國強權的影響力。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國家決策者對於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結構的認知，影響外交政策行為，此時的東亞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的決策者認知到區域的權力分配乃是多極體系，而且，如文中所述，FTAAP 的倡議對美國而言，沒有風險也沒有成本。意即如果有意義成果出現，對美國是有利的；如果什麼都沒有，對美國也沒有損失。簡言之，對美國而言，提議 FTAAP 就已經提醒東亞國家美國的角色依然是東亞的要角，而且是時候考慮與美國在區域經濟整合的制度化中建立關係。這對美國而言，是最好的賭注。

東北亞區域是世界上特別複雜的區域之一，尤其在安全方面。在此區域中，快速崛起的中國儼然成為關鍵要角。然而，中國為強調和平崛起，致力於符合國際秩序的規範，並且盡最大的努力降低區域上的敏感議題，減輕區域的緊張情勢。面對東亞政府結果變得越趨主動積極促進新的倡議，並努力促成新制度，及其政治控制與經濟體功能，不願再見到如 APEC 和 ASEAN 無力面對危機，或是無法處理之後的影響，東協加三(APT)就成了新區域結構的主要引擎。APT 於 1995 年中旬開始，由東協加入中國、日本以及南韓，並之後與歐盟(EU)會議，結果成就亞歐會議(ASEM)。此後，這十加三的國家高峰會進一步合作，並且共同面對許多區域問題。總而言之，正式的東北亞制度從經濟關係交織成網開始增加區域的互賴，而且這些經濟連結持續深化與擴張。

因此，未來或許可以從 APT 與六方會談探討東亞經濟與安全。此外，關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研究與討論，有鑑於發展

較晚，著重國際關係理論的跨層次分析，理論建構至今仍存在許多備受批評之處，但是，至少是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努力的一個方向，是故也是未來可以進一步研究的理論方向。

參考書目

壹、書籍

一、中文部份

- 向駿譯, Ronald L. Tammen、Jacek Kugler 合著, 2003, 《權力轉移：二十一世紀的戰略》(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 宋興洲, 2005, 《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 台北：鼎茂圖書。
- 宋興洲, 2007, 中、日、韓三國地緣經濟策略之探討, 收錄於王效平、李思名、饒美蛟主編的《新世紀的東亞經濟合作》, 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 頁 127-146。
- 杜默譯, Fareed Zakaria 著, 2008, 《後美國世界》, 台北：麥田出版。
- 胡幼慧主編, 1996,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台北市：巨流。
- 胡祖慶譯, Robert Pfaltzgraff, Jr. and James Dougherty 著, 1995, 《國際關係理論導讀》(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台北：五南。
- 郝培芝、羅至美, 2007, 國際整合與區域主義, 收錄於張亞中主編, 《國際關係總論》, 二版, 台北：揚智文化, 頁 380-381。
- 張伯偉, 2001, 《APEC 貿易自由化及其影響》,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 張亞中主編, 2003, 《國際關係總論》, 台北：揚智文化。
- 陳勇, 2006, 《新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一體化》,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廖舜右、曹雄源，2007，*現實主義*，收錄於張亞中主編的《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台北：揚智文化，頁 38-71。
- 歐信宏、胡祖慶譯，Joshua S. Goldstein and Jon C. Pevehouse 著，2007，《國際關係》(二版)，台北：雙葉書廊。
- 蔡育岱、譚偉恩，2007，《國際關係》，台北縣蘆洲：晶華。
- 蔡東杰，2007，《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

二、西文部份

- Aggarwal, Vinod K., 200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A U.S. Perspective," in *an APEC Trade Agend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n Pacific*. A joint study by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and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 Alexander, Bevin, 2005, *How America Got it Right: The US March to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upremacy*, New York: Crown.
- Anderson, Kym, and Hege Norheim, 1993, "History, Geography,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edited by Kym Anderson and Richard Blackhurst,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Bagwell, Kyle and Robert W. Staiger, 1997,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 Tariff Coope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5921,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p.27-28.
- Baldwin, David A., ed.,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ayard, Thomas O. and Kimberly A. Elliott, 1994, *Reciprocity and Retaliation in U.S.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hagwati, J., 2002, *Free Trade Toda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hagwati, Jagdish and Arvind Panagariya, 1996, "Preferential Trading Areas and Multilateralism---Strangers, Friends, or Foes?" in *The Economic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edited by Jagdish Bhagwati and Arvind Panagariya,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pp.1-78.

Bhagwati, Jagdish, 1993,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n Overview," in *New Dimens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edited by Jami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2-51.

Brzezinski, Zbigniew, 1997,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uzan, Barry and Ole Waever, 2003, *Regional Power: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lder, Kent E., 2004, "U.S. Foreign Policy in Northeast Asia,"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225-248.

Camilleri, Joseph A., 2003, *Regionalism in the New Asia-Pacific Or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Volume II,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Capie, David, 2004, "Rival Regions?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nd Its Challenges to the Asia-Pacific," *The Asia-Pacific: A Region in Transition*, Jim Rolfe ed., Honolulu, HI: Asia-Pacific Center for

- Security Studies, pp.149-165.
- Carpenter, Ted G., 1998, "From Intervener of First Resort to Balancer of Last Resort," in Selig Harrison and Clyde Prestowitz, eds., *Asian after the Miracle*,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p.294.
- Carr, E. H., 1946,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Cha, Victor D., 1999,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ong, I., 2003, "Korea's FTA policy: progress and prosp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KIEP/NEAEF Conference on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Honolulu, Hawaii, 6-7 August.
- Emmott, Bill, 2008, *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 London: Allen Lane.
- Frankel, Jeffrey A. and Shang-Jin Wei, 1998, "Regionalization of World Trade and Currenci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edited by Jeffrey A. Franke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89-219.
- Friedberg, Aaron L., 1998, "Europe's Past, Asia's Future?" *SAIS Policy Forum Series Number Thre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1-15.
- Friedman, Thomas, 2006, *the world is flat*, London: Penguin Books.
- Gilpin, Robert, 1980,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son, Julie, 2002, *Asia Meets Europe-Interregionalism and the Asia-Europe Meeting*, UK: Edward Elgar.
- Grieco, Joseph M., 1997, "Systemic Sources of Variation in Reg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East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edited by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Miln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64-187.
- Grieco, Joseph, 2002, "Modern Realist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 Harvey (eds), *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65-78.
- Grimes, William W., 2009, *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 the great power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g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ggard, Stephan, 1997,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edited by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20-49.
- Hamilton, Gary, ed., 1996,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Hatch, W. and K. Yamamura, 1996, *Asia in Japan's Embrace: Building a Regional Production Alli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ggott, Richard, Richard Leaver, and John Ravenhill, 1993, "Introductio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acific," in R. Higgott, R. Leaver, and J. Ravenhill (eds.), *Pacific Economic Relations in*

- the 1990s: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pp.1-14.
- Hollis, M. and S. Smith, 1990, *Explai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ok, Glenn D., Julie Gilson, Christopher W. Hughes and Hugo Dobson, 2005,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ecurity*, London: Routledge, pp.191-192.
- Irwin, D.A., 1993,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trade policies i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J. Melo and A. Panagariya (eds), *New Dimension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4,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Dimensions,"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65-100.
- Jung, Ku-Hyun and Dong-Jae Kim, 1999,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Case of Korea," in Chung-in Moon and Jongryn Mo, ed., *Democra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Korea: Assessments and Prospects*,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pp.349-367.
- Kang, David C.,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 J., 1997,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in P.J. Katzenstein and T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J. and Takashi Shiraishi, 1997, *Network Power*,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J. and Takashi Shiraishi, 2006,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J., 1997,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edited by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1-44.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 1989,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nd ed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Keohane, Robert O.,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ohane, Robert, 1989,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in John Dunn, ed., *The Economic Limits of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65-194.
- Kerr, P., A. Mack, and P. Evans, 1995, "The Evolving Security Discourse in the Asia-Pacific," in Andrew Mack and John Ravenhill, ed., *Pacific Cooperation: 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p.233-255.
- Khong, Yuen Foong, 2004, "Coping with Strategic Uncertainty: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Soft Balancing in Southeast Asia's Post-Cold War Strategy," in Allen Carlson, Peter Katzenstein, and J. J. Suh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o, M. G., 2005, "From multilateralism to bilateralism? A shift in South Korea's trade strategy," in V.K. Aggarwal and S. Urata (eds), *Bilateral Trade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Origin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Krugman, Paul, 1991, "The Move to Free Trade Zones," i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rade and Currency Zones: A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Kansas City, Mo.: Federal Reserve Bank, pp.7-41.
- Kugler, Jacek, et al., 2000,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
- Kupchan, Charles A., 1997, "Regionalizing Europe's Security: The Case for a New Mitteleuropa,"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edited by Edward D. Mo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209-238.
- Kupchan, Charles A., ed., 1998, *Atlantic Security: Contending Vision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 Kwei, E., 2005, "Chinese bilateralism: politics still in command," in V.K. Aggarwal and S. Urata (eds), *Bilateral Trade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Pacific: Origins, 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Limaye, Satu, 2006, "Japan and India after the Cold War," in Yoichiro Sato and Satu Limaye, *Japan in a dynamic Asia: coping with new security challenges*, London, MD: Lexington, pp.234-239.
- Lipson, Charles, 1993,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 in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yall, Jay, 2001, *The Revisionist State: Definitions and Measures*, Cornell University.

MacIntyre, A., 1994,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development: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omparisons," in A. MacIntyre (ed.)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izing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acIntyre, Andrew and Barry Naughton, 2005, "The Decline of a Japan-Led Model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y," in *Remapping East Asia*, edited by T. J. Pempe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77-100.

Mansfield, Edward and Brian M. Pollins (eds), 2003,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rsh, David and Gerry Stoker ed., 2002,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2nd edition)*, pp.1-16.

Marx, Karl, 1959,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Melo, Jaime de and Arvind Panagariya, 1993, "Introduction," in *New Dimens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edited by Jaim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21.

Milner, Helen, 1993,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in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43-169.

- Moon, Chung-in and Taehwan Kim, 2004, "South Ko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llenges to Development Realism?"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251-279.
- Moon, Chung-in, 2000, "Changing Threat Environment, Force Structure, and Defense Planning: The South Korea Case," in Natalie Crawford and Chung-in Moon, ed., *Emerging Threats, Force Structures, and the Role of Air Power in Korea*,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pp.89-114.
- Moon, Chung-in, Odd Arne Westad, and Gyoo-hyoung Kahng, eds., 2001, *Ending the Cold War in Kore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Thomas G., 2004,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n Samuel S. Kim (edi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p.101-134.
- Morgenthau, Hans J., 1954,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Y.: Alfred A. Knopf, Chap. 9.
- Morgenthau, Hans, 1978, 5th editi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Knopf.
- Morrison, Charles, 2006, "An APEC Trade Agenda," in *an APEC Trade Agend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n Pacific*. A joint study by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and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 Naisbitt, John, 1995, *Megatrends Asia: The Eight Asian Megatrends that are Changing the World*,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 Nesadurai, Helen E. S., 2008, "Southeast Asia's new institutional

- architecture for cooperation in trade and finance,” in 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 eds, *Asia’s new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evolving structures for managing trade, financial, and security relations*, Berlin: Springer, pp. 171-173.
- Nye Jr., Joseph S.,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60-67.
- Organski, A.F.K. and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rganski, A.F.K., 1958,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 Paul, T.V., 2004,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T.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28.
- Pearson, Margaret, 1999,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gime,”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Pearson, Margaret, 1999, “The Maj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Engage Chin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Pempel, T. J., 2005,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empel, T. J., 2006, “A Decade of Political Torpor: When Political Logic Trumps Economic Rationality,” in *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edited by Peter J.

-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ohwer, Jim, 1995, *Asia Risi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osecrance, Richard,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hweller, Randall, 1998,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 3.
- Selsam, H., 1970, *Dynamics of social change*, N.Y.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Shirk, Susan L. and Christopher P. Twomey, eds., 1996, *Power and Prosperity: Economics and Security Linkages in Asia-Pacific*, Somerst, N.J.: Transaction.
- Simon, Sheldon, 1996, "The Parallel Tracks of Asian Multilateralism," in Richard Ellings and Sheldon Simon (eds),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in the New Millennium*, Armonk, NY: M.E. Sharpe.
- Steans, J. and L. Pettiford, 200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rspectives and Themes*, London: Longman.
- Strange, Susan, 1996,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ubbs, Richard, 1998,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versus Globalization," in William Coleman and Geoffrey Underhill, eds., *Regionalism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Routledge, pp.68-69.
- Tammen, Ronald L., etal.,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 Terada, Takashi, 2006,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ASEAN+3," in

- Bertrand Fort and Douglas Webber, ed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London: Routledge, pp.229-233.
- Tow, William, 2001,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Little Brown.
- Wan, Ming, 2006,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teraction,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makage, Susumu, 1997,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Asia-Pacific's Reg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ited,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283.
- Yarbrough, Beth V. and Robert M. Yarbrough, 1997, "Dispute Settle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gionalism and Procedural Coordina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edited by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134-163.

貳、期刊論文

一、中文部份

- 王公龍，2006，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貢獻與缺失，*《國際論壇》*，第4期，頁36-41。
- 江啟臣，2007，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與亞太自由貿易區，*《亞太經*

- 濟合作評論》，第 15 期，頁 16-28。
- 吳福成，2009，2010 年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發展新趨勢，
《中華民國太平洋企業論壇簡訊》，12 月號，頁 1-2。
- 宋興洲，2005，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
第 24 期，頁 1-48。
- 宋興洲、廖舜右，2007，東北亞經濟整合可能發展之初探，《亞太
經濟合作評論》，第 15 期，頁 52-62。
- 李賜賢，2007，從權力轉移論看亞太自由貿易區之形成，《亞太
經濟合作評論》，第 15 期，頁 108-120。
- 李賜賢，2009，後美國世界：群雄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政
治科學季評》，第 23 期，頁 17-20。
- 林則宏記者，中日韓峰會，承諾加速自貿談判，2010 年 5 月 30
日，《聯合報》，A10 版。
- 林庭瑤記者，中日韓擬簽自由貿易協定，2009 年 10 月 12 日，《經
濟日報》。
- 洪財隆，2009，區域合作與整合，《太平洋區域年鑑》，太平洋
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頁 62-64。
- 洪德生，2007，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對亞太區域政經情勢
的影響，《台灣經濟研究院》，頁 1-18。
- 張宗智特派員，美轉彎，淡化亞太自由貿易協定，2009 年 11 月
5 日，《聯合報》。
- 郭貞好，2010，崛起中的中國與東協之關係：霸權？整合？，
東海大學政治系碩士論文。
- 楊志誠，2007，「全球化衝擊效應下東北亞區域情勢發展的分析：
衝突或合作」，《社會科學戰線國際政治研究》，第 2 期，頁
148-149。
- 葉亭均，中日韓自由貿易腳步加快了，2010 年 6 月 14 日，《非

凡新聞周刊》，第 217 期。

葉俊廷，2008，台灣參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之 SWOT 分析，《亞太經濟合作評論》，青年論壇，第 16 期，頁 68-70。

廖玉玲編譯，歐巴馬效應，亞太設自貿區露曙光，2009 年 11 月 16 日，《經濟日報》。

廖舜右，2007，東北亞經濟整合可能發展之初探，《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 15 期，頁 52-62。

廖舜右、劉玉哲，2004，CEPA 之緣起與影響，《PECC 論叢》，台北：台經院，頁 253-266。

趙文衡，2002，區域貿易協定與東亞國際政經體系之重組，《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6 期，頁 81-108。

鄭端耀，2005，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頁 115-140。

鄭曉蘭編譯，2010 年 2 月 20 日，日修防衛大綱，鎖定中國擴軍，《自由時報》，A12 版。

蕭全政，2001，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頁 201-222。

二、西文部份

"S Korea trade chief hosts meeting with China and Japan," May 24, 2010, *Taipei Times*, AP Soul, page 10.

Acharya, Amitav and Barry Buzan, 2007,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7, No.3, pp.287-312.

Aggarwal, V. K. and J. Ravenhill, 2001, "Undermining the WTO: the

- case against 'open sectoralism'," *Asia-Pacific Issues*, Vol.50, pp.1-6.
- Aggarwal, Vinod K. and Min Gyo Koo, 2005,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Vol.18, No.2, pp.189-216.
- Aggarwal, Vinod K., 1993, "Build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Asia-Pacific," *Asian Survey*, Vol.32, No.11, pp.1033-1035.
-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ABAC), Australia, 2004, "A 'Single Market Agenda' for Asia-Pacific," 12 August.
- APEC, 2007, *Strengthening Regional Economic Report*, pp.10-11.
- Baldwin, Richard E., 1997, "The Causes of regionalism," *The World Economy*, Vol.20, No.7, pp.865-888.
- Baldwin, Richard E., 2006, "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ism: Spaghetti Bowls as Building Blocs on the Path to Global Free Trade," *The World Economy*, Vol.29, No.11, pp.1451-1518.
- Beeson, Mark, 2003, "ASEAN Plus Three and the Rise of Reactionary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25, No.2, pp.251-268.
- Bergsten, C. Fred, 2005, "A New Strategy for APEC," Speech at the 16th General Meeting of the PECC, Seoul, Korea, September 6.
- Bergsten, C. Fred, 2007, "Toward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p.1-13.
- Bergsten, Fred, 1994, "APEC and World Trade: A Force for Worldwide Liber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pp.20-26.
- Bernard, M. and J. Ravenhill, 1995, "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 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47, No.2, pp. 191-208.

- Bhagwati, Jagdish, 2006, "Why Asia Must Opt for Open Regionalism on Trade,"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6.
- Breslin, Shaun, and Richard Higgott, 2003,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ia Europe Journal*, No.1, pp.167-182.
- Buzan, Barry, and Gerald Segal, 1994,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36, No.2, pp.3-21.
- Calder, K. and M. Ye, 2004, "Regionalism and critical junctures: explaining the "organization gap" in North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4, No.2, pp. 191-226.
- Cossa, Ralph A., 2005, "US Security Strategy in Asia and the Prospects for an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Regime," *Asia-Pacific Review*, Vol.12, No.1, pp.64-86.
- Crone, Donald, 1993, "Does Hegemony Mat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cific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45, No.4, pp.501-525.
- De Mesquita, Bruce Bueno, 2002,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6, No. 1, p. 4.
- Deung, Yong, 1997, "Japan in APEC," *Asian Survey*, Vol.37, No.4, pp.357-367.
- Dieter, Heribert and Richard Higgott, 2003, "Exploring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From Trade to Finance in Asia Co-Ope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0, No.3, pp.430-454.
- Frankel, Jeffrey, Ernesto Stein, and Shang-Jin Wei, 1995, "Trading Blocs and the Americans: The Natural, the Unnatural, and the

- Super-Natur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47, No.1, pp.61-95.
- Friedberg, Aaron L., 1993/94,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3, pp.5-33.
- Friedberg, Aaron L., 1998, “Europe’s Past, Asia’s Future?” *SAIS Policy Forum Series Number Thre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1-15.
- Gaddis, John Lewis, 199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pp. 5-58.
- Garnaut, Robert, 1998, “ASEAN and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World Trad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14, No.3.
- Glaser, Charles, 1995,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pp.50-90.
- Grieco, Joseph, 1995, “The Maastricht Treaty,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the Neo-realist Research Programm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1, No.1, pp.21-41.
- Harris, Stuart, 2000, “Asian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Response to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13, No.3, pp.495-516.
- He, Kai,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4, No.3, pp.489-518.
- Helweg, M. Diana, 2000, “Japan: A Rising Su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pp.40-52.

Hiddott, Richard ed al, 1990,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n Evolving Case Study in Leadership and Cooperation Buil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45, No.4, pp.823-866.

Higgott, Richard, 1995,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A Theoretical Comparison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2, No.3, pp.361-383.

Higgott, Richard, Andrew Fenton Cooper, and Jenelle Bonnor, 1990,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n Evolving Case Study in Leadership and Cooperation Buil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45, No.4, pp.823-866.

Hormats, Robert D., 1994, "Making Regionalism Safe," *Foreign Affairs*, pp.97-108.

Hughes, Christopher W. and Ellis S. Krauss, 2007, "Japan's new security agenda," *Survival*, Vol.49, No.2, pp.157-176.

Hughes, Christopher W., 2009, "'Super-sizing' the DPRK threat: Japan's evolving military posture and North Korea," *Asian Survey*, Vol.49, No.2., March-April.

Hughes, Christopher W., 2009, "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re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5, No.4, pp.837-856.

Hurrell, A., 1995, "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1, No.4, pp.331-358.

Jayasuriya, Kanishka, 2003, "Introduction: Governing the Asia Pacific---beyo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4, No.2, pp.199-215.

- Jervis, Robert, 1998, "Real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pp.971-991.
- Jervis, Robert, 1999,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pp.42-63.
- Kahler, Miles, 2000, "Legalization as Strategy: The Asia-Pacific Ca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3, pp.549-571.
- Kang, David C., 2001,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19, No.2, pp.121-160.
- Kang, David C.,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pp.57-85.
- Katzenstein, Peter J., 1996,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31, No.2, pp.123-159.
- Katzenstein, Peter J., 2000, "Regionalism and Asia,"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5, No.3, pp.353-368.
- Kegley, Charles, 1993, "The Neoidealist Momen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alist Myth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2, pp. 131-146.
- Kegley, Charles, 1994, "Symposium: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pp. 155-278.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 Jr., 1985, "Two Cheers for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Vol.60.
- Keohane, Robert and Lisa Martin, 1995,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pp.39-51.

Kim, Eun Mee, 1999, "Cri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e in South Korea," *Asian Perspective*, Vol.23, No.2, pp.35-55.

Kim, Joongi, 2003, "Sub-Regionalism, Regionalism, Trans-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ies," *Asia Europe Journal*, No.1, pp.183-196.

Leifer, Michael, 1999, "The ASEAN Peace Process: A Category Mistake," *The Pacific Review*, Vol.12, No.1, pp.25-39.

Lieber, Keir and Gerard Alexander, 2005,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pp.109-139.

Manning, Robert A., and James J. Przystup, 1999, "Asia's Transition Diplomacy: Hedging against Future shock," *Survival*, Vol.41, No.3, pp.43-67.

Mansfield, Edward D., and Helen V.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3, pp.589-627.

Mckay, John, 2002, "APEC: Successes Weaknesses, and Future Prospects,"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pp.42-53.

Mearsheimer, John, 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pp.5-49.

Moore, Thomas G. and Dixia Yang, 1999, "China, APEC, and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13, No.2, pp.361-411.

Mulgan, Aurelia George, 2005, "Why Japan Still Matters," *Asia-Pacific Review*, Vol.12, No.2, pp.104-121.

- Nye, Joseph S., 1988,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40, No.2, pp.235-251.
- Pape, Robert, 2005,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pp.7-45.
- Paul, T.V., 2005,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pp.46-71.
- PECC and ABAC, 2006, *An APEC Trade Agend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Philippines: ABAC Secretariat, pp.6-11.
- Pempel, T. J., 2007, "North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 Region in Flux," *Asia-Pacific Review*, Vol14, No.2, pp.45-61.
- Powell, Robert Spring, 1994,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2, pp.313-344.
- Pritchard, Charles L., 2005, "Beyond Six-Party Talks: An Opportunity to Setup North Pacific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Framework," *The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Issue No.1.
- Rapkin, David P., 2001, "The US, Japan and the power to block: the APEC and AMF cases," *Pacific Review*, Vol.14, No.3, pp.373-410.
- Ravenhill, John, 2000, "APEC Adrift: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Vol.13, No.2, pp.319-333.
- Rice, Condoleezza, 2006, "Remarks at the APEC CEO Summit," November 18.
-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51, No.1, pp.144-172.

-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pp. 166-167.
- Roy, Denny, 2005, "The sources and limits of Sino-Japanese tensions," *Survival*, Vol.42, No.2, pp.191-214.
- Ruggie, John G.,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 Ruggie, John, 1998,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pp.855-885.
- Schweller, Randal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pp. 99-107.
- Schweller, Randal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pp.72-107.
- Schweller, Randall, 1997,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pp. 927-930.
- Scollay, Robert, 2001, "The Changing Outlook for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World Economy*, Vol.24, No.9, pp.1135-1160.
- Scollay, Robert, 2004,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Proposal for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Issues Paper for the APEC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 pp.25-30.
- Shambaugh, David, 2005,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 pp.75-80.
- Simon, Sheldon, 1995, "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8, No.2, pp.5-24.

- Soesastro, Hadi, 2006, "East Asia: Many Clubs, Little Progre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69, No.1, pp.50-53.
- Stackpole, H. C., 2002, "A US Security Approach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9, No.1, pp.77-87.
- Stubbs, Richard, 2002,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May-June, pp.440-455.
- Sugawara, Junichi, 2007, "The FTAAP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s approach to regionalism and US engagement in East Asia,"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Paper*, pp.4-17.
- Terada, T., 2003,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from EAEC to ASEAN+3," *The Pacific Review*, Vol.16, No.2, pp.251-277.
-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OFA), 2006, "14th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Overview and Evaluation)," November 19.
- Vogel, Ezra F., 2004,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East Asia," *Asia-Pacific Review*, Vol.11, No.1, pp.46-57.
- Wang, Fei-Ling, 1998, "China and Korea Unification: A Policy of Status Quo,"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Vol.23, No.2, pp.180-184.
- Wang, Yunjong, 2000,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Do We Need a Regional Financial Arrangement?"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17, No.2, pp.205-217.
- Webber, Douglas, 2001,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Vol.14, No.3, pp.330-372.
-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pp.391-425.

White III, George O., 2002, “Foreigners Beware? Investing in a Jungle with Many Predators: The ASEAN Investment Area,”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37, pp.150-161.

Wohlforth, William, 1994,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pp.91-129.

Wohlforth, William, 1995,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pp. 91-129.

Xintian, Yu, 2005,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12, No.2, pp.30-38.

Yamakage, Susumu, 1995, “An Asia-Pacific Community as a Regional Order: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APEC,” *Asia Pacific Review*, Vol.2, No.1, pp.117-126.